Ivan Klíma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我快乐的早晨

[捷克]伊凡·克里玛 著
景黎明 景凯旋 译

本书采用了一种散漫的结构，叙述了一周内发生的七个独立故事，以一个中心人物所从事的不同工作为基点，将周围的人统摄进去。小说以六十年代末那场举世闻名的政治动荡后令人窒息颓唐的时代为背景，通过“我”，一个苏军入侵后失去工作、混迹于社会底层的作家的视点，勾勒出一幅世俗社会的众生相：黑市商人、护士、经理、牧师、店员、教授，各色人等，面目不一。克里玛以他一贯的从容和平静，表现了极权制度对生活的扭曲，以及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人们所面对的悖谬。但作者笔下的世俗生活却自在而生动，仿佛“为了对抗我们生活中的荒诞”，显得幽默顺从。正如作者所说，他试图表现的是一种真正的“布拉格精神”。

封面设计　洪佩奇



ISBN 7-80567-885-5
I · 536　定价：10.00元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代译序

景凯旋

一九九二年四月，美国纳特格大学举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的题目是苏东剧变后的局势，参加者中有许多前苏联和东欧的作家。捷克当代著名作家伊凡·克里玛也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说，人们常向他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他的童年是怎样从纳粹集中营里熬过来的；他作为一个作家又是怎样从前苏联的长期占领中熬过来的。对此他没有直接作答，而是讲了一件不相干的经历，说他在抵达肯尼迪机场后，丢掉了随身的钱财和讲稿，尽管他很沮丧，可最终还是幸运地熬过来了。“只要熬过来，不幸的经历总是值得的。”他说。这番话使我想到克里玛的小说《我快乐的早晨》，一部面对生活的荒诞而显得轻松快乐的作品。当时我们早已译完这部小说，一直在寻找出版的机会。对克里玛来说，将重大历史事件与日常生活细节相提并论，这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向前看”，而是将两个全然不同的范畴联系起来的存在隐喻，正是这个纯粹卡夫卡式的回答，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关键。

克里玛一九三一年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位电

机工程师。他十岁时就随父母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三年多时光，一直到二战结束。悲惨贯穿了他的童年，他的所有儿时伙伴都死在了毒气室，这段经历无疑渗透到了他后来的创作中，形成了他的个人风格。一九五六年，克里玛从著名的布拉格查理大学语言学院毕业，任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并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发表小说和戏剧。自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八年期间，他一直在当时最负盛名的一家知识分子周刊任文学主编。作为一个曾在纳粹集中营中呆过的作家，克里玛对自由的敏感必然会与现实社会发生冲突，当初他感谢新政权带来的解放，但随着经验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就会导向自由和正义的境地，所以在“布拉格之春”中，他表现得相当活跃。当这一事件随着苏军坦克的入侵而告结束后，克里玛去了美国密执安州一所大学，在那里做了一年访问学者。之后他谢绝了朋友的劝告并回到捷克，但随即失去了工作，为了生计，他做过短期的救护员、送信员和勘测员助手，同时仍作为一个自由撰稿者继续写作，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很普遍的事。有二十年时间，他的作品在捷克国内完全遭到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在读者中私下流传，这些作品与哈维尔、昆德拉等人的作品一道，构成了当代捷克的另一种文学史。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使他的作品重新得以出版，此后他开始担任国际笔会中心捷克分会主席，后改任副主席至今。接踵而来的是，他的文学声誉日隆，在捷克的读者群中甚至超过昆德拉，成为九十年代捷克的代表作家，一部作品的销量在其国内就达十余万册。那原因，除了其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外，大概也是因为他不像昆德拉那样最终移居国外，而是一直坚持留在国内写作，所以更能与当代捷克人的情绪相通。用克里玛的话说，他的作

品试图表现的是一种“布拉格精神”。在这个意愿的驱使下，他写出了《我快乐的早晨》及其他许多作品，如《我的初恋》、《爱情与垃圾》、《被审判的法官》、《我金色的贸易》、《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以及论文集《布拉格精神》等，这些作品都已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并受到世界文坛愈来愈多的关注和好评。

对任何一名捷克人而言，像“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这类问题都不仅是属于个人的，而且也是属于一个民族的。克里玛的创作就很清楚地表明，他的作品植根于他个人的命运，而他个人的命运又植根于民族的命运。在历史上，捷克民族属于古斯拉夫族的一支，早在公元九世纪，他们的祖先就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十六世纪捷克并入奥匈帝国，成为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一个属地；在本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捷克又曾先后经历了德国纳粹占领和苏军占领；尤其在东西方冷战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它长期属于分裂的欧洲的一方，丧失了国家的特性。但无论有多大的压制，民族和个人的特性仍然能借助于文学，穿过重重的政治帷幕传出来。相对于捷克的政治地位，它的文学无论其成就还是影响，都早已是世界性的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捷克人在斯拉夫民族中是最古的人民，也有着最富的文学。”这话并不过誉。对中国读者来说，这块波希米亚的旧土富饶而迷人，似乎特别适于文学的生长，从这里走出的作家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如群星灿烂，凸现在我们远眺世界的视野中。五六十年代的读者今天大概还能记得哈谢克的名字，他的《好兵帅克》曾在我们心里引起过长久的回响。到本世纪下半叶，又有一些捷克当代作家，如现任捷克总统哈维尔，被称为先锋派重要代表的赫拉贝尔，以及中国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的昆德拉等，更是由于其作品描写了极权社会中人的异化和荒诞，同时又处处表现出独特的

波希米亚人文精神，而为世界文坛所瞩目。可以说，大多数捷克作家的作品其实都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缺乏自由的社会中人们是怎样活下去的。

捷克人的气质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退缩，这是一种讲究现实的人文精神，从哈谢克到克里玛，都可以寻绎出它的一脉相承。这种精神渗透了捷克人的生活，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现实空间，比如，在新近出版的散文随笔集《布拉格精神》里，克里玛就曾指出，不同于周围国家，布拉格市中心的建筑都有一个不起眼的外表，这里的人在上世纪末还曾仿造过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例却要小得多，看上去就像是对伟大的一个幽默。原因大概是悖谬的，一方面是饱受蹂躏的大陆民族，有着对故土的挚爱和对苦难的敏感，一次次卷入大国之间的霸权争夺，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极权统治，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充满对这个世界的荒诞感；另一方面则是经受过文艺复兴的理性的洗礼，融合了捷克、德意志和犹太三种住民的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兼容并包中也学会了妥协和适应。但退缩还不是完全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们经历得太多，由于意识到生活和人性的全部本质，任何社会进步的政治神话都不能让他们轻易相信。说到底，本世纪无数人为的灾难往往都源于此。由这种怀疑而来的，则是对一切绝对和崇高的事物都本能地反感，所以捷克人的一大特色就是不喜欢张扬和激情，热爱生活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意义，面对生活中的荒谬，他们从不会让自己燃烧起来，而是宁愿用幽默的顺从来消解。正是这个特征创造了捷克的艺术和文学。捷克式的埃菲尔铁塔是这样，克里玛也如此，他的许多作品都有一个基本的情节，往往是一个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知识分子沦落到社会底层，为了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不得不从事各种低下的职业，接触到各

种普通的人，这是一种沉默之后的生活，属于日常人生的一面，它也许有很多卑微之处，但却是实在的，所以值得一过。

回想起来，我们也曾有过英雄主义的时代，青春被豪情满怀地表演，想要奔向美好前方的崇高感觉占据了全部心灵，而同时身边的真实生活却被遗忘了，激情的浪潮退去，留下的却是一片荒芜的沙滩。退缩其实是从各种绝对的价值观的退出，它是一种生活的均衡感，一种消极而深刻的理性。退缩的结果不但产生了哈谢克，而且还产生了卡夫卡。

在《我快乐的早晨》这部小说中，克里玛以他惯有的从容和平静，讲述了一些世俗而没有激情的故事。小说作于一九七八年，恰好是“布拉格之春”十周年之际。它采用的是一种散漫的结构，有点类似今天的电视连续剧，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长度里，叙述七个各自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以叙述者所从事的不同工作为基点，把周围的人物统摄进去，比如，《一个黑市的故事》、《一个感伤的故事》、《一个小偷的故事》等等，而以一个中心人物即叙述者本人贯穿其中，将每天发生的故事联缀起来，成为一部既松散又紧凑的中长篇。由于不像传统小说一个故事到底，喜新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别致。它与《我的初恋》和《我金色的贸易》组成了一个三部曲，都是通过一个叙述者的观点，讲述几个相对独立且带有自传性的故事。这种形式大概更能体现出克里玛的创作理念，即真正的生活不是暂时决定人们命运的政治，而是在这种政治下普通人广泛的源远流长的日常生活。

小说以六十年代末那场举世闻名的政治动荡后令人窒息颓唐的时代为背景，其中的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出克里玛本人的影子，第一人称的“我”即作者本人是一个作家，在前苏联军队入侵捷克后失去了工作（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迫于生活，他混

迹于社会底层，干过鱼贩子、护理员、建筑工等活，通过他的视点，勾勒出一幅世俗社会的群体景观：黑市商人，护士，经理，牧师，店员，教授。色色人等，面目不一，各有各的活法。作者笔下的世俗生活自在而生动，处处见出他对植根于波希米亚土壤的这种生活的理解和同情，在他看来，那是一片只与个人生计有关的广大水域，尽管政治常常也会侵入其中，但它最终不过是浮在表面的泡沫，不会改变生活延续了几千年的基本流向，甚至也改变不了它本质上的无意义。读克里玛的小说，人们会想到昆德拉的作品，他俩都同样表现了极权制度下的意识形态话语对生活和人性的扭曲，以及处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的人们所面对的悖谬，但如果说，昆德拉更偏重于对伪崇高(他称之为 Kitsch)的批判，克里玛则更倾向于对世俗的认同。而且，克里玛似乎也不喜欢观念的东西，他注重的是生活中的形象，对于昆德拉总是将人物划分成抽象的各种类型，他颇不以为然，认为昆德拉笔下的捷克人没有个性，肤浅得像外国记者的分析报道。比较起来，克里玛的写作风格或许更像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契诃夫，更关注日常存在中的凡人小事，那些属于私人性领域的自在和无意义，比如人生的劳苦、贫穷和粗鄙，不负责任的自私，图谋钱财的欺诈，以及放纵的情欲等等。单纯的人物，单纯的事件，正是格雷厄姆·格林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

但这种通常的人生仍然是这个时代的，所以政治和性爱一直是当代捷克作家的两个主要题材。在克里玛的小说中，前者属于人们的公共生活，代表非人性的一面，阴暗而压抑；后者则属于人们的私人生活，代表人性的一面，真实而放松。小说里作者曾与他的情人在树林里做爱，可他们之间却几乎没有什么了解。要不是发现一个卖鱼女人贪图他的钱(她并不在乎他是一

个人民敌人),作者还差点与这个刚刚认识的女人春风一度。作者的笔触是恣肆的,但单纯的性爱描写却显然不是他的目的。两三年前,一个捷克人曾告诉我,在过去的捷克,在政治无孔不入的那个年代,一切有思想的言行都会遭到禁止,没有书没有电影,唯有男女间的性爱是自由的,但捷克人在这上面并不就是那样随便,随便到没有任何过程和交流。捷克的作家对此津津乐道,道理恐怕还在于性爱是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为了抗拒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人们总得抓住一点实在的什么,比较长久的,作为他们的庇身之地,尽管这种实在往往仍属于虚幻。在读者看来,其实是将一个希望破灭之后的社会压抑着的气氛和弥漫着的肉欲展示给人们。小说里,作者与多年前的情人久别重逢,可他们却找不到过去幽会的地方,结果旧梦难圆。克里玛对悲剧人生的感觉是敏锐的,正由于有虚妄做人生的底子,书中对世俗生活的描写才不显得庸俗,那些没有名目和结果的挣扎,才表现了现代人普遍的存在困境。

全书的叙事语气轻松而幽默,这也许是捷克民族对苦难从来就抱着理性的而非宗教的态度所致,或者如作者所说,是为了"对抗我们生活中的荒诞"。这种荒诞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治,这其实是无须讳言的,对于二十世纪的人类,政治即使不是唯一的存在,也称得上是最大的现实。"布拉格之春"影响到作者,生活突然间变了样,他失去了工作,他的朋友中有许多知名的评论家、教授和导演,有的当了夜间守门人,有的给商店洗橱窗,有的去挖地铁隧道。可如果所有人在大街上集合只是为了庆祝某个外国的革命,而社会中最有创造性的精神却被迫沉默,每天出门都有人跟踪,房间常常被人搜查,人们对此除了报以幽默,还能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呢?退缩还是一种执着的均衡感。当许多人

移居国外时，作者却放弃了机会，道理说来简单，他觉得现在的生活很有意思，自然这包含着幽默，但其实也是实情，对于故乡的一草一木，我们总有一份割不断的感情，大概就因为我们曾生长于斯颠沛于斯，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所以才会事事关心。这是人的惰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宗教性。就像作者在书中说的，生活常常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两种绝望之间给人们提供一个选择，而你只能选择更容易忍受和更有吸引力的一种。捷克人到底是斯拉夫民族，这使我们看到了他们性格里的另一面，承受苦难的认真和执着，全书因此而流动着一股淡淡的感伤。

这是一部有关记忆的书，面对那个特殊的年代，克里玛唯一想要做的就是经历它，写下它。对一个民族来说，有些经历是不可以遗忘的。时间如冬天的河流，结冰的日子也会归于平淡，但只要有民族的记忆存在，大多数普通捷克人的那段经验就不会被忘却，它在冰冻的水面下流淌，等待解冻的日子。多年以后，当世界被东欧的剧变惊得目瞪口呆的时候，在遥远的加拿大的一所大学讲堂上，有人就当年的"布拉格之春"问起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儿，好奇的人们想要知道，这二十年的时间多数捷克人是怎样过来的。这位平日嘻嘻哈哈的女学生先是一阵沉默，然后突然失声痛哭。这个故事来自笔者的一位友人，它使我想起克里玛的小说，他同样是真实地写出了一个服从的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一九九八年五月于南京寓中

目　录

星期一早晨

一个黑市的故事

这是星期一早晨。

小弗雷迪竟然跳到我家的阳台上了。

当时我正坐在书桌旁写东西，突然感觉到有人在门厅里。我的妻子和孩子早已走了，我像平时一样把前门关得好好的。门厅里怎么会有人呢？

“有人在那里吗？”我叫道。

寂静。

我困惑地走出去，进入门厅，看见弗雷迪果然站在那里。他脸上有血，并露出抗拒的神情。

“哟！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是怎样到这里来的？”

“我一跳便下来了。”他用手抹着脸，使整个面部都被血弄脏了。可是，他没有哭。

弗雷迪有五岁，是住在楼上阁楼里的那家人的孩子。那阁楼低矮，根本不能做房间。

弗雷迪有一双非常黑的犹太人的眼睛，大耳朵，以及拳击手



的下颚。这一切都继承了他父亲的特点。他站在那里继续往脸上涂血，默默地打量我。我仍然纳闷，门已关好，门厅又没有窗户，谁能跳进来呢？

“你怎么跳进来的？”

“我从窗户跳下，便进来了。”

他的回答更增加了我的疑惑，我不能不认为，弗雷迪具有诗人的丰富想象力和职业罪犯的狡诈。比如，他看见小女孩在沙滩上玩耍，他常要往她们背上撒尿。虽然他父亲当然不会再干这类事，但这一切也是从他父亲那里遗传下来的，至少我要做这样的猜想。

“孩子，你怎么可能从窗户跳到这里来呢？”

“我先跳到阳台上。”

好吧，我想，他既已确确实实地站在这里，说明他的确是设法进入门厅的，这也合情合理。我大步穿过卧室，弗雷迪紧跟在后。阳台在卧室外面，是用混凝土浇灌的。阳台中间——在我妻子料理的各种盆栽植物和仙人掌中间，确有一滩褐色的血；再抬头一看，阁楼下方的那扇窗户也是开着的。

“你是从那里跳下来的吗？”

“是的。”

我不明白，如此流血，他怎么会不哭。我想，他也许被惊呆了吧！

“你的爸爸在哪里？”

“在上班。”

“你母亲呢？”

“买东西去了。”

“你知道她到哪里买东西吗？”

"她把我锁在房里,"孩子不无埋怨地说,"我害怕,就跳了下来。"

"听着,弗雷迪,你伤着了吗?"

"是的。"

"哪里受了伤?"

"到处都是。"

"你的头呢?"

"也有。"

是的,不用怀疑,弗雷迪不是一个爱哭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个虐待狂,常用一根皮带抽打他,而他只是站着,决不哭,只是怒目而视。这种时候,他们父子两人的脸部表情会使人不寒而栗!弗雷迪或许正是一个勇敢而又能压抑感情的小家伙,或许他根本就丧失了痛感。而且,有一件事还使我敢肯定,他也完全没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他父亲曾夸耀地说,他们第一次把弗雷迪带到游泳池时,弗雷迪一看见水就从他们身边跑开,跳进游泳池深处。他们设法把他拖出来时,他已淹得半死不活。

"可是,维杰尔先生,"我妻子听后不以为然,"这不是正常的,我想,你应该去请教一位精神病医生!"

"我亲爱的女士,"弗雷迪的父亲,这个骗子,拒绝了我妻子的建议,"我就是他的精神病医生啦!"

"你知道你母亲什么时候才回来?"我问这个压抑着感情的小家伙。

"她不会回来,她不再要我了!"

我敢肯定他在撒谎。这个孩子还具有的特征就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撒谎,什么时候又确实在讲真话(正像他父亲)。

我们不能就这样闲聊着等他母亲回来,更用不着说等待他

父亲回来。

我仓促地写了一张便条。

维杰尔太太：

弗雷迪遭遇了一个小事故。没什么要紧的，我已把他带去看医生。见到您后再向您解释。”

我签上名，把便条从楼上他们的门下塞了进去。

在历史上，我们这幢房子曾发生过灾祸。它是本地医药商和他的妻子在战前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儿子修建的。儿子是宪兵队的一个军官，战后逃到美国去了。医药商夫妻被强制搬进了有两个房间的阁楼。这算是对他们儿子叛逃的惩罚。那套阁楼不可能得到当作居室的认可，因为天棚比国家规定的标准低了十公分，尽管如此，仍然常用作居住之所。好像是为了补偿，阁楼的浴室却高贵豪华，全用瓷砖砌成，一直砌到那个难以认可的天棚。医药商的妻子七十岁时，他们把她逮捕了，据说是她贩卖图泽克斯的配给票。人们用这种配给票可以在图泽克斯特别商店买到外国货。当然啰，他们的半幢房子很快被充了公。而且，妻子被关进监狱后，医药商——他的药店早已被没收，而他没有做过任何错事——服了过量的药，被送进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妻子释放回来时已七十三岁了，她继承了另外半幢房子和那套阁楼，还带回一个年轻小伙子。那小伙子在夜总会拉手风琴，人们说，他是她的情人，可是我怀疑真有人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老太婆称小伙子叫佩皮。她给他做饭、洗衣，还给他买衣服。佩皮是一个沉默寡言、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他总是用这句

话来招呼我,“见到你很高兴,请替我向你夫人问候。”一天,他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要不是他带走了他的手风琴和提箱,我们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我们房子后面的树林中被人谋杀了。我们到公共汽车站去都要抄近路,就是从这片树林里穿过的。大约半年后,我收到他从丹麦给我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注明的地址是一家属于一位汉森先生的餐馆。在明信片的另一面,佩皮写道:“我过得很好,我是自由的。请替我向所有的房客以及楼上那位吝啬的老太婆问候。佩皮敬上。”

楼上那个吝啬的老太婆又活了五年,最后已变得蓬头豁齿了。她始终相信,人们来回奔走都是为了抢劫她。她每月给警察打一次电话,报告存折被盗,警察赶来后却发现一切正常,然后又开车离去。当我对这样反复的骗局表示惊讶时,警察们解释说,调查她的报警是职责所系,假如有一天,她报警所说的是真的,将会怎样呢?

可巧,他们说对了。但是这次她没有机会打电话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屋里,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直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她的屋子已经安静了好几天,这次是我们给警察打了电话。

警察从我的阳台上爬着梯子进入阁楼。屋子里臭气薰人,地上有一滩干了的血。存折不见了。警察后来发现,有人从老太婆的几个存折里取走了两万克朗。

所有的房客都被警察召去询问。谋杀案发生约半年后,我也被叫到警察局,可是,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不管怎样,我感觉到他们对这个案子并不特别感兴趣。有时,年轻人自己都说不定要遭到抢劫,仅仅两万克朗的盗窃谋杀案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弗雷迪追问。

“去找医生。”

"他会生气吗?"

"当然会!"我决定不再和这孩子兜圈子,"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妈妈把我锁在里面,我又想让我爸爸发疯。"

"可是你会死去的!"

"我想死!"

"你想死?"

"对! 这样他们就会把他再次关起来。"

弗雷迪的父亲是监狱里的常客,他最近一次徒刑是一年前才满期的。名义上,他是一个男护士,每月的正当收入不到一万八千克朗。因而,他真正的职业是什么都干。在转卖被窃物方面,他是专家;他又是个富于幻想的诗人,但主要是一个骗子。他相信,假若国家的形势不像现在这样,他会成为一位杰出的商人。但这只是他的宣言而已,实际上,无论在什么政体统治下,他都是一个骗子。

在医药商妻子被谋杀四年后,他住进了那套阁楼。他来拜访我,假装向我借旋凿,那对黑眼睛先落在我身上,然后又落在我的书和家具上。显然,他对我的情况进行过调查,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我有可能成为他的顾客。我被他那温柔的犹太人的眼睛、大耳朵、拳击手的下颚吸引住了。正如有可能预料的那样,他的头发朝后梳得笔直,由于擦过发油而闪闪发光;他的身上散发出浓烈的剃须后搽抹的润肤香水味。假如我们还有几位拥有嫁妆的老姑娘,不用猜三次,就能猜到他的不轨之谋是什么。

下面是他自我吹嘘的长篇独白。这样的独白没有一个具有自尊心的作家编造得出来,也没有一个演员表演得出来。因为在一切名副其实的艺术里,一个艺术家总得遵守一定的原则。

他说，我应该知道，他周游过世界，认识所有的大人物，能够设法获得或者安排一切：在集中营里，他与施瓦岑贝格伯爵共睡一个床铺；与首相的兄弟也很熟；在北美洲的尼亚加拉游玩时，曾见过亨利·福特；现在，正在设法为联合国的比利时代表寻找一套银盘。他曾训斥我国的代理内政部长："你别想蒙骗我，老家伙，我一眼就能看穿你！"几天前，在维也纳参见洪扎·施瓦岑贝格时，他被介绍给奥托·哈布斯堡，一个真正可爱的绅士，一个代理人。当然啰，所有那些优秀的绅士都是代理人，他们掌管全世界维持人类秩序的那些警察，至于尼克松以及像他那样的其他丑角——他不愿费心指出我们国家的丑角——都只是他们的仆人而已。他说，有那么一天，他有更多的闲暇时，他会告诉我更多有趣的事。

如此这般的十分钟后，我也许应该感到自己像一位乡巴佬，过去的一生竟然对外面的大世界一无所知；然而二十分钟后，我却应该希望，虽然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愿他已错误地把我看做值得注意的人了。

他的夸夸其谈一共持续了整整九十分钟，言谈中，透露了他赚钱的诀窍。他到经营旧货的商店，花八百克朗买了一张普通地毯；这当然不是什么普通地毯，一经他的手便成为一张未被识别的珍贵的波斯地毯了。他再以一万五千的价卖出去。现在，他正在大学区修建一幢豪华的私人住宅哩。他有一个蠢笨如牛但又漂亮无比的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第二位夫人给他生了个女儿，小弗雷迪就是那个蠢笨如牛但又漂亮无比的第三夫人生的。第二夫人曾是个医生，给伊朗国王治过病。他对这件事感到很奇怪，因为他的第二夫人跟所有女人一样，基本上说，也是愚蠢的。他的大儿子是一个十分固执的家

伙，一次，他把大儿子捆在一条桌腿上，那孩子就用牙咬桌面，紧紧咬住不放，结果他们不得不把他的牙撬开，费了多大的劲，他们还不得不把水泼在他身上。那两英寸厚的桌面（没人相信这件事），有五个地方被咬穿了。他还告诉我，本来他准备学法律，可是战争爆发了。他写了两本书，但一直没时间修改初稿，也许他可以请我以后读一读。可这并不是说他认为写作也能赚很多钱（说到这里，他的长篇独白才第一次停顿了一下，认为我会对这些话要发表一点意见）。他可以帮我找到一套曾属于凯洛雷特家族的漂亮的银餐具；一个白镴制的茶壶，是货真价实的；几幅漂亮的版画和一个路易十五的便桶。

他接着叙述五十年代他被捕的事。他用一种令人怀疑的谦虚把被捕一事描绘得含含糊糊，使我能够清楚的也只是：他和施瓦岑贝格伯爵，同战争英雄库特尔瓦斯尔将军（将军在英国皇家空军中飞行过），一起参与了某个阴谋集团。那个阴谋集团有什么目的，我一点也没听清楚，也不想听清楚。

后来我从他妻子那里得知（她既不愚蠢也不漂亮），他被捕只因为在边境某地的一所女服务员培训学校当教员时，同他的一些未成年的学生发生了性关系。这才合乎情理。只是我想象不出，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怎么会允许他这样的人作为一个教员进入教室。

在医院，一位十分严肃的护士接待了我们。我向他解释，弗雷迪跌落到我家的阳台上，更精确地说，他自己跳入我家的阳台。很可能有自杀的意图。

“你是他的父亲？”

“不是，是他的一个邻居。”

她向我射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这目光暗示：在这种情况

下,我参与这桩事是十分可疑的。

“这孩子没有父亲吗?”

“他父亲上班去了。”我向她解释。

“你能告诉我他的详细情况吗?”

“我可以试一试。”

我和弗雷迪向她提供了所要求的大部分情况。我和他都不知道他的出生日期,但我答应以后填上这一点。护士的胸部诱人眼目,弗雷迪满有兴趣地注视着。尽管我对自己说,我不必感到对他负有责任,可我还是对他可能要弄的花招充满恐惧。

不久,我们被召进诊断室。

医生端详着弗雷迪,然后看了看我,最后又看着孩子。他用慈善的目光注视弗雷迪,却对我皱着眉头表示不满。“你是父亲吗?”

“不是。我是邻居。”

我的回答显然使他更加反感。他又转向弗雷迪。

“那么,年轻人,你是从窗户跳出来的,是吗?”

“是的!”弗雷迪自豪地说。

“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医生拍拍孩子的前额问道,“一名伞兵吗?”

“我要当警察。”弗雷迪回答。

“一名警察?”医生吃惊地问,“为什么要当警察?”

“这样我就能逮捕我的爸爸。”弗雷迪解释说。

医生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意识到我不是孩子的父亲,或者说,如果我是,可弗雷迪却不承认我这个父亲。医生叫弗雷迪闭上眼睛,向前朝窗子走五步,然后又朝回走。

“我要逮捕所有的人。”弗雷迪闭着眼睛详细地数落道:“爷

爷，奶奶，我们的老师，还有学校的厨师。”

“这孩子——”医生向我投来责备的眼光。“哎——好啦，你怎么跌倒的，弗雷迪？”

“我走到门边，可是它关着。”弗雷迪热情地说：“我爬到屋顶上，跳了下去。”

医生写了张用X光检查的纸条，要我们照完X光后再回来。

我们坐在阴暗的候诊室，旁边一个快断气的老太婆在轮椅上缩成一团。弗雷迪对轮椅发生了兴趣，他想知道轮椅的发动机在哪里。接着他主动提出给我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完全无头绪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后母和一个可憎的父亲。父亲是一个商人，又是一个吃人的人。这个邪恶的父亲——吃人的人，派他的儿子们到社会上去，给他带回最大的珍珠。对那些空手而归的儿子，他就加上点洋葱油煎了，然后吃下肚。

我不知道这是他自己杜撰的还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可是加洋葱油煎儿子这种血腥而残忍的恐吓，在我听来，只有他那邪恶的父亲才有可能想象出来。弗雷迪正要继续讲下去，却被唤了进去。

我突然认为，我对他父亲的怀疑也许不太确实，他肯定不至于如想象中的那样，已邪恶到那么极有造诣的程度，他缺少真正的专业恶棍的一些特征。这一点完全可以看做是对他的良好期待，因为业余恶棍多少还应该有点人性。

他搬到我们那幢房子一周后，就邀请我到他的房间去。他穿着节日的盛装，雪白的衬衣领熨得很平整。

两间小房里塞满了旧家具，都不具有特殊的价值，但多数家具是属于上个世纪的，而近来人们往往花费大价钱去买上个世

纪的东西哩。门边，一个极不合适的地方，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上是一个立体派艺术的裸体像。

“瞧，这是毕加索的。”他出口不凡，“糟糕的是他没有签名！”

“这决不是毕加索的画，”我立刻予以纠正，“从来就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

这一纠正让他难堪。“可是——可是，瞧瞧这双手臂和大腿！还会有谁能画它们呢，我问你？”

“任何人都能画。”我说。

“可是，马特吉塞克教授……”

“维杰尔先生！”我没让步并打断他的话。他没有在乎我的失礼，竟把我拉到屋里，让我看他收集的宝石。我不以为然地表示，我对宝石一无所知。然而这似乎恰恰鼓励了他。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帆布口袋(女人们到海滩去时常用这种口袋来装防晒乳液和香脂)，从口袋里倒出约十二个小药瓶，然后取出软木瓶塞，把宝石摆放在桌上。

“瞧，这是一块重十二克拉的真正的南非宝石；而那两块却是人造的；那边那块蓝宝石是从印度搞来的！”

然后，他又给我看了三块红宝石，一块蛋白石和两瓶装得满满的波希米亚石榴石。一个瓶子翻倒了，宝石被撞得翻滚起来落到地上，当一个宝石碰上另一个宝石时，发生了清脆悦耳的声音。他跪下去把它们捡起来，这时他的茄克衫向上缩到背上，我看见，他的衬衫底部有一大块红白方格布的补丁。

接着他又拿出他儿子收集的钱币。这些钱币都有条不紊地排列在一个厚厚的粘贴簿里，粘贴簿外壳镶嵌着一个铜版，上面刻有题词：

弗雷迪·维杰尔——硬币集
赠给弗雷迪以做生日礼物

父亲

我几乎感动了。

在最初的半年间，他至少一月来两次向我提供点什么东西。“麦斯特罗，瞧一瞧去，一个造诣很深的巴洛克艺术风格的耶稣基督雕像。怎么样，去瞧瞧吗？这个雕刻品可是举世无双的啦！”

我很不情愿地跟他上了楼。

“这是十九世纪的！”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哟……你再仔细瞧一瞧那件长袍的褶层……”

他不再坚持，而是把我引到餐具柜旁，给我看一个曾属于皮柯洛迈尼斯家族的精心制作的银盘。真正的十九世纪的艺术品。

下一次，他又叫我去看一个真正的哈马丹[①] 地毯。我一点也不知道哈马丹地毯是什么，我对地毯的无知与对宝石的无知是同等的。那张地毯收藏在底楼的楼梯下面，很大一卷，至少有四公尺宽、五公尺长。他打开地毯卷，让我看看地毯正面，花花绿绿的颜色全被灰尘覆盖了。

“嘿，怎么样？”他激动得满脸通红。

“脏极了。”我说。

“嗯，这个，”他对我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如果你看见过他

① 伊朗西部的一个城市。

们是怎样收藏东西的就好了！可是，瞧瞧这个手艺！前半个世纪的。”吸取那个巴洛克的耶稣基督雕像的教训，为了稳妥起见，他没有说出是哪一个世纪。

第二天，我看见他把“哈马丹地毯”拖到院子里，把它挂在一个架子上。房客通常就是在那个架子上拍打他们的地毯的。它比我前一天看见它被卷在楼梯下时所想象的还大得多。然后他从花园里拖来一根软水管，开始把一大股水喷射在地毯上。

我站在阳台上，好奇地观察他。当我看见地毯正发生着变化时，心里十分惊异。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事。各种颜色伴随着污物从地毯表面被冲洗下来，就在我眼前，地毯渐渐地变成白色，被污染的水沿着地毯淌下来流到院子的地上。

我相信，这种清洗工作的结果同样会使他大吃一惊。但既然已经开始了，他并不打算放弃。接着，那个巨大的地毯中央，一块布脱落了，或者说，不是脱落，而是溶化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终于关上水。挂在架子上的地毯变成了一块中间有个缺口的淡白色破布。维杰尔先生抬头望着我，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然后躲进屋里。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买了一辆装载五吨的货车。

“你弄一辆货车干什么？”我很想知道。

“噢，它迟早会有用的。”他回答说，“相当便宜，只花了六千。”接着他又补充说，“当然，另外还给了一点钱。”

有两三天，人们都喜欢围住那辆蓝色的货车。他不停地把货车的帆布蓬顶抬起，放下，再抬起，再放下，就像一个孩子似的，神采奕奕地坐在车轮后面。从那以后，迄今为止已两年多

了，那辆货车一直停放在房子外面，轮胎慢慢地跑完了气，蓝色的涂层也慢慢地老化了。

就在几个月前，他又买了一辆旧摩立思牌小汽车。“从英国大使馆买来的，”他告诉我，只有那一次，我以为他讲了真话。因为在布拉格还有谁拥有一辆旧摩立思牌汽车呢？那辆小汽车是淡绿色油漆的，装有黄皮革的垫子，上面还有不列颠利兰德的标志。

“便宜得很，是吗？”我问。

“仅仅三万，”他骄傲地说，“去试一试用五万买一辆，如果你能行的话！”

“我不会。我的意思是，我不会去试。”我真诚地说，“我将对能否买到备用配件而操心。”

“噢，这个！我只要给伦敦的老阿洛伊斯写张便条，他就会给我送来我需要的一切。”

我不知道老阿洛伊斯是什么人，但我可以想象一个有胆量的骗子是怎样用一辆摩立思·玛丽娜汽车去招摇撞骗的。他将悄悄地把车停在一个老太婆的屋子外面，这个老太婆在报上登过一张出售巴洛克守护神的广告。他从淡绿色的小汽车走出来，脱下皮手套，向老太婆伸出手，自我介绍是维杰尔博士。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世界形势，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盒子，十五世纪后期制作的哥特式圣母像，以及沃杰蒂塞克博士和布朗克维克教授，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艺术家。接着，他还顺便谈到对夏加尔的访问。老太婆听得入了神。结果由他出价三千，据说，已低于一个巴洛克守护神应值的价了。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是有两个潜伏的问题：第一，这个巴洛克守护神并不是真正的巴洛克艺术品，而维杰尔先生甚至不愿去怀疑这一点，反而被老

太婆骗了;第二,如果有人在老太婆门外,从一辆淡绿色的摩立思·玛丽娜牌汽车下来,这辆不列颠利兰德生产出的杰出的产品必须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才有可能骗住老太婆,可是维杰尔先生的汽车只有六个星期处于正常状态,然后变速箱就坏了。

此后,淡绿色的玛丽娜就停放在那辆蓝色的五吨重的货车旁边。这两辆车一起生锈。老阿洛伊斯至今还没有从伦敦送来一个新的变速箱。

一个年轻的护士带着弗雷迪回来了。

“嘿,弗雷迪,我们告诉爸爸发生了什么事好吗?告诉他,我们折断了手腕,碰伤了手指好吗?”

“我不是他父亲。”

“你不是?”

“不是。我是他的邻居。”

她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仿佛在说,否认自己的亲生骨肉——哪怕是私生子——也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接着她决定不在我身上浪费口舌,就热情地转向未来的警察。

“好了,弗雷迪,你回到给你那张纸条的那位医生那里去。”

她把一根细小的金属棍塞进我手中,上面挂着弗雷迪的X光检查单。我们两人连忙回到伤员科。在候诊室的白凳子上坐下时,我看见这孩子尽管伤了手腕和手指,但却在微笑,不掩饰地流露出内心无比快乐的神情。没有注意到我正细细地打量他,已完全沉醉在自我冥想中了,那受伤的手还不时伸入他的一个衣服口袋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干什么,弗雷迪?”我问,“你需要什么吗?”

弗雷迪吃了一惊,默不做声地摇了摇头,手却仍然伸在口袋里。

“你口袋里装的什么？”

“没什么！”

他迟疑了片刻，终于忍不住了。“瞧！”他说着从口袋里取出几样东西：一支圆珠笔、一把镊子、一个陶瓷小盘子、一瓶药。

“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的？”

“她那里还有一个苹果哩！可是我讨厌苹果！”他大声说。

可以想象，那个护士一定会在以后的日子里逢人就说，由于被父亲抛弃，孩子的道德已受到严重的损害。

接着，他们把弗雷迪叫进去，大概是要给他的手腕敷上石膏。

他父亲最后一次被关进监狱是在买蓝色货车和淡绿色小汽车之间那段时间。一天早上，警察乘坐两辆黑色的伏尔加牌汽车来到这里，他们搜查了阁楼，没收了好几个古董，把这些古董和它们的主人一齐带走了。由于阁楼没有电话（以后也不可能有，因为不打算用它来供人们居住），受了惊的维杰尔夫人等警车一离开，就跑下楼来问我们，是否允许她用一用我们的电话。

“当然可以，请便。”接着我又说，“但是请小心一点，我的电话很可能被人窃听。”

她点点头。可是我的警告对她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她在电话上用强烈的诽谤性语言描绘了刚才离开的那些人。幸运的是，目前窃听器的使用还不是非常正规，而且只用来监听我的谈话，而不是我邻居们的谈话。

从此，维杰尔夫人时常来访问我，她丈夫被捕后，她变得比从前更迷人了，常有的那种令人烦恼的表情也消失了。通常，她一站在我书房门口（她总是谢绝进来），就不停地说话。这个十分活跃的演讲者，总是一边说话，一边摇头晃脑，染过的长发在

她肩上飞舞着。

就这样,我了解到她那诡计多端的男人在他的隔离期中干了些什么。同他平时的习惯相反,这次他好像要保持沉默,拒绝坦白一切;他的律师声称,只要他坚持到底,警察的日子就不好过,因为他们没有抓住他任何把柄。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想,她同样以为这是令人惊讶的事。

开始,我想安慰她,对她说,我敢肯定事情会朝最好的方向转变,她丈夫会在她意料之外回到家。接着我很快就感觉到,我的话不仅没有起到宽慰她的作用,反而让她发了愁。也许她最不希望的就是她丈夫迅速归来。

"啊,上帝!"她战栗地说,"如果他认为他已经给了他们一拳,他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盛气凌人,好像他还不够狂妄似的……"

我从她那里获悉:维杰尔先生比她大二十五岁,是一个卑劣的爱吹牛的人;是他设法把她灌醉的。"哎,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太傻了,又没有经验。我害怕流产,可又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对他们说我将要生一个私生子。无论如何,人们都说没有父亲的儿子在人生中会得不到一点机会,是这样吗?"她又说:"可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我问你?但愿你知道。他可以半个月不看那孩子一眼,却会突然捉弄起他,或者大发脾气,脸涨得通红,喘不过气来。你应该知道,那老家伙是怎样玩弄我的……"

另一次,她告诉我,她丈夫已经安排他从前的合伙人(正是同那些人一起,他才卖掉了所有的破烂货)给她一万克朗作为家用。"当然他们一点儿也不热心。"年轻女人讲道。她一边讲一边仍然摇晃着脑袋,"于是他从狱中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告诉他

们如果不交付那笔钱,他就要让他们都进监狱。所以,昨天晚上他们来看我,要我写信告诉他我受到了很好的照料。我不明白的是,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一切,可他还在……唉,你瞧,还在狱中。想一想,一旦他们放他出来,他将会是什么样子,他会认为自己是万物的主人。请帮帮我吧!”

“好啦,别发愁,”我仍然安慰她,“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是不会轻易放他的。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我们国家有哪一个人像这种情况只关押半年就被释放出来。”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她说,她的声音听上去突然充满了期望。“嗯,不管怎样,即使他们很快放他出来,我也承担得住。我不再理睬他那些蠢头蠢脑、莫名其妙的话。至于弗雷迪,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太小,还不懂事。他总是津津有味地倾听他父亲讲话,活像他父亲讲的是福音似的。那老家伙一出门,孩子就要模仿他。他坐在桌旁,对我喊叫,‘喂,母亲,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瞧他用的腔调!你知道他有次称呼我什么?‘蠢笨的老母牛’,他就是这样称呼我的,‘你想挨一巴掌吗?你这个蠢笨的老母牛!’这就是他说的话。就因为我没有把他掉在地上的汤匙递给他。一个四岁的孩子,对他母亲说话居然像这个样子,你说像样吗?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要把所有的人都关起来,因为他们都蠢笨,只有他和他父亲不傻。他将来的结局是什么呢?如果他再与他父亲生活在一起,他也只会变成一个罪犯啦!”

年轻女人擦干眼泪。“在这半年里,这孩子变了,变得非常听话,没说一个肮脏字,还帮我做家务呢。但愿把孩子的父亲至少再关上三年就好了!”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又带着期望,“律师说,情况真会像这样的,不知确实不?”

弗雷迪的父亲在狱中住了八个月后他们才开始审问他。

那天早上，她摇响了我的门铃。她穿了一套新服装，头发刚烫过。她握了握我的手，她的手很湿。“请为我祝福吧，”她以颤抖的声音说，“只是为了弗雷迪啊！”

两天后，因缺少证据被宣判无罪，那个恶棍回家了。是的，原告提出过上诉，可是——

实在令人难以相信！我问过我的律师朋友们，他们都记不清楚在最近五年、或许最近十年来，是否有过这样的事。现在却有了，被警察关了八个月，因缺少证据而被释放了。我的朋友们说，最少也应该给他一个同他呆在监狱里的时间相一致的判决。“我希望你明白，”其中一个律师朋友提醒我说，“他们就这样释放了他，决不是毫无理由的。我并不是说，他们已肯定地要他暗中监视你，也许他们只是想把他们信得过的人安置在你的身边。但是，一旦他开始为他们工作就……”

第二周，他又来拜访我，并带来一个珍贵的十八世纪的花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我随即表示，我不是瓷器收藏家，瓷器是不会在我家里久留的。约一周后，他又来找我，向我表白说，他已经用完了他的财产储备金，除此之外，当然啰，现在他必须小心谨慎，所以已经同以前的伙伴们断绝了一切联系；他肯定，我会有一些剩余的钱，而他却有宝贵的经验和一些重要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不能把我们各自的长处都集中在一块呢？”他保证，在一月之内我投资的每一克朗将获得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这个建议如此露骨！我想，它不是在着意寻衅也是太自作主张了！我告诉他，同我合伙只会倒霉，因为我是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的。

他好像很吃惊：警察怎么可能对我这样的人，这样一个没有

卷入古董生意的人，产生兴趣？他说，他要代我向温德林反映一下我的情况。温德林是他的一个朋友，现在是内政部长助理的秘书。

诊断室的门打开了，护士走了出来。

“我可以跟孩子的父亲说句话吗？”她对我说。

我站起来，她招手要我跟她走。

弗雷迪正坐在一个白色的矮凳子上，手已敷上了石膏。

女医生年轻迷人，我忍不住要多瞧她几眼。“维杰尔先生，”她严肃地说，“你的孩子表现出自杀的倾向，你意识到了吗？”

我点点头，对错误的身份屈从了。但在我心里却在寻思，怎样才能与她约会一次呢？呵，太诱人了，不仅是她那令人神魂颠倒的外表，而且还有搭乘外国船旅行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机会哩。

“你必须把他带去看精神病医生！”这位迷人的年轻医生说，“听着，你必须明白，不能有任何犹豫！只有那些精神病专家们才能够告诉你，为了制止类似的事再发生，必须做些什么！你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会重复，对吧？”

她走到我身边，为了不让弗雷迪听见，低声对我说：“你儿子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但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非常勇敢，给他正骨时眼都不眨一下。而许多成人却做不到，他们往往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

她身上散发出刚洗过的亚麻布气味。假若现在没有那个不可救药的骗子的可怜的后代在我身边，(那个骗子，让上帝原谅他吧！现在，他很可能正靠着搜集我私生活中的一些流言蜚语来赚取额外收入哩！)我一定要告诉她，她是多么迷人啊！我甚至可能问她，我是否可以在外面等她下班。然而，事实上，我只能对她说：“你可以信赖我，医生，决不会让弗雷迪就这样上天堂

的，因为我相信他注定要干一番大事。”我本来想说“他注定要犯罪”，但最后决定不说了，免得她认为是在给她开玩笑。

我们坐在车子里时，弗雷迪有兴趣地瞧着自己的手。“我回到家后，”他说，“我要用它来捶打我爸爸，然后把他扔出窗外！”

“听着，弗雷迪！”我连忙说，“我要求你永远不要再把任何人扔到我家的阳台上了！”

“不，不扔在阳台上！”他说，好像要我放心似的，“我要把他扔到大街上，这样他才会死！”

“你为什么想害死你父亲？”

“他死了就不会再逗我发痒了，”他解释道，“也不会再惹我妈妈发痒了。”

维杰尔夫人从她家窗户一看见我们回来，就急忙跑下楼，高声叫喊：“弗雷迪！”然后才对我说，“我发现门是锁着的，窗户被打开，你的阳台上有血迹！你干了什么事，弗雷迪？”

“没什么，维杰尔夫人，”我告诉她，“一切正常。”

“你干了什么事？”维杰尔夫人抽泣着，并没有从我的话中得到安慰，“我想，这个可怜的孩子害怕他父亲在我回家之前先回来。可是我告诉过他，我马上就会回来的啦！”她把弗雷迪紧紧抱在怀里，不停地抽噎。“你知道，妈妈爱你！没有你，妈妈就活不下去了！哎，如果你有什么意外，我也会从窗口跳下去的！”

我审视着抱在她怀中的弗雷迪。让我吃惊的是，他的眉头开始紧蹙，泪花滚滚而下！

他终于哭了！

星期二早晨

一个感伤的故事

星期二早晨约九点光景，电话铃响了。通常我一拿起电话总是先说出自己的姓名，而那些给我打电话的人却不一定告诉我他们的姓名。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监听我电话的总机员必须知道我这方是不是我在讲话，而不必知道另一方是谁在讲话。我常常就不知道对方是谁，这次便是这种情况。电话里的声音很陌生："我是莉达。请原谅，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的职业？"

"是的，你的职业。"

"好像你在调查什么而需要了解别人的职业，是吗？"

"不，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已听出那是有着一点外国腔调的口音。我迟疑了一下，寻思从前是否听见过她的声音。

"哦，我有好几个职业……"

"是你，米雷克，我听出来了，这是你在说话，"她高兴地打断我的话，"我要在这里逗留两天，我想见你。"

“你从哪里来?”我问。在寻思中,她的声音变得熟悉起来了。

“刚从伦敦来,但我住在纽约。”

“我明白了。你从哪里打来的电话?”

“我在温塞斯拉广场角落附近那条狭窄街道上的一家旅馆,好像叫奥尔克朗旅馆。这儿旅馆很多,连我都搞糊涂了。你明白我指的是哪家旅馆吗?”

“我知道。”

“你能来吗?”

“现在就来?”

“如果方便的话,现在就来。”

“好吧,一小时内我就会到达那里。你现在叫什么名字?”

“我……我在门厅等你。你很容易就会认出我,别人都说我一点也没变。”她像一个地道的布拉格姑娘那样在电话里开心地大笑起来。我终于知道她是谁了,而我们至少已有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

我是在上大学二年级时认识她的。那时我已发表了一两篇小说。尽管她比我小两岁,但已结婚两年多了,至少她是这样告诉我的。有趣的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的丈夫,也没有见到过她家里的任何成员;她从没有透露过她住在哪里,我也没有想过要查清楚。她在弗索维塞郊区的一家小书店工作。书店几年前就被收归国有,店主迈塞克先生也被送到煤矿去干活,但本地人仍然把它叫做迈塞克书店。我就是在那家书店里认识她的。最初我去那里是为了看书,后来是为了瞧她。现在我已忘记了她的模样,也记不清楚当时在那家书店里买了些什么书。我想,她相貌一般,有一双蓝眼睛,牙齿长得很齐整,就像莫妮卡·维蒂

(那时我还不认识莫妮卡,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的牙齿一样,并且戴一副金耳环。我不喜欢她的耳环,但她那对蓝眼睛却激起了我的欲望。

我认为必须先取得她的信任。一次,书店里只有我们两人。她走进后屋,给我拿出几本从书架上已消失了很久的书,有海明威的、斯坦贝克的,还有莫洛亚的书。这真像在荒漠上发现了一片绿洲。她借给我的那几本书,无疑对我了解现代文学有很大的帮助,远胜过学院所有的教授对我的帮助。可是,那时我还没能够体会出来。

大概是第十次光顾那家书店时(那时我已记熟了书架上和柜台上所有书的书名),我鼓足勇气问她,下班后干些什么。她回答说径直回家见丈夫。接着她又补充说,有时在午餐后她有多余的时间。

第二天午餐时,我们一起到附近的公园散步;第三天也一样。现在我当然记不清我们当时谈话的内容了。可是我记得为了给她留下好印象,我对她谈了我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我还向她宣传了我们的新社会。当时我正处在对革命理想和社会变革充满激情的年龄。处在这种年龄的人,往往把那些明智者视为不祥甚至感到恐怖的一切,仅仅当作不值得担心和忧虑的新事物开端的暂时困难而已。我希望她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美好时代,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革命已经解放了劳动人民,并结束了人剥削人的制度。

假若那时我对她的情况有一点了解,就不会那么炫耀自己。因为她和我不一样。她是从被监管者的角度逐渐了解我们美好的革命时代的。她父母的店铺被没收,她的一些亲戚被关进监狱,她本人被剥夺了上大学读书的权利。对她来说,这无疑是另

一种“解放”！

那时，我对有可能爱上的女人应该具备什么标准以及恋爱时应该遵守什么原则都有十分明确的观点。至少，我绝对相信，爱上一个已婚女人是不正当的。假若我当时遵守我的原则，我们的关系就决不会超越讨论政治和文学的界限。

我们相识大约两周后，她建议朝着波达莱克方向散步。她有两小时的午餐时间。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两小时似乎不够，但她满有把握地否定了我的意见，并且说明一刻钟时间我们就能到达那里。

那时波达莱克还是近郊的一片旷野。在温暖宜人的夜晚，它无疑是许多无别的地方可去的情侣们互相拥抱的好场所。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怀着同样的目的也可以在正午时刻去那里。恰如她所说，我们只用了一刻钟多一点就走到了目的地。那里寂无一人，像墓地一样幽静。偶而从远处的弗索维塞车站传来机车头的几声吼叫声。

我们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竟然可以遥望货车调车场。至今我还记得，那些铁轨车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光芒，远远望去，正在转轨的机车头小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正准备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斜坡上坐下来，准备就高尔基或者我们国家是否正在衰弱等问题发表看法，可是，我的同伴像十分熟悉此地似的领着我沿着林中小路继续朝前走，经过一道低矮的有刺的铁丝网栅栏，一直走到栅栏中断的地方。她要我跟着她走到栅栏里去。这片被围起来、未开垦的荒地如此小，我们仿佛置身于船舱里一样。我们躺在草地上，狂热地亲吻起来，还来不及去想我的道德原则，就已经狂热到开始做爱起来了。

对我已干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我最初是震惊，也许仅仅是

对她的行为感到震惊，因她是已婚的呀。我以为她会痛苦地哭泣，或者怨愤地谴责我。可是她很平静，脸上流露出满足、甚至是幸福的神情。

那时，我还没有别的情人，所以很快就消除了任何顾虑，让欲望而不是原则支配我的行为了。两天后，我们又再次去到波达莱克。从此，除了下雨天以及她每个月的生理期那几天，我们几乎是每天都去那里。我们这种关系只有一个目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的关系只有一个主题。

我们只在午餐时间相会，而且从来没有在其他时间一起去过别的地方。既没有去过电影院，也没去过剧院；既不去看展览，也不去进餐馆。我们经过的街道，或者说是疾走过的街道总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目的地总是那小块未开垦的荒地。那块荒地，我们把它称作“我们的小房间”。它的确是我们的小房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别的时刻也要使用这块地方。在附近的建筑基地上，我发现一张告示，上面写着：

闲人莫入，违者法办！

我把这张告示挂在有刺铁丝网栅栏裂口处旁边的一棵树上。这样，在我们的“房间”里幽会就更不容易被人发现了。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舒适的房间。没有屋顶，也没有水，无论是流动的水还是不流动的水；我们没有毯子，也没有被单。于是，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我都要带上雨衣(这让我母亲经常吃惊)，把它铺在我们下面。而她也带上一条很大的丝围巾，用它来掩盖我裸露的躯体(她的身体被我的覆盖住了)。但是在紧要关头，围巾总是要滑到一边，那时，我们的裸体就暴露无遗。

我们有一小时又一刻钟的时间做爱，在间歇时候就聊天。可是，在这种气氛下谈论有关生命价值这类严肃的话题似乎很不适宜。这样，我就成了她的听众。多数时候，我都听她简短地叙述前一天她做了些什么事，晚餐做的什么菜，她的丈夫乔又怎么对她发脾气，她为什么去看她的兄弟等等。从她所有的话中，她几乎没有泄露多少她家里的情况，或者她的过去。但我仍可以知道，不仅她已故的父亲是个书商，而且她还有一些亲戚住在美国，他们很富裕。她感慨地说，总有一天她要去看他们，然后不再回来，并坚信这是她不可避免的归宿。对她的丈夫，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更少，不知道他的长相如何，从事何种职业。在她的言谈里，有时他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粗俗的男人，有时又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有教养的伴侣。他可能是一个工程师，一个技工，或者是一个建筑师。每当我直截了当地问到有关她丈夫的情况，她总是哈哈大笑，并且说："我不知道。我想这对我们两人都有好处。"最后，我不知怎么会认为，她的丈夫也许正担任着某种重要的官职，从事着某种秘密的工作。这种猜想给我们的关系增加了令人激动得颤抖的神奇色彩。

有时她告诉我，她的前一个夜晚是在巴兰都弗夜总会度过的，在那里见到好几位电影明星。有时她说，星期天他们乘车去南波希米亚，一个昔日的实业家邀请他们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无论是哪一位电影明星，或哪一个实业家，在我看来都无所谓，因为我并不想认识他们。她的话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比如昔日的实业家们，怎么还可以举办盛大的宴会呢？

一天——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时常回忆起那天的特殊谈话——我们终于涉及到一个严肃的话题。她问我是否愿意到另一个国家去生活；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应该愿意。她说，假若我热

爱的女人住在国外,例如她正生活在国外,那么我愿意吗?

我回答说,她应该住在这里,我渴望她住在这里,因为我不仅爱她,也爱这个国家。我滔滔不绝地谈到祖国,谈到祖国的文化——我以为,她对我的说教颇感兴趣,甚至是有点激动地在倾听着。回到家后,我努力推敲她所提问题的寓意所在,突然产生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猜测:她的丈夫是一个外交官,不然她为什么要为他的身份保密?为什么同上层有联系?为什么可以出入豪华的宴会?现在这个外交官即将派到国外工作,她当然也要跟他同去。一种预感使我不胜惆怅,以致彻夜难眠,在床上辗转反侧。第二天,我向她提出几个我自以为十分巧妙的问题,企图搞清楚她丈夫的身份,证实我的猜测。然而,她识破了我的计划,什么也没告诉我。结果,对她的丈夫我还是像从前一样一无所知。

那年夏天,我的父母和兄弟到外地度假去了,留下我一人在家。他们离开后的第一天,我就劝说她到我家去,领会一下真正的房间的一切优越性。我们在林中的"小房间"是不能同真正的房间相比的。可是她不同意。她说,也许有人会突然闯进来,而在那块荒地她会感到更完全一些。她认为,在树林里那片荒地上的所做所为可以不叫通奸。她表示不可能绝对顺从于我,也不那么特别重视对我们之间关系的某种确认,好像确认相互关系的人比他们做爱更不道德似的。

"晚上到我家去如何?"我坚持地说,希望至少同她度过一个良宵,在黑暗中从容地拥抱她,从容地和她做爱,不必那么匆忙,在阳光普照下那样不断地瞧着手表。

"啊,不行!"晚上,她必须和丈夫在一起。于是我们仍然继续去波达莱克,而我的房间也只好空着不能使用。噢,幸亏那是

一个阳光明媚、天气和煦的夏季。只有一次，我们正在做爱时，阵雨骤至。我至今还记得，那雨点拍打着我裸露的臀部时，虽然又冷又湿，我却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亢奋之感。还有一次，一个小孩闯进了这块树林掩映着的幽静的荒地。我听见草丛中传来的沙沙声，把头从她的脸上抬起来，一个小孩已经站在离我们几步远的树丛下，由于枝蔓的遮掩我没法辨认是男孩还是女孩，但可断定最多是个五岁的孩子，我们互相注视了片刻，我急忙抓起那块可笑的丝围巾，企图遮掩我的裸体，可是小孩已转过身，哭叫着跑开了。到这时她才睁开双眼，抬起头来看了看。她只说了一句话："噢，那么大的小孩还不识字，看来那张告示对他是不起作用的。"

夏天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阴雨绵绵的秋季，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凉。我刚把雨衣铺在地上，马上就被淋湿了，为了不让母亲察觉，夜里我还必须悄悄地把雨衣上的泥浆洗掉。冬天一到，我们的"小房间"不得不暂时结束它的使命。我到书店去看过她几次，买了一些我并不需要的书，试图说服她同我一起去看电影，至少一起去吃午餐。她谢绝了我的一切邀请。她说，冬天总会过去，一俟春天到来，我们在"小房间"的幽会又可以开始。我要她发誓，因为我担心等不到春天来临，她就会把我忘掉。"不会的。"她不断地重申，要我不必担心，我们的幽会一定会继续下去。

几天后，我再次去书店看她，她不在。很长一段时间，书店里的人都不愿意告诉我她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许真的不清楚她的行踪，也许认为我是一个密探。最后，新来的经理暗示我，她到"山那边"去了。人们常用这个术语来指称那些逃离国家的人。

我不愿相信她逃到国外去了。整个春天，我不时焦虑地瞧着晴雨表，窥测正午时分是否会变得足够暖和、干燥，是否可以在那块草地上躺下。

然而，她一直无影无踪，仿佛已经死了。

两年后，收到她从美国给我寄来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因写着寄给“米雷克”这样的称谓而使我猜定是她寄来的。但它一点也不像私人信件那样具有相应的信函内容，又没留下可回信的地址。那时，我既无勇气给她回信，也无法给她回信。

现在，我终于从电话中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了。我迅速赶到奥尔克朗旅馆，我没能立刻认出她，她却一眼就认出了我。她从皮椅上站起来，微笑着前来迎接我。啊，她的牙齿仍然是莫尼卡·维蒂式的，没有戴我讨厌的耳环却戴着金戒指，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金制的项链。“嘿，米雷克。”她招呼我，接着吻了我一下。

她化妆得无懈可击，脸上竟然找不到一丝皱纹，比二十年前那会儿更加妩媚动人了。

我在她对面的皮椅上坐下来，我们面前的小桌上已经摆好了一杯酒。她问我可不可以也要上一杯，我婉谢了。因为我是驾驶汽车来的，不能饮酒，何况，不管怎么说也应该由我扮演东道主才不失体面呀。

“随你的便吧。”说着，她微笑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那诱人的眼波是否具有挑逗性，我一时难以判断。接着，她告诉我，她是随同丈夫为访问布拉格而来的，也可认为是出公差，程序表已安排妥当，因此，在深夜之前她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那么，不仅仅是午餐时间才有空?”我问。

她笑了。

“你的丈夫……还是从前的那一位吗?”

"从前的哪一位？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乔。"

"哪一个乔？"她困惑地问。接着，她明白了。"噢，他！我想，他是我杜撰出来的。我说过他吗？我不记得了。我的丈夫是美国人。"她解释说，"他从事大豆之类的粮食生意。枯燥极了。然而，可以走很多地方，挣的钱也不少。如果我愿意，每年都可以去欧洲或者澳大利亚旅行。"

"你喜欢吗？"

她耸了耸肩。"哎，我想总比读书强。你说呢？"她又向我投来那种意味深长的眼波，"你呢？结婚了吧？"

我点点头。

"有小孩吗？"

"是的，有了。"

"两个？"

"对。"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哟，是你具有超人的洞察力，还是你对我的情况已经进行过调查？"

"每个男人都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她解释说，"一半的男人都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多大了？"

我把两个孩子的年龄告诉了她，但并不是准确的年龄，可是谁在乎呢？

"告诉我，你忠实于你的妻子吗？"

"当然忠实。"我说。

"当然不忠实！所有的男人对妻子都不忠，而我们妻子也对丈夫们不忠。"她补充说，"你我两人就不必假装正经了。"她说话

的口气就好像我们一周前还见过面。不知是因为她喝了一点酒的缘故,还是她已熟练地掌握了跨越人际距离的技巧,至少在谈话中,这种技巧正是许多美国妇女擅长的。但她们或许并不知道,这种技巧无法使人们在心灵上更加接近。

“你生活得怎样?”她一边问,身子一边朝我倾过来,“你知道吗,你的变化不大,你的头发像从前一样浓密。”

“是的,”我说,“我的头发很好。”

“你怎么样?”

“很好,”我说,“像我的头发一样。”

我的回答让她困惑不解,于是她改变了话题。

“这里的天气真好。在伦敦,总是不停地下雨,整整两天我们被关在旅馆里,晚上才冒雨出去看了一场歌舞片,在皮卡迪利大街演出的一部糟透了的影片。你熟悉伦敦,对吗?”

“是的。七年前我去过那里,我也去过剧院。”

“你知道吗,”她说,“我曾看过你的一部剧作。”

“真的吗?”

“在国内看的,也就是说在纽约。我睁大眼睛寻找你,以为首场演出你会在那里出现。可是你没有。”

“我没去。对我来说,去那里是不太容易的。”

“也许如此,可值得去看。”

“可是我没有护照。”

“你没有护照?”她不明白。

“他们把我的护照没收了。不仅我一个人,许多人的护照都被没收了。”我解释道,“所谓许多人是指作家、记者、政治家等等。那幕剧怎样?”

“在纽约演的那个吗?”

“就是你看的那个。”

“我很喜欢。一个批评家说，这部剧作使他想起了迪伦马特[1]。喂，你的意思是你不能离开这里，也不能出国旅游吗？”

“嗯，也许我能，但那将意味着永远离开这里。如果是那样他们也许会放我走的。”

“那么，你又为什么不走呢？”

“我刚才已告诉了你，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她又耸了耸肩，“你仍然相信你从前高谈阔论的那些废话吗？”

“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已体现在我的剧本里。你没有发现吗？”

“我发现了。但我还是不能够理解你。”

“我们这里的生活很有趣，”我说，“况且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冒险家，你是知道的。假若什么事也不发生，作家会感到厌倦的。顺从会毁掉一个作家。生活在这里，会使人觉得自己就像惊险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暗淡的汽车前灯照射下，无论你的车开到哪儿，都有车跟踪；你一出门，就有人搜查你的房间；如果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他们也要在人群中偷偷地给你拍照，有时甚至是明目张胆地。”

“你已变了不少。”她说。

“是吗？”

“从前你总是非常严肃。实际上，过去你对人讲话时，就像说教一样，没有一点幽默。”

“这仅仅是自卫，”我解释说，“为了对抗我们生活中的

---

① 迪伦马特(1921—)，瑞士当代小说家和戏剧家。

荒谬。”

她感到疑惑,着实地看了我一眼。可是,就如往常一样,每当我准备详尽地描述生活中的荒谬时,心里就涌出一阵恶心的厌恶感,因而我不愿对任何事做过多的解释或者抱怨。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喜欢的亲戚和朋友。然而,对他们的幸福和安全我们都会加倍地小心。我们可以不必过多地考虑死亡的必然性,因为在这块国土上,不仅只是死亡才使人们分离,就是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由于畏惧某些东西而互相隔岸远望了。那些决心不向命运屈服的人,生活总会有那么多的坎坷,有的便不得不流亡他乡,就像莉达二十年前那样。我可能永远也不能再见到他们了。可是那些留下来的人,命运又怎样呢?

我有一个年龄比我还小的朋友,在学生时代曾被誉为捷克哲学界的希望。可今天却只是哲学研究所的夜间守门人。这个例子能不能算是我们生活中特有的荒谬?

还有我的前任主编,是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却充当商店橱窗的清洁工已整整七年了。我的另一位朋友,是著名的哲学家,现在正为地铁的修建挖隧洞。那位敢于上演我的最后一个剧本(也就是说,还能够上演的剧本中的最后一部)的剧院经理,因把我的一些禁演的剧本的手稿送到国外而犯下了弥天大罪,被送进了刑役营。这样,一些最杰出、最有创造性的人沉默了,而某些精神贫乏而最无创造性的作家和哲学家却正在受到吹捧和拔高。

他们毁坏了大量的书籍,禁止了许多影片上演,搜查了所有的图书馆。他们还取消了国际新闻,尽力在广播中塞满他们的节目,以便取代外台广播;以致把语言滥用到不再像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语言。他们还废除了教会、剧院、杂志、出版社、科学学

会以及其他文化社团，甚至把这座城市街道上的古老的鹅卵石都连根拔出。

这荒谬吗？尤其当你想到这已经是在数十年的和平时期的那时候。当然，这一切与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与以后形形色色的革命中的大屠杀、与毒气室、以及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相比，还算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的荒谬与其说是在于我刚才详细列举的那些个人的不幸遭遇，还不如说是在于这类遭遇的持续、积聚和令人恐惧的重复，在于它已扩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条缝隙，最后使你对生活中的荒谬习以为常，以至于即使你翻开《犬的新闻》的第一页，看见了关于人的革命的堂皇言论，你也会无动于衷。因为你已麻木得看到了空荡荡的虚无。你完全受它支配，你和你的狗都任凭它摆布。问题在于，这一切都无法表达出来。其实，但丁是完完全全地错了，他认为地狱和炼狱都可以被描写出来，这可能吗？

所以我只能对她说："你可以选择，或者放火自焚，或者取笑一切。"

"捷克人总是喜欢取笑。"她说。

"并不是所有的捷克人都这样。"

"哦，我知道，捷克人已经为了信仰遭受了火烙之刑，或者因抗议而做出牺牲。难道你没想过第三种选择吗？"

"什么选择？"我问道，尽管我心里明白她的意思。

"太简单不过了，离开这里。"

"我想，我一定会眷恋家乡的。难道你从来不思念生你养你的地方吗？"

"有时想。我们常常和别的捷克流亡者在一起聚会，一起追忆这座曾昌盛过的城市。"

“我呢？你想过我吗？”

“想过。还有我们的那个地点。你明白我指的哪一个地点吗？”

我点了点头。

“有一段时期，我们住在底特律，离铁路不远的一个地方。每当听见火车头的吼叫，我就想我是在做梦。有时我真的梦见那块地方，甚至你不必在那里。我幻想过，幻想我们在那片树林里，我躺在草丛上，望着天空。”

“瞧，”我兴奋地说，“我比你强，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去那里，当我感到怀旧之情不能控制时。”

“这样说来，自从那次以后，你又去过那里？”

“没有。为什么要去呢？你知道，人们只有在幻想和期待中，才会有甜蜜的回味。遗憾的倒是我不得不经常开车从那里路过，看看那依然葱茂的树林。”

她向我倾过身来，低声问道：“我们现在去那里，怎么样？快中午了，就像从前一样！”

我凝视着那张精心化妆的面庞，那件上帝才知道从哪家时髦商店买来的昂贵的裙子，竭力想象她躺在波达莱克树丛草地上的模样。

六月的天气，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正午时分，大街上，行人寥寥。

“见到你，我真高兴，”她在驾驶台旁边坐下后对我说，“我一直盼望能同你一起再去那里一次。”

车子发动后，我仔细瞧了瞧反光镜并探出头去看了看，试图发现我认为的正在跟踪我们的汽车。

“你在找谁？”

"没有。"

她靠近我,轻轻地吻了我一下,"像这样被人钉梢,你不感到忧愤吗?"

"一点也不,"我说,"在别的国家,最杰出的人才会享受到这种待遇。"

"难道你只能忍辱负重,是这样吗?"

"是的。如果我想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

"那么,即使他们把你视为草芥,你还是坚持留在这里吗?"

"这里是我的家,"我感到厌倦,"一个人需要有归宿。这种看法,你不觉得我像个心理不正常的人吗?"

一辆菲亚特汽车一直跟在我们后面,至少跟着我们走过五个十字路口。

"你把我带出来会遇到麻烦吗?"

"不,我想不会。"

"哦,这样就好。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而遇到什么麻烦。我想喝一口,你不介意吗?"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瓶酒,朝一个小玻璃酒杯里倒了一些。她示意我喝一口,我摇摇头。这不是喝酒的好地方。

"我还没有告诉你我生活得怎样。"她说。接着她开始详细地告诉了我她的生活。除了在纽约有一套豪华的住宅,她和她丈夫还在密执安湖上拥有一个岛屿,岛上有他们舒适的家,有两匹良种马,他们在瑞士还有一幢房子,在夏威夷还有……

那辆红色的菲亚特汽车不见了,现在跟着我们的是一辆白色的伏尔加汽车。在繁华的大街上总是有一两辆车子会跟在你的后面。

我问她去过哪些国家,她把在几个大陆旅行的概况扼要地

告诉了我。她一定耗费了不少的钱和大量的精力。假若这位腰缠万贯(我曾经和她在波达莱克树林中做过爱)的女人放弃自己一点点奢侈的生活享受,那节约下来的钱就能够使我从前的许多同事中的一个生存下来,并继续干他的本行职业,而不必当一个工人艰难地维持生活。她也许这样做过。假若她的确已决定把她的一些财产捐助给慈善事业,又为什么要用它来支援一个捷克知识分子?干嘛不把它送到印度,抚育一个可能会死去的小孩呢?

我们驶过那座铁路桥,转向崎岖不平的乡村公路,大道两旁排列着许多简易的小屋。最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她转过头,指着车后说:“你的车子后面有床毯子。你打算带上它吗?”

我回过头望了一下我们来的方向,现在不再有人跟在我们后面。或者说,如果我们被人跟踪,他们在最后一个转弯处就停了下来,不让我们看见。

“我们应该带上它吗?”我问。

我拾起毯子。多么荒唐,在这个今天已是房屋密集的地区。

一个穿着方格衬衫的男人,手插在工装裤口袋里,大步从我们身边走过,朝着树林方向走去。

我用了很长时间想把毯子折叠得像一条大围巾。

我们周围是一座座高楼大厦。这块曾经是旷野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建筑工地。两辆装载泥土的大货车,在那条通过我们的树林的留有车辙的路上移动着。

“告诉我,”她提出一个早就应该问的问题,“事实上你是靠什么生活?”

“我的剧本在国外的上演税。”

我们已走到那片树林,走在我们从前常走的小路上。

她的打扮与这里很不相称，就在昨天她还穿着这双高跟鞋和这身华丽的服装在牛津大街上漫步。

“你还能找到‘我们的小房间’吗？”

“我试一试。”

我们身后的建筑基地上传来起重机的声音，还有人粗声粗气地在向工人们下达命令。我突然想到，也许我们走错了路。一些树木已经被采伐了，剩下的树却长得让人认不出来。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了什么要坚持留在这里，而你的书却又拿到国外出版。”

“在哪里出版并不重要，”我告诉她，“重要的是你写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你写什么呢？”

“关于这一切！”我说。

有刺的铁丝网栅栏已看不见了，当然也没有看见那张告示，灌木丛消失了，树林已一览无余，我们能够清清楚楚望见对面。有几个退休人员正坐在对面的长凳上沐浴着阳光。

我们只好转身往回走。“也许不是这条小路，”她说，“让我们另外再找找吧。”

“所有的路都不像，那块地方已不存在了。”

“好啦，我们决不会就此罢休的！”

“你不应该离开这里。”

“我是不得不离开的。”

“为什么？”

“我……我就是不能在这里生活。”她停下来，伸出双臂。我们紧紧地拥抱，两张热乎乎的嘴互相吮吸。有人从我们身后的小路走来，是那位穿着方格衬衫和工装裤的男人。他的脸上带

着那种像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漫不经心的神气。

“你想念过我吗?”

“当你突然失踪后,我时常思念你。”

“我给你写过好几封信,可是一封回信也没收到。”

“不对。我只收到过一张明信片。”

“真的吗?”

“这并不奇怪,”我解释,“他们扣留了你的信件。”

我们朝汽车走去。

“到我的旅馆去好吗?”她深情地说,“我的丈夫今晚很迟才会回来。”

“你敢肯定吗?”

“他今早乘的飞机,我想,是去了布尔诺。”

“干那种事那可不是一家好旅馆。”我告诉她,“恐怕他们监视着所有的客人,而且会在房间里安设窃听器。”

“你在开玩笑!”

“没有,我向你发誓。”

“啊,这真叫人难以相信!”她在驾驶台旁边坐下后又接着说,“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别的旅馆,”她温情脉脉地柔声低语,“我们可以用假名登记,如果你害怕的话。”

“不行,我们不能啊。”我十分懊丧,“无论你去哪家旅馆,你必须在登记台交出你的护照或者身份证。他们将记下你的姓名,把你活动的详细情况送到秘密警察局。不是我胆小怕事,我很了解他们惯常的手续。”

“那么,”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刚才不是说,你是一位伟大的冒险家,对吗?”

我怎么向她解释呢?我只好说:“你瞧,以前我们从来不去

旅馆,那么现在去有什么意义?”

她默不做声。

“很遗憾,”我沮丧极了,“我们找不到原来那块老地方。”

“不管怎样,你把我带到那里去过了,我仍然很高兴。”她又振作起来,“我将永远记住我们这次短途旅行。你是知道的,有时我的确想念家乡,每当我独自在家时。那座很大的住宅,一共十二间房子,经常只留我一人守家,就只有我的狗陪伴着我。”

“没有小孩吗?”

她摇摇头。“房间宽敞空旷,尽管里面摆设了不少东西。我丈夫热心收集早期艺术家的作品,我们的墙上到处是假面具、盾牌、绣花裙子和图腾。我们经常邀请一些人来我们家,天南海北地闲聊,谈艺术,谈文学,也谈他们旅游中的所见所闻。我们开怀畅饮啤酒或者烈性酒。可是到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后……算啦,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做了一个不忍心再说下去的手势,接着从手提包内拿出手帕,把眼泪擦干。

我们回到她住的旅馆时,我邀请她:“我们一起去吃午餐怎么样? 你愿意吗?”

“不。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她回答,“现在这样做不会有意义。”

我同意了。

“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她说,“我想问你一件事行吗?”

“当然可以,请说吧。”

“你不会认为你在国外不能生存吧?”

“不,我不会这样认为。”

“也不会认为在国外更不自由?”

“完全不!”

“你刚才说过,你认为他们会让你移居国外,是吗?”

“是这样。但我也告诉过你,我为什么不想去。”

“哦,算了吧,那并不是你真正的理由。你现在能告诉我,你不想离开的真正的原因吗?”

我迟疑了片刻,然后说:“不,我不能。”

“你了解你自己吗?”

我可以向她重复: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因为在这里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我一样;因为这里的人们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更因为我愿意继续写下去,作为一位作家便意味着紧密关注人民的命运,不能漠视它,应该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辩护,表达他们对自由和对一种更具尊严的生存方式的渴望。这一切都要求我留在这里,留在我生长的地方。虽然这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把我卷进去,但我因此而能够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理解。

对在国外能享有的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并没有参与去创造它,因此也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正如我不可能感受到他们国家的悲哀一样。如果我去国外生活,只会浪费我的时间,虚度此生。

我还可以对她说:我喜欢在布拉格大街的鹅卵石上漫步,那些街名使我想起这座城市的古老历史,我熟悉并理解它的历史。

同样我也可以改变一种立场对她说:“我个人已无属于任何国度,我的国家已不存在,就像树林中的那块地方已经事实上消失了一样。我热爱的语言已被亵渎,各种各样的精神财富已被毁掉,布拉格大街的多数街名已改变了,这座城市事实上正在毁灭,就连大街上的鹅卵石也要被拔出来,运往荷兰用于修造

堤堰。

生活正是这样，它只让你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和两种绝望之间进行选择。你所能做的，也只是从两者之间选择你认为比较容易忍受的，比较吸引人的，使你至少能保持一点自尊的。

我可以给她许多赞成和反对的理由，可是她将愈发不会明白。其实，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因此，我给她的最后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

星期三早晨

一个圣诞节阴谋团伙的故事

星期三早晨，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四点一刻就起了床。睡觉前我把闹铃拨到五点，可一想到那么早就得起来，自三点起就再也没睡着。我拖动着步子来到饭厅，饭厅有一扇朝北的窗户，窗框上挂着一支寒暑表。我用手电照了照上面的刻度，看见水银线只比冰点稍高一些。天气真够寒冷的，我实在不想领略在户外站八九个小时，还要把手一直浸在冷水中的滋味。然而，在这样的时节，这天气还不算太糟，我实在不应该为自己的命运悲叹——天气本来可能还会寒冷得多。

妻子和孩子们正在酣睡，我给自己做了早饭，就在厨房里吃了。然后我穿上两件绒线套衫，一件防风上衣，三双袜子。有了昨天的体验，我倒很想穿它四双。但是，我的靴子太小，怎么也伸不进穿四双袜子的脚。

我是受了彼得诱骗才去干那桩生意的。彼得是我从前在学院里的同事，他是美学讲师、文学评论家和语言学家。然而，这三年来，为了谋生，他先是在一家建筑公司的仓库当守夜人，随

后又当司炉工。这期间，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终于发现，靠诚实去卖苦力连勉强维持生活都不可能。于是他决定不干了，去寻求别的更能赚钱的生路。

我至少有半年不知他的音信，可是一周前他给我打来个电话，对我的工作和身体寒暄一番后，接着便谈及一个实际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去卖鱼？"

"我愿不愿意干什么……？"

"卖圣诞节的鲤鱼，"他解释说，"你可以因此而赚一大笔钱。"

"噢，可是我……"这个建议完全出乎意料，我几乎没有机会推辞，"说实话，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

"当然你没想过，"他继续说服我，"谁会想过呢？可你是一个作家，应该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事。"

"我可不是那种必须体验一切的作家。"我反驳道。

"你当然是！"他回答说，他的声音里带着他过去职业的权威口气，"不管怎么说，你会搞到很多钱。你总不会说你不需要钱吧，既然圣诞节快到了。"

"可你知道，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杀过一条鱼。我真的干不了。"我补充说，希望这事就此了结。

"哦，这方面你不用担心，"他说，"让我来剖鱼。那不过像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就只干两三天，你至少可望带两千克朗回家。"

一小时后，他已在我的住所，继续兴致勃勃地谈他要我参加的那项工作。去年，他从前的一个学生在白天鹅商店外面卖鲤鱼，四天就赚了一万克朗，还免了税。就算我们找不到那样好的地盘——因为那个地方要价肯定很高——但我们最低限度也要

赚上两三千。当然，他解释道，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像样的摊点，我们首先得向某些人行贿。

这时我才明白他的意图。他的主意很妙，他愿意自己干脏活，甚至剖杀鲤鱼，但需一个有些本钱的人做他的同伙。

“要多少钱？”我问。

彼得一只眼是斜视。此时，他的两眼正瞧着不同的方向，我觉得有点可疑，他没有一只眼是在看我。

“要多少？”

“地盘大约要五百，”他回答说，“给管理鱼的人一百。我们将在超级市场门前摆摊，因此，还要给市场经理一瓶白兰地。”

“投资真不少。”

“我们付出的愈多，赚回来的就愈多。”他向我保证，“我已经在斯特拉斯尼塞找到一块很大的地盘。”

“为什么要把钱送给管理鱼的人？”

他解释道，假若你想赚到钱，就必须卖好鱼。他从前的那个学生——就是在白天鹅商店外面卖鱼，赚足了钱好去印度的那位学生——曾经告诉他，有个家伙忽视了管理鱼的人，后来那个管理鱼的人只是叫喊一声：“斯克鲁杰先生卖的鱼！”于是士兵们便打开了另一个鱼柜，里面的鲤鱼看上去更像是鲦鱼。

“士兵？”我对这笔交易中的新成员感到纳闷，“什么士兵？”

“哦，当然是那些看守鱼柜的士兵嘛，”他用不太肯定的口气说，“他们告诉我，那里有士兵。这有什么稀罕？”

关于士兵这件事，我根本就不相信他。说内心话，我不想干倒不是因为他准备向我要八百克朗。我实在不能想象从早到晚站在大街上、身旁是装满鲤鱼的鱼柜是什么滋味。何况，我并不是特别需要钱，我有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在银行里还有点储蓄。

凡事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不能期望赚得更多。因此对这笔外快我实在不感兴趣。除了把它遗赠别人，我不知道拿它来干什么。如果你想施舍，那么你自己的钱就决不会够。但是，为了那个高尚的目的，二千克朗的数额似乎又显得可笑。

确实，我的一些朋友都关在监狱里，他们都是危险的颠覆分子和阴谋家，假如你愿意相信那种起诉的话。他们应该在监狱里呆下去，而我们却享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这种自由甚至允许我们选择是愿意卖鲤鱼还是不愿意，这不过是俄罗斯轮盘赌中的一部分，这种命运已把我们玩弄了三十年。

监狱里的一个朋友，曾经是我在一家文学杂志编辑室的同事，那时这些杂志还允许在这个国家发行。圣诞节将是我去看望他妻子并带给她一点钱的合适的日子。

于是我借给彼得八百，他兴高采烈地走了，答应一切由他办理，包括定购鱼。

四点四十五我已准备停当：洗了脸，刮了胡子，吃了早餐，穿上了三双袜子和一双长筒靴。走前，我还想浏览一下昨天报纸上的体育栏。可是，圣诞节前后一般没有多少体育活动，而且众所周知，不论在哪个时令，报纸上的其余版面都没有什么有趣的新闻。

五点钟时，我已走进了寒冷的清晨。薄雾里有股烟尘、硫磺和令人不快的气味。很快，我们都将窒息，灭绝，正如我们已在大多数河流里把许多鱼都毒死了一样。留下来的只是几个挑选出来的鱼塘里一些半死不活的鲤鱼。

昨天是我们当鱼贩子的第一天。我们在天还是黑沉沉的时候来到约定地点。微弱的灯光照着超级市场，门前放着一个大鱼柜，里面装满彼得在前一天采购来的鲤鱼。市场经理是一个

粗壮的灰发家伙,穿着考究的服装。他友好地招呼我们。他的友好当然是因为事先已得到了一瓶白兰地。他帮我们从贮藏室里搬出木柜台,然后又拖出一台陈旧的磅秤。当我们试图在那个复杂的装置上校准刻度时,他却满有兴味地在一边观望。过了一会儿,他把我们推开,熟练地调试了一下,乐滋滋地向我们保证,现在可以仰仗它给我们每公斤百分之五的额外收入了。他进一步指点我们,把鱼甩在秤上时,一定要尽可能地多带些水——"除非顾客指出秤上有水,否则不要擦掉"——然后在刻度标尺刚翘到最高点时,就赶紧把鱼抓起来,同时要注意不让滑尺放在整数和一眼就看得清的刻度上,诸如一公斤或者一公斤半这样的刻度。我们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他一时高兴,又教给我们一些有用的知识。不用说,我们应该把价格四舍五入到最接近整数的数字,如果有可能就常用九,这是所有整数里面最让人觉得合理的数。然后再另外多增添几便士,这样看起来就更容易叫人相信。讲完后,他又给我们做了示范。他把手伸进柜里,捞出一条鲤鱼,把它扔到刚调好的秤上。一公斤十九克朗,然后为了装装样子再增加几便士——比如,十九克朗六十便士。顾客一般都付一张大面额票子,不要那点零头,这样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得到二十克朗。经理兴致勃勃地继续启发我们,有时也许会遇上心不在焉的客人,你甚至可以把价钱报得更高些,比如二十克朗二十便士。碰上这种情况,顾客总是要你找零头。假如找不开,你就可以宽宏大量地说:"不要紧,你给个整数吧,明年圣诞节再补给我也行。"这样做不仅显得很大方,而且顾客通常会迟疑一下,在二十克朗外再给你一克朗或两克朗的小费。这样,把在秤上赚的钱计算在内,你就能在一条价值十七克朗的鲤鱼身上多赚三四克朗。

看见我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经理显然以为我害怕了，于是他转向我，要我放心，没什么可怕的。顾客大多数都是女人，她们一般不太注意秤上标出来的重量，更不能计算价钱。当然，我必须很熟练，要运用心理学：注意观察顾客，与她聊天，让她感到她不是在买东西，而是在赴一个约会。至于男人，却要小心提防！经理在把这些经验传授给我们时，嘴角上始终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好像他并没当真，只是在闹着玩，表演给我们看看而已。

"可是，你一旦告诉顾客价钱时，就必须严肃起来。有时，这样做是便于道歉，你可以声明把价钱算错了，为了顾客的利益马上纠正。"

他指着磅秤(那条值十七克朗的鲤鱼还在秤上翻来滚去)，生动地向我们表演他的这种方法。"太太，二十三克朗六十便士。"他说着很利落地抓起那条翻动着的鱼，转身朝着我，"哎呀！请你原谅，请等一下。"他把那条鱼重新扔到秤上，又迅速抓起来，脸上呈现出万分负疚的表情，让人觉得任何对他道歉的诚意抱有怀疑，或者尽想着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之类卑劣的事而亵渎了这个真诚时刻的念头，都会伤害他作为一个商人的正直和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瞧，"他叫道，"太太，我差点让您吃亏。只有二十二克朗十便士。"说完这番话，经理便把那条不幸的鲤鱼扔回那个装满了它的难友的柜里。那些鱼遵照造物主的旨意，张着愚蠢的嘴，尽管对它们喉咙里丁当响的硬币漠然置之，但正是为了硬币，它们将被捞出来，被屠宰，被欺骗性地卖高价，最后被吃掉。

我从乘客不多的公共汽车上下来。才五点半，这意味着我在不可避免的八小时挨冻外又额外增加了半小时。街上冷清清

的，偶尔走过几个睡眼惺松显然是很性急的行人。我打老远就看见了我们的鱼柜。昨天的生意并不很成功。虽然有大批女人拥进超级市场，买走了从糖到肥皂粉的一切，好像失去了理智一般，但让我们大为沮丧的是，她们似乎一点也不急着购买圣诞节的鲤鱼，也许是她们那装得满满的购物袋里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了；我们只好在商店外无所事事地挨冻。直到接近中午时，几个退休老人和家庭主妇才对我们提供的货产生了兴趣。我称秤，收钱；彼得既当捞鱼人，又当屠夫。他把看上去好像还活着的鱼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秤上。老太婆们信赖地站在旁边看着，那些年轻一点的女人跟我说上几句话，有的甚至还同我调调情，差一点让我忘记，我是在这里卖鱼，不是在与她们幽会。我一边要着嘴皮子，一边手不停地过秤，并把重量换算成价钱。由于我缺少必要的胆量，玩世不恭的态度，敏捷的思维，那些四舍五入化成整数的方法，我一直不敢运用。

那些女人离开后，我们又被冷落在严寒中受冻。彼得开始向我讲起哈谢克的写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接着，他很快把话题转移到卡夫卡作品中动物的象征性（显然他是受到我们身旁一大柜动物生命的影响）。彼得指出，在卡夫卡那里，人总是可以变成动物，但动物决不会变成人。按照彼得的观点，动物永远都是令人厌恶的、污秽的、腥臭的东西，比如老鼠、田鼠、猴子，甚至昆虫。彼得没有说鱼是否也包括在内。

我们闲扯了一会儿，互相都觉得在寒气逼人的境地议论这种话题似乎太严肃了。于是，我们就假装是阴谋家，成功地迫使政府服从我们的指示（究竟靠什么方法取得成功，我们目前还不能具体说明）。我们命令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限制警察的权力，实际上不让其再拥有这种权力。我们一致同意，将不审判任

何人，这样就可以永远消除无止境的循环报复，而报复只能产生新的受害者。最后我们开始拟定出版计划，所有受禁的作家自然包括在内。我们决定首次就出版八十本书，可是，眼前的事实提醒我们，我们卖出去的鲤鱼总共才八条，远不及我们阴谋活动的成就那样令人鼓舞。

下午两点，我们"关店"半小时，到超级市场后面的贮藏室去饮一杯加朗姆酒的热茶。这是三个年轻店员中的一位遵照经理指示为我们准备的。她名叫达尼娅，听起来有点像外国的名字。她有张典型的斯拉夫人的脸，扁平的俄国式的小鼻子，头发兴许有点红，可你也说不清，因为她最近才把它染黄了，自然那是为了迎接圣诞节的到来。

达尼娅小姐陪着我们呷茶。她的小手举着一个大杯，显得很可爱。她慷慨大方，让我们尽兴畅饮朗姆酒。在这个商店后面的贮藏室里，有她在一起我们感到真惬意。我的朋友仍然忘不了他的旧职业，给我们介绍了许多名作家的轶事。他们要我也为这次愉快的聚会助助兴，于是我给他们讲了我与一位前总统会面的经历。我觉得那位超级市场的年轻女士并不在乎那位总统叫什么名字，而似乎只对同我这个曾与一位总统有来往的人来往感到激动。她一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频频向我投来她显然自以为颇有挑逗性的眼光。

第二天，一来到我们的卖鱼摊，我一眼就看见鱼柜周围淌了一大摊水。我踮着脚尖趟过这摊水，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急忙朝柜里察看。

已漏光了水的容器里，无数个张着大嘴的鱼脑袋，从一大堆鱼的躯体中间冒出来，鼓起眼睛看着我。一些快要断气的鱼还在痛苦地抽搐着。

我一时惊慌失措。柜里肯定装着价值八千克朗的鱼。彼得在所有的预算里，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鱼会全部死去的可能。我马上想到，对这场飞来的横祸，我是否负有任何责任。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做错了什么，或忽略了做什么。我只好脱下防风上衣，卷起套衫的袖子，尽力抑制我对鱼的厌恶，把手伸进那堆正挣扎抽搐的鱼中。我很快就摸到了孔眼，水就是从那里漏出来的。我至少又花了一刻钟的时间（或者我觉得有一刻钟）才摸到塞子，还是在那堆鱼下面找到的。然后，我用尽吃奶的劲把塞子插入孔眼。鱼柜里剩下的水现在不会再漏出来了。

问题是我无法使鱼柜重新装满水。我在垃圾箱里翻到一个纸杯，试着用它把地面上的水舀起来，但结果却是白费气力。

我扔掉纸杯，跑进大楼。超级市场就在这幢大楼里。这辰光，店门自然是关着的。我蹑手蹑脚地从那些住房门前走过，试图聆听房门是否有动静。

除了邮递员传送电报之外，只有“他们”要逮捕人时才可能在早晨六点钟去按陌生人的门铃。现在我才懂得，凡是干那种行当的人都必须厚颜无耻。

我跑到地下室，希望找到洗衣房。

的确，那里有一个洗衣房。从上了锁的门外，我甚至能听到水龙头的滴水声。我从口袋里取出一串钥匙，徒劳地想把门打开。一想到那些快断气的鲤鱼，我顿时有了勇气。我用肩猛撞门，然后又对着门踢了几脚。

这时，楼上传来的脚步声让我吃了一惊。就算不指责我这种举动是流氓行为，我要对付的控告已经够多了。

当我悄悄地走回来时，我看见黄发的达尼娅手提着一桶水轻快地朝鱼柜走去。“这些烂柜子”，她向我解释说，“这里的一

切东西都腐烂了。我们的冰箱每月至少要坏一次，经常是在星期天。到了星期一早晨，我们就会发现地板上到处都是冰淇淋糊糊和菠菜腐烂的液体。防盗报警器也坏了，如果有人碰巧晚上从商店窗户前走过，报警器就会狂叫不停，几乎要把死人吵醒。然后警察闻讯赶到，把经理从床上叫起来，要他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被盗走了什么东西。”

我们不停地提来水倒进鱼柜里，达尼娅一直在报怨腐烂的超级市场，在这里一个钱都不能多挣，所有的货运到这里来时就已经包装好称过重量了。咖啡是你唯一能得到一点实惠的食品，可你还得有空袋子来装咖啡。她的前任弄到一些图泽克斯制作的袋子，她用这种袋子来装研磨机下面剩余的咖啡。她挺有耐心地装满那些图泽克斯特制的黑袋子，随后把它们一直带到弗索维西，挨家挨户地卖掉，换成捷克克朗和图泽克斯配给票。她又用配给票买到地道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然后把酒带到店里来卖，每瓶约卖两百克朗。最后有人告发了她，她只好离开这里，被安置在霍斯蒂沃一家药店。现在她向顾客出售的不是咖啡，而是熟石膏；卖出的不是威士忌酒，而是地道的南波希米亚葡萄酒。

当我的朋友，同时也是造成我一切不幸的祸根出现时，柜里已有足够的水使一些鱼的肚皮朝天，好像要表明它们的死亡是不幸的。

我们把所有的死鱼倒进一个提桶里。经理刚到我们就问他，如何处置这些死鱼，怎样才不违反卫生规则。

他朝提桶里扫了一眼，一点也不惊奇，仿佛是他本人在夜里把塞子拔掉的一样。“多少?”他问。

“我想是十六条。”我的朋友回答说。实际上有二十条。我

猜测，彼得可能认为虚报死鱼的数量，就可以使我们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你想是十六条?”经理嘲笑地重复彼得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你现在打算把它们扔出去，是吗?”

“哎，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经理的脸上终于露出惊讶的神色。“有什么别的办法? 有什么别的办法? 哈，我们取出它们的内脏，把它们切成片，当然啦，要以更高的价把它们卖出去。”

就这样，我来到温暖熟悉的贮藏室，系上围裙，拿着屠夫的刀，身旁还有黄发的达尼娅做帮手。我站在房间后面的一张旧长凳旁边，认真地摆弄着这些死鱼。我的前面是一堆堆装满葵籽油瓶的箱子。这些箱子使我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这是一间宽大的贮藏室。房间里充满了香料和肥皂粉的气味。对面的角落里，一个盖上有铰链的大板条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知道可以用它来装什么样的货物。

达尼娅小姐从我和像堵墙似的箱子中间挤过去，她的双乳轻轻地擦过我的背。她高兴得咯咯傻笑，并且说，换来干这样轻松的工作真是滑稽极了。

在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取过鱼的内脏，我仔细地观察她，她那柔软的手指握着刀把，切开鲤鱼灰色的肚皮，小心翼翼地取出内脏。

“你是干什么的?”她问我，“去年圣诞节，我们这里来了许多学生。可你不是学生，对吗?”

“对。我许多年前是一个学生。”

“你昨天讲的关于那位总统的事，还记得吗? 有许多是瞎编乱造，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敢在胸口画十字吗?”

“确实不是瞎编乱造的!”

“谁相信你!”她把鱼片扔进一个马口铁碗里,“他们称呼你什么?”

“伊万。”

“这名字不怎么好听,你说呢?”

“哦,我想,他们给我取这个名字时并不这样认为。”

“我也不怎么喜欢我的名字。”她承认道。

“那么,你喜欢什么名字?”

“露西娅。这名字不是很好听吗? 露西娅·梅索普斯托娃。”她用柔和的语调回答。

“其他方面,你是满意的吗?”

“你指的其他方面是什么?”

“你的命运。”

“命运”这个词好像让她感到有趣。“说下去。”她说着走到洗脸盆前洗了洗手,然后拖过一把椅子坐下,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一盒雪茄烟。她递给我一支,我谢绝了,告诉她我不会吸烟。“那好,你至少可以坐下来,行吗?”她从那堆木箱上取下一个,放在她椅子的对面。“我用不着告诉你,我很愿意在蔬菜水果店或是汽车加油站工作。”她架起双腿,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虽然我们的腿还没有接触到,但是就连一只老鼠也不可能从我们的腿之间挤过去。很明显,应由我来彻底消除剩下的那点距离。“说下去,”我说,“你不在乎汽油味吗?”

"在乎？你知道那里一月能挣多少钱？"

"不知道。"我坦白地说。

"一万，假若是在两个城镇之间的加油站的话。其他地方至少八千。"

"你在糊弄人。"我怀疑地说，"不管怎样，这么多钱你用来干什么？"

"老天爷！"她喊道，"你会吃惊的。"

"好吧，那么你为什么不到一个加油站去工作呢？"

"你在开玩笑吗？"她轻蔑地瞥了我一眼。正在这时，门咯吱地响了一声，接着传来经理的喊叫声，"达娜[1]！那些鱼怎么样了？拿一些鱼片到这里来！"

达尼娅小姐从椅子上跳起来，灭掉手中的烟，抓起装有六片鱼肉的碗，朝门口走去。

我站起身，拾起一条死鱼，切开它的肚皮。我很想知道彼得在外面干得怎样了，但是我又实在不愿离开这个温暖的避难所，哪怕等一会儿我还是必须出去。如果让一位朋友在大街上受冻，而自己却同女营业员闲聊，这是不太公平的。

达尼娅回到贮藏室。"他说，我们最好快点。有一大群老太太在外面等着。"

"我在尽力干。"

"行啦，"她说，"滚她们的吧！"

说完，她重新开始我们刚才的谈话。"如果事情有那么简单，人人都会在加油站工作。你知道我要付出多少？最少都要二万五千，而且，他们仍将把我安排在贮藏室工作一年，在那里

---

① 达尼娅的昵称。

我什么都赚不到。如果他们把我解雇了，那怎么办呢？倘若收了我贿赂的经理倒了霉，又怎么办呢？那时，我又得到处去付钱。”

“那么，蔬菜水果店怎么样？”我问。

“一样的。”她沮丧地一边说着，一边又切开一条死鱼。她问：“你不会什么也没付就来到这里的吧？”

她抬眼望着我。

“当然不会。”

“你靠什么手段谋生？”她又问。

“你猜！”

“我怎么会知道。你不是学生，又不是手艺人。也许你曾经进过监狱，对吗？”

我耸了耸肩。

“我明白了。”她说，点点头表示她已经懂了。

“你猜他们指控我什么？”

“指控？你是说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进去？”

“对。”

“做黑市交易？”她在瞎猜。

“不是。”

“贪污？”

“也不是。”

“要不就是你在小酒店里张着嘴胡言乱语，说了一些你不应该说的话，对吗？”

“这个，嗯……”我支支吾吾地回答。我可不愿意撒谎。

“他们给你判了什么刑？”

“没什么。”我说。然后我摇了摇手，表示不想继续谈这个

问题。

“我知道，”她说，“我姐姐被判了两年苦役。她曾在一个火车站工作。她也是什么都没做过。只是因为她知道当时发生的一件盗窃行为。我父亲被判了六年，但我什么也记不得了，那时候我刚出生。判他刑是由于他经营过一个商店。他出狱后对我们说：‘我一生中从未偷过一分钱，我告诉你们，我是一个大傻瓜！’”

“你父亲现在干什么？”

“他退休了，”她说，“退休之前，他管理一家小卖部。可是他从来也没学会做事的诀窍。我父母就是那种不知道事物还有真相的人。”她把一条剖好的鱼扔进碗里，继续说：“你知道谁掌握了做事的诀窍？他，在那边。”她朝商店指了指，“我们的经理。他过去从巴德乔维塞屠宰场往各处运送肉。他们总要为自己留下四分之一的货，然后再把其余的交付出去。一些人变得越来越贪婪，想一半一半地平分。嘿，我们这个经理比他们聪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于是他离开了，而他的那些哥们又继续干了一年，接着他们发了狂，开始买房子和豪华时髦的外国汽车，结果都被关进了牢房。那时候，我们的经理已在布拉格，同啤酒厂的一个小伙子合伙运送啤酒。他仍然像过去那样，决不拿得过多。他太聪明了。他从每辆货车上只取走几箱啤酒，就是这样也已足够让他们每人每天得到一百克朗。后来他对整天开车感到厌倦，就在这个超级市场里找了一份工作。他在这里已经五年了。你认为这些年来他亏损了吗？一点也没有！”她伸出食指，强调在她老板的经营下是不会亏损的。“他收买了总公司所有的人，所以，他总是能提前一周知道，盘点存货定在何时，这样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出其不意抓住他。他还不断地讨好我

们。"她结束了对老板的赞扬。

"还要点茶吗?"她问,"我想你的朋友也想要点。"

她朝炉子走去时,不得不再次从我和那些在我背后形成一堵高墙的木箱子中间挤过。我把身子朝后倾了倾,这个狭窄的空间,像陷阱一样,使我很容易地捕捉到了她那柔软的身躯。

"哟,伊万先生!"我听见她轻声地抗议,"你想干什么?"

我想,我也许应该迅速转过身去亲吻她。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的手沾满了鲤鱼的血,仅用围腰把手擦一下,作为一次做爱的序幕似乎不合适。我还没来得及决定该做什么,更谈不上行动,我的脸上就感触到了她那潮湿的姑娘气息,听见她悄声低语:"现在不行!如果你想要,我六点钟等你,那时商店就关门了。"

这时我们听见从商店传来一阵喧闹声,声音愈来愈响。我急忙往外走,达尼娅也把水壶放在长凳上,我们一起跑进超级市场。

在货架之间,站着一个形容枯槁、面部丑陋的老头,下身穿一条大得可笑、膨胀如袋的裤子。一只手拿着一根金属手杖,另一只手拿着一条鲤鱼。他本来就红润的脸现在由于愤怒而涨得更红。他正在高声叫骂。我听了一会儿才逐渐明白,他刚才在我们这里买了一条鲤鱼,回到家后又称了一下,发现他受骗了,至少多付了两克朗。

我吓呆了,觉得自己就像在某个百万克朗的诈骗活动中被人捉住似的。

经理却像平时一样镇静自若,满脸微笑。他主动提出把鱼重新过秤,另外换一条鱼,或者,这位老人索费多少就归还给他多少,谁都会有过失,不过他的确记不起什么时候有人抱怨过他

们的过失。但那位老人不愿放弃这一犯罪证据。也许他的兴趣并不在于要找回他的钱，而只是想对着我们吼叫，当众大闹一场。经理挽着那老家伙的胳膊，轻轻地推着他过了结帐处，走出商店，一边走一边奉承他(我惊奇地发现，我是多么佩服他的泰然自若)。他请求老人平静下来，考虑一下他这位经理的清白名声，并再次建议，顾客可以把鱼重新过秤，就在这里也行，假若不信任我们，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复秤。

“你说得完全对，我不信任你们！”老人叫喊着，“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再称一下。”说完，他拖着步子离开了。

达尼娅的黄头发靠近我，我再次闻到她的气息。她向我解释，这位爱发脾气的老人是冯德拉切克先生，他买回家的所有东西，都要在自己的秤上称一称，甚至罐头也要称一下，然后返回商店大吵大闹。商店里所有的人都认识他，通常卖给他的东西都多于他应得的，可他从来没有回到商店退还任何东西。现在，他一定会去再称一下鲤鱼，但不必担心，附近他唯一信任的秤是屠夫科纳斯先生的秤，科纳斯先生会处理好这件事的。她向我眨了眨眼说，科纳斯先生有一些小块磁铁，如果需要的话，他就把磁铁贴在不会被人发现的秤底。当他把肉从秤上拿走时，他又悄悄地把它们移开。顾客并不聪明，还以为自己得到的是公平的份量。

不到一小时——这时我又留在寒冷的户外，把我们为了获利将其救活后再杀死的鲤鱼过秤并包起来———个宽肩膀、红面颊、系着一条白围裙的男人走来，我敢肯定，这人一定是屠夫科纳斯先生。他走近后，高声通知我们，说我们欠他一条大鲤鱼。“小伙子，你们瞧，”他喜笑颜开地大声说，“我给那个老笨蛋称了鱼后，对他说，你们算错了二十便士，是他占了便宜！我又

对他解释，鱼不是干酪，随着肚里的水分干掉，它的重量一下就会减轻的。听了我的话，他就像一条鱼似的鼓起眼睛望着我，嘴巴张得大大的。我同你们打赌，至少一个月内，他不会再来找你们麻烦。”

屠夫还在讲话时，经理从鱼柜里拖出一条两公斤重的肥美鲤鱼，用一个沉重的旋凿击它的头，把它杀死了，然后包起来，递给科纳斯先生。就在这时，我一下子顿开茅塞了，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真正的阴谋家，存在着那些认为一切理想都属无用、一切人类幻想都是含糊的人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阴谋集团，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的坚强的兄弟般关系，这些人知道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手中能够抓住的东西，或者放进口袋里的东西，知道钱可以买到一切，所有的人都可能受贿，除了死者——对死者他们宁愿不予理睬——和一些傻子，这些傻子可以被关在监狱里，被驱逐出国，或者被赶到地下锅炉房里去烧炉子，在那里思索别人难以捉摸的思想。总的来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傻子，此刻我碰巧与其他人在一起，被邀请加入到他们中间。是的，现在彼得和我都是“他们”中的一员，享受着他们的保护和团结一致。上帝助我，此时此刻我几乎完全沉浸在由忠实的亲密关系而产生的温暖感情之中了。整个下午我们不停地卖着鱼。顾客愈来愈多，大部分都是妇女，最后排成了一条长长的行列。天气变得暖和了一点，从微风中已经可以感觉到一丝春意。如果我和所有这些排队等候的人能到乡间去，在草地上散步，那肯定会愉快得多！但是他们决心要买一条鲤鱼，把它放在一大堆猪肉、牛肉、熏肉、土豆色拉、苹果麦片、腌野猪肉、冰淇淋顶上，以及盛满了他们几天来做的圣诞蜜饯的碗上。

我意识到，我在开始仇恨这一大群人，蔑视所有这些人，这

是我加入总阴谋集团的第一步。

幸运的是，五点一刻，我们摆脱了最后一个受骗者。但是，我们还必须擦干净鱼柜，把木柜台搬回贮藏室，千恩万谢地归还那台古怪的秤，然后计算我们的收入。彼得负责清点钱，我又出去打扫人行道。由于废物比现金少，所以我先干完活。我回到早晨和达尼娅剖死鱼的贮藏室里，在一张椅子上坐下，闭上眼睛。这里空气温暖潮湿，弥漫着各式各样的香味，壶里的热水在丝丝作响。我又思考了一会儿有关总阴谋集团的看法。我并不把它看成是某种秘密犯罪组织。这个集团中没有一个人，至少可以肯定不是大多数人有犯罪意图，他们也不是有意要搞欺诈。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平凡的普通的人，没有得到会使他们的生活具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思想和目标，他们自己也缺乏人格力量独立去发现这种思想和目标。这些失败者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团体，它的成员非常混杂，屠夫、蔬菜水果商、党支部书记、工厂经理、受贿的管理员、煤炭商、腐败的新闻记者，毫无疑问还包括那些受命去揭露和打击这个阴谋集团的人。

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打乱了我的沉思。我抬起头来，看见黄发的达尼娅小姐。她已脱去白色的外套，只穿着一件白色衬衣和一条蓝裙子。“伊万先生，”她柔声低语，“你还想……吗?”她招手要我跟在后面，朝着对面的角落走去，那个大板条箱就立在所有那些陈列架后面。靠近大木箱我才注意到，它的两边都有提手，就像一个大衣箱。“瞧。”达尼娅悄声说，抬起了这口庞大的“棺材”盖子。我看见，里面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毛毯和两个枕头。

达尼娅迅捷地解开衬衣扣子，我慌忙开始脱靴子。然后我们挤进了大木箱。我在她身旁躺下时，发现盖子里面还有一个

提手，于是我又抬起身子把箱盖拉来关上。

现在箱子里一片漆黑，只有一丝微光，好像来自她的黄发。也许是过氧化物——我怎么会知道呢？

"亲爱的，"我说，同时习惯性地叹息了一声，搂住她半裸的身躯。

"小声点，伊万先生，"她悄声说，"你得像老鼠一样不出声，他们很快就会来这里的。"我感觉到她把我的手从她身上推开，接着她的手却摸索着伸进我的裤裆。

"伊万先生，"她热切地低声说，"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那些圣诞节前来这里赚一点零用钱的老学生，我也不相信你曾经在监狱里呆过。你的朋友已告诉了我你是干什么的，你写电视剧本，赚很多很多钱。啊，伊万先生！"这时她正在用双手摸弄我的阴茎，"两万对你算得了什么？我已把其余的钱存起来了。我知道一个加油站，我们在半年之内就能把两万赚回来，以后我们挣的所有钱都将由我们自己支配。"

"你是说，你要我加入你？"我吃惊地问。

"我要嫁给你，以后一辈子都对你忠诚。"达尼娅小姐热情地耳语，"那个加油站就在公路旁，来往的汽车司机都要用它，那些去国外的许多司机也要去那儿。几年内我们就能赚足够的钱买一幢房子，你可以有一辆新牌子的小汽车，我们将到海边去度假。我们的生活将过得幸福美满，你说呢？"

这时，我听见外面有人叫我。达尼娅小姐的爱抚正把我弄得心旌摇荡，但我还是很快推开盖子，跳到水泥地板上。赤着脚——或者说是穿着三双羊毛袜子——跑到户外去见彼得。

"我简直不明白，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彼得站在那里，手中拿着几捆钞票对我说。他惊异得根本没注意到我衣着

不整。

“怎么啦?”

“那个秤是调好了的,”彼得伤心地说,“我们卖掉了二十条切成片的鲤鱼,比本身价格还高出一倍卖掉的,你向顾客收费也是按照经理教我们那样去做的。”

“是啊,我是尽力而为了,”我突然感到必须为自己辩护。“我们亏损了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多少?”

“八百。”

“你是说,我们把本钱都赔进去了?”

他摇摇头,“不,比那还多。”看上去他好像马上就要哭起来。

“咳,让它见鬼去吧,”我说,“让所有的钱都见鬼去吧!”

明天早晨储蓄银行开门时,我将取出两千,送给我那位同事的妻子。他进监狱是因为他拒绝加入那个大阴谋集团。

“我真不明白,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彼得哀声叹气地说,“我们肯定在每条鱼上至少赚了两克朗。”

我耸了耸肩。在我的想象中,我看见所有的阴谋家趁着寒冷的夜晚,偷偷地向我们的鱼柜走去:我们的经理带头,后面跟着屠夫科纳斯先生,黄发达尼娅,以及所有的蔬菜水果商、党支部书记、工厂经理、受贿的管理员、煤炭商、腐败的新闻记者……他们每个人都把贪得无厌的手伸进我们的鱼柜里,带着我们的鲤鱼匆忙撤退……

“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话,下次你想卖鲤鱼,你最好同他们一起过夜。”

“你这样看吗?”他听懂了我的话后,眼睛似乎变明亮了。可

是,他也只是耸了耸肩。

唉,我想,在这点上他是正确的。同他们一起过夜毫无用处,他们总会找到办法欺骗我们。我们没有真正成为他们集团的成员。

星期四早晨

一个色情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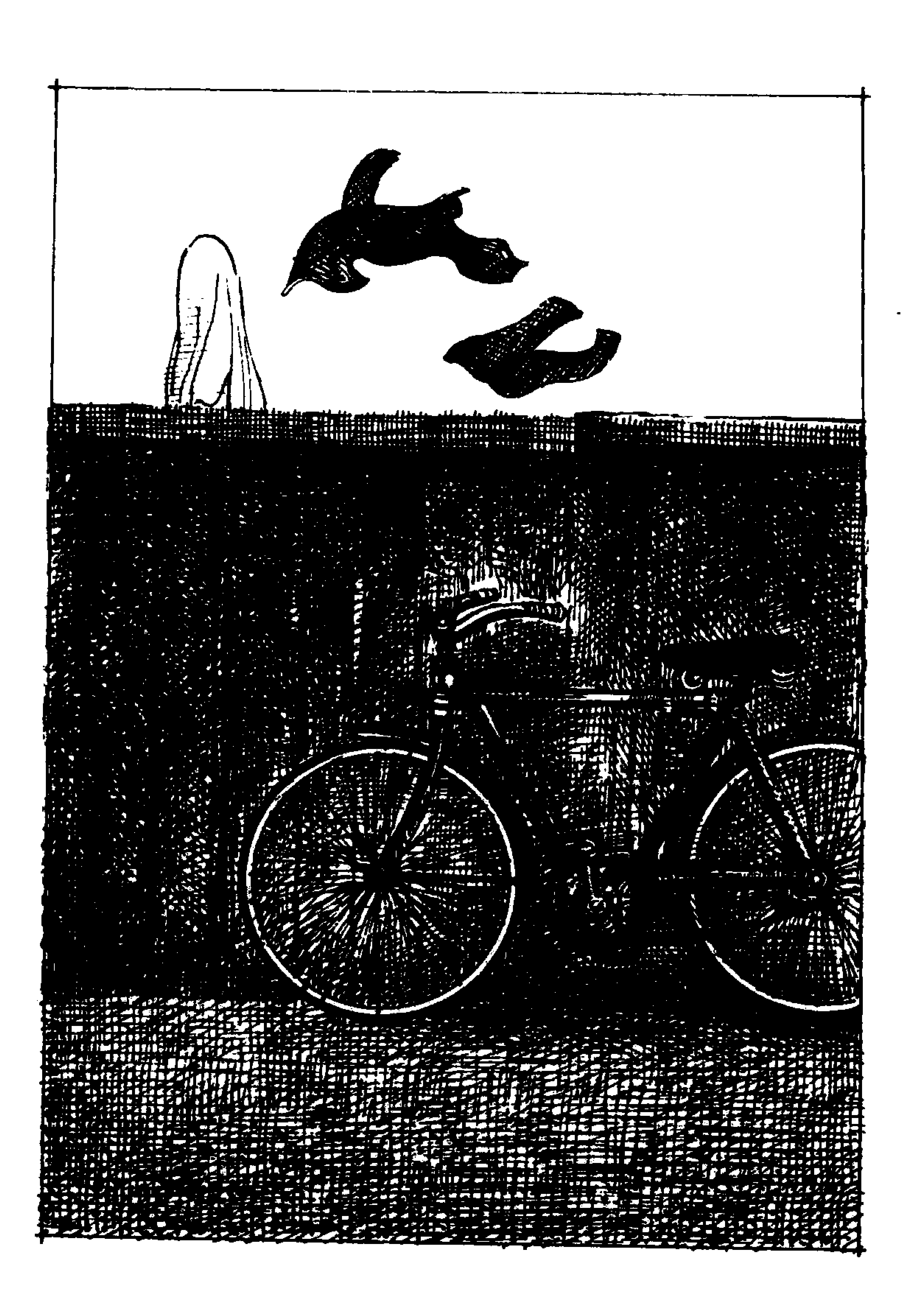
这条小巷实际上是死胡同,坑坑洼洼的路只通向锁匠的作坊小院。在摇摇晃晃的木栅栏上有一张褪了色的告示,警告所有的来者:

闲人莫入,违者法办!

可是,由于一直散发着臭气的小河上的那座桥直接通向锁匠的院子,所以没有人理睬那张告示。

而我因为到这里有事要办,更可以坦然地忽视那张告示的存在。

我是来找霍利先生的。我从来没见过他,但汽车上的气泵坏了,我已费尽力气也找不到更换的。我给城里的每一个汽车修理厂,每一个出售配件的商人都打过电话,最后还请求过地区供应厂商帮助,甚至还试着向好几位经理行贿。可是,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有人建议我去找霍利先生试一试。就是这个地点。



也许他会体谅我，给我做一个新气泵，或者给我偷一个，或者叫人从维也纳给我带一个。我不明白，这类事别人都无能为力，而他，霍利先生却能够成功。

我发现车间入口处就在院子的尽头。一个不太宽的过道里放着一些废旧钻床和刀具，当然，一个比我有经验的人肯定还会发现其他类型的机器。有一个黄头发的男人（我无法确定他的年龄）站在一台机器旁，正在敲打一块金属。

我招呼了他一声，他朝入口处看了看。我既没有听到他的回答，也没有抓住他那瞬间的一瞥。他的目光迅速转向一边，固定在一堵墙上。在那儿，我看见一条裂缝，我猜想，这个裂缝曾经是一道门。

从裂缝中望去，我看见一个低矮的工作台的末端，台上有两双脚正翻来翻去。其中一双显然是女的，脚趾染成深红色；而另一双，很可能是男的，穿着绿袜子。

"早上好。"我重复了一遍，同时急忙向旁边迈了几步，以便看得更清楚一点。没有人理睬我。除了敲打金属的丁当声外，我已清清楚楚地听见粗大的喘息声。至于这喘息声发自何处，我自然已确信不疑。

我静静地恭候着。生活已教会我要有耐心。况且，每当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尤其在需要他们帮助时，我总是变得很不好意思。

我朝右边又移动了几步。我为自己老是朝着那个方向瞧而感到羞愧，于是强迫自己往对面墙上看，至少看一下。那堵墙上贴着几张广告画：有一张画着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那漂亮的汽车外形和一个靠着这辆车子的年轻女士优美的身姿融为一体；另外，还歪歪斜斜地贴着几张各种姿态的年轻女士的裸体画

像。总之，这地方弥漫着淫荡的空气。

我推迟了我的旅行，呆在这里已一周多了。说实话，我的汽车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因为我不怎么喜欢使用它。并不是因为我妻子总用很高的速度开车而令人害怕，而是我觉得，仅仅为了我的缘故，让车子在路上飞驰，是一种亵渎圣灵的犯罪行为。

现在我已看不见隔壁房间工作台上翻滚的脚了。一个染成金黄色的、乱蓬蓬的头在那条裂缝处露了一下，很快又消失了。我听见啪的一声，接着有人尖叫，这是在敲打金属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中，一个女人的长长一声快活的尖叫。现在，那女人走了出来，整个身躯都显露无遗了：蓝色的木底鞋已遮住了她的红脚趾，上身的一部分被一件白色外衣掩住，中间仅扣着两颗扣子，看上去大约三十岁左右。她一边朝着那个一直在机器旁干活的男人走去，一边问我："你在等人吗?"但她并没有看我一眼。她站在那里，脱下右脚木底鞋，用大脚趾去搔左小腿。这个动作使她的外衣全部滑开了。"是的，"我赶紧说，"我在等霍利先生。"

"他还没有来这里。"她说。她的眼睛却望着还在加工金属的男人。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可能来这里?"

"我想他会来的。"说完她继续朝前走。当她从那男人身旁走过时，那男人举手迅速拍打了她屁股一下。

女人又尖叫一声，然后心满意足地说："哟，你真还有点年轻人的情趣哩，不是吗，科布扎先生?"她一边说笑着，一边转过脸来逼视着我。她的眼里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刚与人性交后的幸福的回味。

"你奇怪吗?"她说，"每次我一靠近他，他就这样拍打一下。"

她走出车间。那个男人(我现在知道他叫科布扎,但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哑巴)把那块加工完了的部件放在一旁,又捡起另一块金属。谁知道霍利先生在哪里?我继续在这里闲逛似乎已没有多大意义了。

我离开时,心里有些纳闷,不知穿绿袜子的那个人去哪儿了。他们会不会向我隐瞒霍利先生的行踪呢?不会的,我想,霍利先生的名声肯定建立于同那位绿袜男人喜欢的完全相反的活动之上;很可能,这时他正在追踪各种难以得到的配件啦。

车间的一面是长满灌木丛的陡峭斜坡,位于摇摇晃晃的木栅栏和最后一幢高耸的公寓大楼之间。车间的另一面,是一个装废铜烂铁的院子,一道低矮的白栅栏将这个院子与锁匠的院子隔开。一条狭窄、寂静无人的小巷朝着公寓大楼对面的一条街,一辆市政洒水车就停放在小巷尽端。洒水车刚喷涂过一层鲜橙色油漆,它结实的尾部朝着街道。在城市的这个正缓慢崩溃的角落里,这辆洒水车,在我看来,是唯一一个还有点生机的物体。我在栅栏旁边的草地上蹲下,被这一带的景色吸引住了。但煤烟已污染了房屋,最近的一些屋顶后面耸立的几个工厂烟囱隐约可见;铁路就在附近,从那里传来我熟悉的货车转轨时的喀嗒喀嗒声。这一切使我触景生情,想起了我的童年。那时,我们住在维索卡尼,铁路就从我家窗户下面通过;也有高耸的烟囱,矗立在那斜坡上。我当时觉得,那些烟囱雄伟壮丽!我的父亲是一个讲究精确和尊重事实的人,他曾教我试着辨别哪些烟囱应当分属于哪一家工厂的;夜幕降临后,我们常把椅子和凳子搬到住房外面的人行道上,互相讲述故事。

八点光景,一辆货车朝这里隆隆地驶来,在堆放废料的院子前卸下装载的锡罐。奇怪的是,这些锡罐既没有生锈也没有上

油漆，更没有被扭弯。可以这么说，在光泽和成色方面，只有它们可以与那辆洒水车媲美。

货车刚离开，堆放废料的院子大门就打开了，我又瞥见那个金黄色的头。

那女人在我背后眯着眼睛望了望太阳，然后盯着那堆还未曾使用过的锡罐。朝我走来时，她抛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对下一次交合的殷切期望。她说："看见过这样的东西吗？"

我摇摇头。她回到院里，拿出一把扫帚，把一些锡罐扫进去。在门口，她迟疑了片刻，仿佛在看我是否跟在她后面。然后她摇了摇头，回到院里，"砰"的一声关上大门。

从街的另一头，一个白发老人骑着自行车朝我这个方向驶来，那大胡须飘在一边。他很费力地踏着自行车来到斜坡顶，最后在我面前跳下车来。"你在等人吗？"他问。

他穿着一件鲜艳的紫色毛衣，一条赭色灯笼裤。我父亲像我这么大时也穿着这样一条裤子。

我无缘无故地突然想到，这个人也许就是霍利先生，所以我回答的声音里带有一个轻微的问号："我在等霍利先生！"

"噢，他，"老人说，"上午他不常来，这个恶棍！"

他把自行车靠着堆废料院子的栅栏上，弄平裤子的褶缝，把杂乱的胡须捋到一边，解松脖子上的围巾结。围巾是红底黑点，就像瓢虫。然后他走到我面前，伸出手来，自我介绍："私家哲学博士，霍沃尔凯。"

我不太喜欢这种拘泥形式的介绍，再说，这位老人虽激起了我的兴趣，却没能唤起我的信任。因此我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出我的名字，看他凭听觉能从我含混的声音里听出什么来。

他听清楚了。“见到你很高兴,科齐纳先生!”他把一个十八世纪西波希米亚反抗者领袖的名字、一个在整个捷克历史上最著名的名字之一归于我,“请原谅我的好奇,你是否碰巧同他有亲戚关系?”

我点点头。“是的,”我说,“他是我的一个祖先。”

“认识你我非常高兴。”他重复说,“你对周围的这一切有什么看法?”很幸运,他没有停顿下来听我的意见。“朝四周看看,”他劝我,“你看见什么?除了房屋、烟囱、汽车、灰尘、赤裸裸的性行为,你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我,科齐纳先生,却记得草地、树林、露水、马匹、以及年轻的情人轻轻的拥抱。就在这里,”他指着锁匠的院子,“过去有一条小河,河水还可以饮用!而现在,”他鬼鬼祟祟地朝堆放废料的院子关闭的大门望了一眼,继续说,“我决不会否认,我还记得这个地区令人难熬的贫困。那些统治世界帝国的男人们所选择对付贫困的那种方式只能导致灾难。我看出你在听到我讲男人们时感到吃惊——可是你不可能没注意到,我坚信这个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由于男性和女性的原则发生冲突而造成的。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地区,富于爱和自我牺牲的女性原则可能占优势,印度文化就是这种情况。好几百年来,这个世界被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之间有益的均衡所左右。唉,科齐纳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一定非常痛苦地意识到,取得胜利的是男性原则。男性原则一心想征服女性原则,它对女性原则偶尔的贡献,也只是短暂的片刻。正如一切男性的东西都是如此,其他方面都是多余的,无用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请再环顾一下四周,你看见什么呢?除了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你什么也看不见!”他伸出一个食指,也可以说,象征性的,把它刺进空中。我往四周一望,真的看见了勃起的男性生殖器形

象——工厂烟囱、电视天线、避雷针和冷却塔;洒水车即将膨胀的水龙头;我还注意到一根金属管——可憎的阴茎——从堆放废料的院子栅栏后面伸出。“是吗,我的年轻朋友,你将看见无用和多余的可悲象征,它们永远也不能得到满足。”

“男性原则丧失了完善的信心,”老人继续侃侃而谈,“像传说中注定要在海洋中飘流直到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到来的荷兰水手,或者像流浪的犹太人(传说因嘲弄受难的耶稣被罚永世流浪)一样,它漫游世界,企图逃避自我。在它企图竭力逃跑时,它创造了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发现了沉思的欢乐。但是一切都徒劳无功!”老人大声叫嚷着,接着又说,“每一次,当它以最纯洁的肉体化身出现时,它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它原始的使命,它的唯一真正的狂喜是由爱神厄洛斯提供的!”老人发出一声古怪的、欢乐的笑声,他的目光溢出愉快的光彩,在堆放废料的院子关闭的大门上停留了片刻。

“请继续看。”他呵斥我,把他的象征性的食指伸向霍莱索维塞发电站的四个男性生殖器象征的方向。那里,发电站冒出一层层烟雾。“我希望你高兴。当夜幕笼罩,你窗外的街灯亮了的时候,对你能够坐着市内电车悠然地到达这里而感到高兴。但是我必须问你: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你究竟为什么在这里?”他用象征性的食指戳了一下我的胸部。我快快不乐,勉强回答了一句:“我不知道!”

“对!”他激动地叫了起来,使我感到吃惊,“完全对!你在这里毫无意义呀,年轻人!上个月,我不得不长途旅行到莫海尔尼塞去看望我生病的父亲,这是我三十年来第一次乘坐火车啦!我刚开始同旅伴聊天,就了解到了他们都是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在奔波。毫无意义的辛劳奔波,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缩影!

上周星期天，我散步走到赫拉德卡利城堡，数了一数，八十二辆公共汽车，一千六百三十三辆小汽车，我还没有去数电车。你想，三万九千人从城堡大门经过，有些人竟然是从美国乘飞机到这里来的！为了什么？科齐纳先生！实际上，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即使他们在马德里或者库特纳霍拉下车，也将会是一样的，他们无法看到这些地方的区别是什么。然而，却因为这样，地球积累了亿万年的资源已被滥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时代啊！年轻人，当我们还没有醒悟过来时，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重新住进山洞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啦！以今天早晨为例吧，我现在退休了，可是我退休之前，总是用这个来旅行的。”说着，他抚摸了一下自行车的把手。“瞧瞧，那忙忙碌碌奔向各处去上班的人群，科齐纳先生！在这个该死的无生气的早晨，四处乌烟瘴气，喧闹、恶臭！更有甚者，他们生产的一切东西都是毫无用处的：要不就是刚生产出来就被扔掉；要不就是恶棍们用它们来塞满房间，它们的作用仅仅是占据空间而已。我无须告诉你，人们铺上毡毯，然后把毛毯放在毡毯上，毛毯上又放上毛皮，毛皮上还要放上一只变性的叭儿狗。他们在书架上塞满书和笔记本，但从来找不到一本被翻开过；他们把花瓶放在书橱顶上，可从没有想到过花瓶是用来插花的；他们在每一个角落都放上电视机、收音机、电话机和收录机。瞧这些日子吧，人们的衣柜里挂满各色的衣服啦！科齐纳先生，不仅妇女，而且男人们也打扮得极为华丽了哩！今年穿窄裤子，明年又买宽裤子，整个国家变得像发了狂，从八岁儿童到八十老翁，都打扮得像美国西部的牛仔！当一个衣柜装满后，他们又买一个，还做了一些木架来存放他们的工具啦、喷雾器啦、烟雾剂啦，以及那些盛着将放进食物和饮料里的各种“毒药”的瓶瓶罐罐。你还会注意

到：人们在家里安装了充气式游泳池、电气壁炉、小型人造喷泉；他们在墙上挂着刀剑，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手几乎从来没有握过草耙，更不用说去拿可以致命的武器了，他们是用钢笔来杀人的；他们用战争勋章来装饰墙壁，可是对那些战争，却一无所知。还有，当所有这些东西变旧开始不为他们所钟爱时，他们就去买一套家庭娱乐室，仅仅为了处置那些变旧了的东西，科齐纳先生，而不是为了家庭享用哩！还有，他们去乡间买下一幢小屋，或者一幢旧磨坊。每逢周末，他们不是从事更高尚的事，或者暂停下来思索思索，而是匆匆忙忙赶到乡间小屋去打扫擦洗，去清点一下有没有人偷过那些无用的财产，却装腔作势地声言要去享用新鲜空气、新鲜饮水以及未受损害的大自然。但是，他们每次开车到那里，都要制造出更多的毒气污染我们大家都必须呼吸的空气，直到我们都毁灭为止——”

“你的父亲还活着吗？”我问，向他提供一个平静下来的机会。

“是的，他还活着。”老人回答，“他现在已恢复健康啦。那是我叔叔杀了一头猪，父亲吃得过多了一点。他今年九十五岁了，你可知道，他一生连汽车都没有坐过哩。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他所在部队被派往前线，才坐过那么一次火车。后来，一九三八年又坐过一次火车，去参加索科尔[①]庆祝节，因为他一直是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我因袭了他的嗜好。当他们废除索科尔时，我开始练习瑜伽。你猜，我有多大年龄？”

“六十，对吗？”我揣测了一下。

“七十三岁！”他说，“我二十五岁以后就再也没有尝过一次

① 索科尔——Sokol，“鹰”的意思，捷克的体育运动组织。

猪肉，最后一次吃蛋是在三十八岁那年。"

"你退休前是教师吗？"

"我干过许多行业，"他回答，"曾向来自罗马尼亚的斯洛伐克人讲授素食主义；在一些显贵的家庭里当教师；还进行过北极考察。一旦我赚了一点钱，我便丢弃一切，继续从事我的专业，私家哲学。像苏格拉底那样，我流浪于市场，向人们讲演。你知道这个有多大岁数了？"他指着自行车问。

我还没来得及说出我的看法，他就抢先说："四十四年了。我经常在早上骑着它冥思遐想，根本无须留意我将往哪里去，也忘记了时间。这时，我不吃不喝，直到天黑。当抬起头来自言自语时才发现：'我在特热比奇啦！'于是，我把衣领翻上来，躺在树林里的灌木丛下，企望在天空中发现一颗新的星球。可是，最近我太累了。几天前，我正沿着这条街骑车时，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几乎握不稳自行车手把。还好，那边那个大门是开着的。"老人指着堆放废料的院子大门。那里，几个闪闪发光的锡罐还躺在鹅卵石上。"我骑进去，在一堆废纸旁停下来，从自行车上摔到地上，失去了知觉。我醒来后，发觉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一条木凳上，一个裸体天使坐在我身旁。我听见音乐声，好像所有的天使在合唱。总的看来，这还不能说明我自己有什么疾病，我一直身强力壮哩。这样的姿势，我还能坚持整整一刻钟啦。"他说完，立即就在长满草的斜坡边上表演了那种头朝下脚朝天的姿势。他倒立在那里，脚指向天空，眼睛还死死地盯着堆废料院子关闭的大门。仿佛他的凝视具有某种神奇的威力，大门打开了，金黄色的头又一次在冉冉升起的红日照射下出现了。

老人的手颤抖起来，腿也在摇摆，他很快地恢复了正常姿势，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着的纸条，递了给我，并说："这

是送给你的礼物，我的年轻朋友！”我不加思索地把纸条塞进了口袋。他很快跳上自行车，从站在大门口穿着白色外衣的女人身旁疾驶而过。接着又停了下来，看见他把自行车靠在院子的栅栏上，走进大门，门很快便关上了。

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舞台监督在推动着剧情的发展，不一会，一个穿着皮茄克衫和灯芯绒裤子的小个子男人穿过公路，向洒水车走去。他的步法活像水手或者赛马的职业骑师，而不属于驾驶洒水车的司机。他的两手深深地插进裤袋里。在洒水车前面，他停了下来，好像在犹豫。天气晴朗，清新宜人，除了我和他，街上空无一人。小个子男人已不再迟疑，从裤袋里伸出一只手，打开驾驶室的门。

在两冲程发动机的吼叫声中，一辆航空牌芙蓉红颜色的双座轻型赛车从远处驶来。当它行驶到那个几乎不能叫做十字路口的地方——也就是两条空寂的小街恰巧相接的地点时，洒水车朝后倒车而出，接着一阵金属与金属相碰撞的声响，仅只一瞬间，那辆小型双座轻型汽车——女性牺牲原则的象征，如一个弃妇一样被撞碰在一边了。它刹车时，发出可怜的刺耳的叫声，在路中间，终于停止不动了。

一个穿着工装裤身材高大的男人从小汽车里爬出来，靠着被撞伤的汽车惊呆了。突然他用力拆掉一块挡泥板，把它高高地举在空中，嘴里发出一声像愤怒的狼的嚎叫。

从洒水车驾驶室里伸出一个头来，接着，那个穿灯芯绒裤子的男人小心翼翼地从车上下来，走到他的车子尾部，这时他才决定把另一只手从口袋中抽出来。他轻轻地摸了一下那被撞损的车尾，撞损部粘着芙蓉红的油漆。然后他又检查了一下喷水装置，这是他最担心的事。但很快得到证实，喷水装置已不再连接

在车子的侧面了。

大个子男人朝他慢慢走去，手中还高举着他从身负重伤的汽车身上拆下来的那块弯曲的挡泥板。“你这个瞎了眼的冒险家！”他不客气地叱骂那个小个子男人，“你这个乡下佬！你自己既是个半瞎子，为什么不找一个人在外面帮你看着？”

穿灯芯绒裤子的司机愁眉苦脸地盯着喷水装置，大约正回想着它曾优美地向两旁喷洒水雾的情景，而现在它却痛痛快快地在朝着车身撒尿。他很不高兴地咕哝着：“哎，滚开！见鬼去吧，你这个愚蠢的同性恋者！”

两个老头儿从街上走来。一个手中提着一个装着几个空瓶子的网兜。“听着，”他对同伴说，“不要对我抱怨这件事，去告诉合作社吧！”他不是看着自己的同伴说话，而是满有兴趣地瞧着那两个司机。

“可合作社已经批准了！”另一个老头儿用哀怨的声调说。

拿网兜的老头有一张爱管闲事的大嘴，浓浓的眉毛（浓眉象征他坚定）和一个摔跤运动员魁梧的身材。而另一个老头儿，耸着肩、灰白凹陷的双颊、秃脑袋两边伸出一双大耳朵。他已经习惯于他的角色——一个不停地抱怨着的受害者。

“他们已经到那里去过三次了，男男女女一起去。”他伤心地说。

“好啦，那是合作社的事，让他们决定吧！”拿网兜的老头儿说。他好像很想干涉两个司机的争吵。

“做完练习后，他们就干坏事……”

有一张爱管闲事的大嘴的老头儿对这句说了一半的话发生了兴趣：“坏事，什么样的坏事？”

“首先，他们把草席拖到体育馆的各个角落，”另一个老头解

释说，"随后，女人们脱下运动衣和运动裤，把大腿张开。他们把所有的灯都关上，在黑暗中进行性交。性交时的吵嚷声使得你简直不能入睡，而且，那些角落也搞得很肮脏潮湿。"

"可是，我已告诉你了，你最好找合作社反映此事，这是他们的职责，与我们无关！"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人给你摇旗？你这个乡下佬！"穿工装裤的大个子司机嚷道，"要不，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吹鼓手？你这个斯洛伐克的乐队指挥！我刚把车子油漆过！——怎么？你对这不感兴趣？不！先生！"他提高音量大叫，"你的车，几乎撞死人！你只对可恶的喷水装置感兴趣！"他朝洒水车大步走去，想把已经弯曲的喷水装置弄得更弯。

穿灯芯绒裤子的司机惊慌地四顾求援。"你那么咄咄逼人干什么？"他喊道，决定还击，"我从右边开来，我有优先权！"

大个子男人放开喷水装置的金属管，揶揄着"哼"了一声。"不要逗我发笑啦！"他向着听众讨好地说，"这个乡下佬屁股朝着十字路口退过来，现在他却要什么优先权！"

"听我说吧！"有一张爱管闲事的大嘴的老头说。他从网兜里取出一个瓶子，朝着第一幢公寓大楼方向指去，"告诉你，我的地下室里也有水，有这么多水。"他做了一个不明确的手势，"可是我抱怨吗？不，我只是打开窗户！不管怎样，抱怨有什么用？水是一种物质！你不可能同物质辩论！"

"说得对！可是，他们并不是静悄悄地干那种事，还大声吵闹哩！那些女人咯咯地傻笑，叫喊着一些不堪入耳的淫荡话，吵得你直到天亮了才能入睡。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愿管一管这件事？"秃头男人继续说，"这是一件医学上的事啦！还有我的背，你知道，我有诊断书哩！"

"总之,"洒水车司机认为他已引起了一场无休无止的争论,"一大早你到这里干什么?你没见这是一条死胡同吗?"

"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穿工装裤的大个子男人嘲笑说,"你在问我吗?周围每一个小孩都认识我,你知道吗?"他把挡泥板弯曲部分举到洒水车司机的眼前。"瞧瞧这漆!"他说,"这是最好的荷兰漆。我要你赔偿这一切!"

我开始意识到,这人正是霍利先生!

"你关心什么?"拿网兜的男人叫道,"你的背?为什么不是你的膝盖呢?你是知道的,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他们,要他们减少给你增添麻烦。然而,话又说回来,你是唯一为潮湿而不停抱怨的人。告诉我,为什么别人不为潮湿发愁呢?"

这里已不再是我呆的地方,也不再是用我的小事去打扰霍利先生的时候。可是,我还是留下来了。一阵突然的冲动驱使我朝堆废料的院子栅栏张望。我什么也没看见;由于男性原则的所有代表都在高声喧闹,我也什么都未听见。

"这么说来,你对这件事是什么也不愿做吗?"秃头男人问。

"当然不愿意!"拿网兜的老头回答,"让他们性交吧,只要他们喜欢!他们还要喧闹,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好像也没有影响别的人啦!"他离开他的同伴,脸色严肃,朝着洒水车走去。

"如果是在你的窗户前,"秃头男人在他身后叫嚷,"你就会转变态度的!"

穿灯芯绒裤子的司机一个人站在那里。"你知道他到哪去了吗?"他向多嘴老头说,声音由于愤怒而颤抖,"叫警察去了。警察!我们是人,一条狗都不会像这样对待另一条狗!"

拿着网兜的多嘴老头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说得完全对!"他说,"他们很快就会根据法律确定谁是谁非的!"

“一大早他来这里干什么！我很想知道。”洒水车司机伤心地说，“他挡住道路，使体面的人陷入麻烦！”

提着网兜的老头不再理会，把愁眉苦脸的司机留给他自己的洒水装置。他果断地大步走向那堆锡罐，在那里站住，好像在欣赏女性的丰满躯体。接着他弯下腰，捡起几个，迅速放进他的网兜里。然后，他神色自然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我一直看着他走过小桥。我又赶紧向那堆放废料的院子栅栏望去，一下子看到那件白色外衣出人意料地在空中飘扬，它的主人满不在乎地把它扔掉了。当那白色外衣朝地面飘下时，袖子被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金属管挂住，便留在那里了。很快，一件鲜艳的紫色毛衣加入了它的行列，一条赭色灯笼裤子又飞向空中，然后消失在栅栏后面。

我终于离开我所蹲坐的那个颇具优势的地点，慢慢地朝堆放废料的院子走去。我走到能够听见大声“哼哼”的地方，对这“哼哼”声的来源，我是不会怀疑的。我突然想起那老人送给我的礼物。我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折叠的纸条，把它打开。在这张纸条的中间，印着金黄色的字：

信任你自己！

私家哲学博士，奥古斯丁·霍沃尔凯

我把纸条重新折起来，放回口袋里，不再等待那些熟悉的面容重新出现。我沿着那条由那张告示控制的道路走去。告示上的文字，孩提时代就一直引起我的好奇心。

闲人莫入，违者法办！

星期五早晨

一个护理员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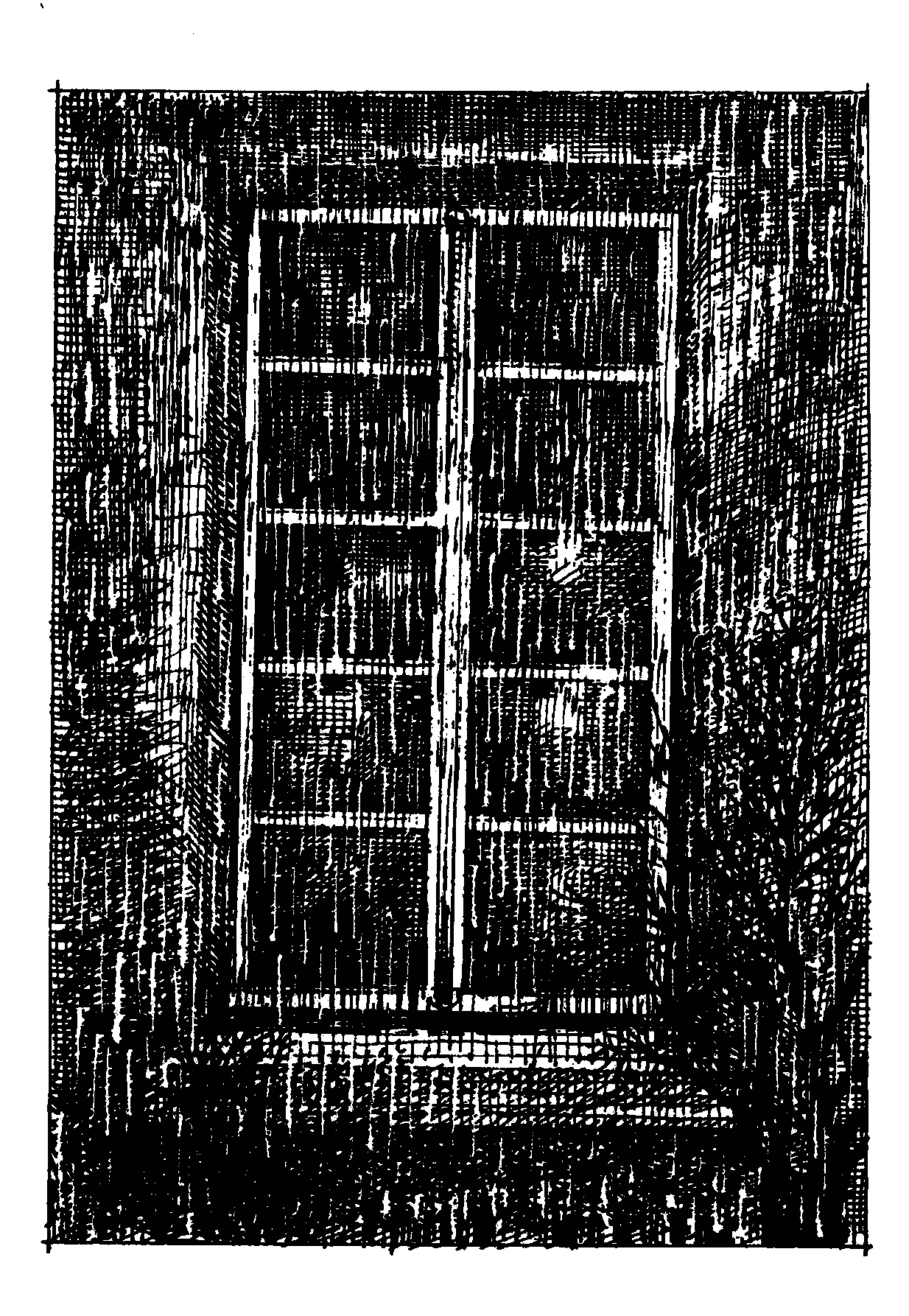
（连同一个投入帽盒中的故事）

外面，秋雨连绵不断。大约从半夜开始，这雨一直持续了三十六小时。现在才十二点半，可是我已无事可做，实际上在十点以前，我就没有做什么事了。因为从那时起我能做的已不过是帮护士清点被单和枕套，时而在纸上记录数目，时而搬动架子上和库房里的东西。我们不仅丢失了一百五十床被套，还丢失了一百七十个枕套和二百一十五张床单。

“哎，你瞧，克里玛先生，”护士伤心地说，“盗窃，每一样东西都被盗窃了！”

我试图劝慰她，对她说，我有把握，我们会发现丢失的东西原来被遗忘在某个橱柜里了。但是我的劝慰毫无效果。

“如果你知道这里可能有什么东西被盗，你会大吃一惊的！”她说，“这里甚至连床也不安全！他们在夜里把东西拖到树林附近的栅栏，然后把东西扔到栅栏的另一边就行了；或者利用我们放亚麻油地毡的时候进行盗窃。为了安放地毡我们只好把病人移出病房，让他们躺在走廊上。我们都希望工人们在一天内把



这项工作做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在夜间，所有的胶水罐全失踪了！工人们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五天都不露面。是比布尔拿走了胶水，还会是谁呢？尽管人人都知道是比布尔，但谁能证明呢？”

“关于被单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只好不考虑它！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护士说，“克里玛先生，你一点也不知道，这些日子人们偷些什么东西啦！药品、石膏、纸、肥皂、棉花、套鞋、大量的食品……如果你不小心，他们还会把你正坐着的椅子从你屁股下偷走哩！今年我们病房里就丢失了六张椅子。不要以为小偷对试管不感兴趣，整整一箱试管也会从试验室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更不用说陶器。你来这里工作之前不久，”护士继续说，“这张通知单曾送到每个病房传阅。”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黄纸，大声读了起来，“与我们大多数职员维护的高尚道德标准成对比，偷窃社会主义财产的不良行为最近在我们院里已经更加肆无忌惮，发展到顶点，甚至开始偷窃车库的双扇门。鉴于这样的事实，管理部门不得不通知大家，我们被迫采取预防措施。因此，凡是带出医院的提包都要受到看门人的检查。我们相信大多数诚实的职员会支持这一措施。”

“他们已开始检查人们的提包了吗？”我问，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检查过我的皮包啦。

“你认为检查提包能起作用吗？”她轻蔑地摇了摇手。“我没告诉你吗？小偷把东西抛到栅栏的另一边，已经有人在那里等待着，然后把东西运走。就在这张通知发下去的第二天，C病区所有盥洗室的门都被盗走了。我倒很想知道，人们要那么多门干什么！”

“你们向警察报告过这些偷窃事件吗?”

“去他的!他们的办法也许只能是用两个警察来监视一个职员。上月医院准备在A病区安装新的暖气管,一共购买了七十套。你知道当工人开始安装时还剩下多少?”

为了不使她扫兴,我故意把数目说高一点,“五十套,对吗?”

“三十七套!”她很得意地宣布。

“太可怕了!”我假装吃惊地说,“A病区的病人会冻坏的。”

“噢,不会。一切都得到妥善处理。”她解释说,“知道东西要被偷,无论什么物资,他们总是购买比实际需要的至少多一倍。”

“既然那样,”我猜想,“他们应该还保留了一些暖气管。”

“你是开玩笑吧,”她不耐烦地说,“他们虽然定购了一百五十套,可是他们一半都没有得到,因为厂商总知道他们定购的数量是实际需要的两倍,现在暖气管供不应求啦。另一方面,那些旧的暖气管,小偷是不盗窃的,而那旧的却比新的还好。”她继续不停地说下去,但把话题转移到与她直接有关的事情上。“一想到明天清点衣服时会发生的情况,我就惶恐不安。去年,我们短缺了近三百件女睡衣啦!你能估计那个比布尔何时能修起他的新房子吗?”

九点半,我们清完了被单,然后要我带领一个老家伙到X光科。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这幢楼房里徘徊,想找一个合适的隐藏处,不受干扰,继续阅读斯大林女儿的回忆录。这本书是一个朋友借给我的,要求我两天后归还。我起初在地下室里看,但发现那里出乎意外地闷热,因为刚运来一批货:棉花和其他医药用品。我读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邻旁的隔离式病房楼里的木工车间外面。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温暖、宁静,此外,还弥漫着木料的清新气味。但我仍然坐立不安,不能静下心来看书。

因为，如果病房需要我，怎么办？于是，每过一刻钟我就回到病房去看一下是否有事。但在雨中跑来跑去也决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最后我在五十号房间里找到避难所。这是一间空荡荡的小房间，有时临时用来停放死尸，其余时候又成了护士们吸烟的宁静的好地方。

正是在这里，我曾惊奇地听到护士长维娜讲一些下流的玩笑。在医院里所有的护士中间，维娜的脸长得最像天使。

下班时间快到了，我决定去护理员的盥洗室，盥洗室里有我们放衣服的小橱。上夜班时，我们可以把盥洗室作为休息室；白天是不允许我们在那里闲荡的，除非是上厕所。我到那里时刚好碰见我们尊敬的同事比布尔，他站在他的小橱旁，正在把缠在胸部的一块长长的白东西展开。有好一会，我才意识到那是一张床单。

"请原谅，"我尴尬地说，"我不知道——"

"好啦，很高兴你来。"他说着便把瘦长的、小鸟似的脸转向我，"一点以前我得赶快离开这里，假若他们从急诊室打来电话，你愿意替我去吗？"

"噢，好吧。"我很不情愿地回答。

"他们不会打电话来，你是知道的。"他要我放心，"哈克医生说，他要把所有的人都赶走，除了那些快断气的人。这只是以防万一……"他细心地折叠起床单来。在这方面，他肯定经历过大量的实践，因为床单被折得整整齐齐地装进了他的小公事皮包。"我必须在一点半钟赶到学校，监视我的那个小娼妇，"他解释说，"真可怕，我想，有一天我会扼死那个臭娃娃的！"

我明白，他是在说他女儿。前一天他才把女儿的照片给我看过。

“想一下吧，”他说着，左右挥动了一下手臂，“她只有十四岁，可已有了一个男朋友，还逃学。当我企图说服她停止这样做时，她竟厚颜无耻地告诉她母亲和我，声言她恨我们。有一天，老师叫她到黑板前面去，你知道她正干什么来着？她还在梳头哩！还对老师说：‘等一会，我正在梳头！’当然，现在她的头发没有啦。过去她把头发留到了腰部，当发生课堂上梳头的事后，我妻子的大女儿，拿起剪刀把她的头发给剪了。她还大哭大闹哩，那个小娼妇！哼，也只有这样的事才会使她掉眼泪啦！前不久，我用花费了三百克朗买的分节活动钓鱼竿敲打她，把钓竿都打断了，可她泰然自若。大女儿，尽管是我妻子和她第一个丈夫生的，只要一看见我生气就向我表示歉意，答应一定要听话。可这个女儿铁石心肠，简直是一块木头，好像再没有什么能使她感到不安的啦。并不是我没有好好待她，而是她根本不理睬我。”

比布尔说话时从他的白大衣口袋里拿出两大块肥皂，一副崭新的橡胶手套，一包卫生棉，然后有条不紊地把这些东西装进他的公事皮包里。

“都得怪那个男孩，是他唆使她这样干的。她甚至敢对我和她母亲说，我们是一对老古板，她憎恨我们俩。你相信吗？这就是她说的话。我女儿变成这样，与邻居的女儿也有很大关系。邻居是一位上校，他的这位女儿在一家夜总会里工作。但愿你别看见那两个小荡妇是怎样打扮、怎样涂脂抹粉的！学校的教师拿她也没有办法。他们告诉我说：比布尔先生，所有的教员对您女儿都毫无办法。她用圆珠笔在她老师的鹿皮外套上写粗鲁的话。不过走运的是那小伙子还很通情达理。他告诉我，不要紧，比布尔先生，这不过是一件旧外套。但我还是花费了三千钞票给他买了一件新的。这都是她那个卑鄙的男朋友的过错！你

知道，他老是躲避我！但我要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有那么一天，我会当场抓住他们，然后把他送进监狱，而我女儿也将进教养院。这个烂娼妇！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女儿，我真想知道！她的衣橱里装满了她姐姐给她的衣服，可她会穿那些衣服吗？决不，不适合她'贵妇人'的身份啦！她只愿意把衣橱当休息室，有时整个下午都坐在里面，没有办法叫她出来。如果你责骂她，她反倒嘲笑你。你能怎么办？她已不可救药了，结局会更糟的！"

比布尔先生十分悲观地结束了他的唠叨。他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把硬币，几张揉皱了的十克朗纸币。这些钱是他用花言巧语从病房里即将死去的老年危重病人那里骗来的。他把这些钱转移到他的皮外套口袋里。他照了照镜子，梳理了一下稀疏、灰白的头发，举起手向我告别，然后走出了房间。

我终于能够安稳地坐下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翻到书中应该看的地方，肥胖的迈克萨先生便闯了进来。他一只手里握着一卷选举宣传画，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榔头。"该死的！"他叫道，并把宣传画扔在地板上，"我要打一个瞌睡。今天要上三十二小时的班。那个女人，就是那个护士长要我把它们张贴出去。"他指着宣传画说。画面上画着一个小孩微笑的脸庞，背景是工厂的烟囱和联合收割机，并写着这样的标语："投党的候选人的票，是为了和平和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在每层楼贴了三张，可是我们只有三层楼。"迈克萨先生说着走到他的衣橱前面，"于是我就在急诊室的门两边分别贴上一张。这不，还剩下九张啦！"

他从衣橱里取出一瓶啤酒，用牙旋动瓶盖，然后仰起头来把啤酒倒进口中。"真见鬼，这倒霉的一天！"他一边换鞋一边抱

怨，“如果有人找我，你应该知道如何把他们打发到别处去，让他们都走开，滚他妈的蛋！”

说完，他在只允许上夜班时才能使用的行军床上躺下。我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以免打扰他这不容易得到的休息。

现在已一点一刻了。我真幸运，盥洗室前面还有一根长木凳。由于走廊上没有人，更显得如死一般的静寂。通过对面房间那半开的门，我可以望见特别护理病房的里面。塔尼娅护士正在那里更换木架上的滴注器；一个身穿老式黑色西服的老人正坐在唯一的一张病床边注视着床上的病人。这完全是违反规章制度的，因为绝对不允许任何探视者进入特别护理病房。可是，这与我毫无关系。

我又翻开了书，继续了解斯韦特兰娜·阿丽卢耶娃对她残暴的父亲究竟写了些什么。

我还没读完一页，塔尼娅从对面房间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包烟。看见我手中的书，她问：“我同你一起看。你介意吗？”

她的长发又粗又黑，梳着蜂窠式发型；黑眼睛由于描了眼线，显得更大；上帝还赋予了她丰满的胸部。然而她那厚厚的嘴唇却极难引起人们的性感。也许是因为她虽然还算美丽诱人，但人们想吻一吻的那张嘴唇一旦分开，便会使那些褐色腐烂的牙齿暴露在外的缘故吧。然而，对于我，尽管她的牙齿那般丑陋（或许正是由于这些丑陋的牙齿），反倒让我特别地感到了塔尼娅护士身上那温柔迷人之处。

“当然我不会介意，”我说，“至少不会反感。”

“这是令人厌烦的一天。”她说。她递给我香烟，我对她说我不会吸烟，她就把香烟盒收了回去。“我下班后，要走很远的路，到家时很可能全湿透了。”

“你住在哪里，塔尼娅？”

“科贝利西。从电车站到我家要走十五分钟。我还得费力趟过泥浆地。”她解释道，“一年前，他们挖坏了街道，据说是为了安装煤气管。可是并未完工，他们便突然离开了。从此留下了那坑坑洼洼的路面。”

“没有安上煤气管吗？”

“没有。听说我们那里的屋可能要拆迁。你在读什么？”

“有关斯大林的。”我说。这名字对她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塔尼娅最多不过二十六岁，那个独裁者去世时，她甚至还没进学校读书。在我们这个国家，已故的统治者们很少被人谈论，除非是遭到漫骂时才会被提到。

“我发觉你总是在看书。”她向我倾过身来，以便看清楚书上的文字。她试着读这本外国书时，厚嘴唇无声地抽搐着，“你懂英语吗？”

“这个，”我有点勉强地回答，“并不是很难的。”

“我学过一点法语，”她说，“是我母亲要我学的，可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你读的那些书都是用英语写的吗？”

“不是。只要能到手的书，我都要读。”我解释，“上次读的是柯克加德的书，仅如袖珍本那么大小。”我赶快补充了一句，免得她以为我在夸耀自己。

的确，我是根据大小来选择读物的，这便于让那些书能装进我白外套的口袋里。在工作时，一有机会，我就可以方便地把书拿出来读。这样，至少部分地有助于缓和我对新职业所产生的不满情绪。

“你是在哪里学的英语？”塔尼亚问。

“大概在学校，我记不清楚了。”我含糊地回答。

“你曾在国外住过，是真的吗？”塔尼娅追根究底。

“是的。”我承认。

“是伦敦吗？”

“也去过那里。”

她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我想，我现在该打发卢霍塔先生回家了。”她说，并指着那位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唯一睡有病人床边的老人，“院长允许那老头进入病房。我猜想，老头可能曾经是院长的裁缝。他就像这样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已三天了。那老太婆今晚要去世，最迟明天早晨。明天我上夜班。”她说。显然她很高兴，老太婆死时她将不在场。“你认为到明天雨会停吗？”

“你搭我的车回家，塔尼娅，”我提议，“愿意吗？”

“你今天开着汽车到这里来的？”

“是的，今天早上的雨太大了。”

“可是，我不知道……大概不顺路吧。”她说。

“我有一个朋友住在你家附近，”我只好骗她，“我一直打算去看望他。”

“好吧，我抓紧时间做事，这样你就不必久等我了。”她走进她的小房间。我继续读阿丽卢耶娃写的关于她父亲斯大林是怎样谋害他从前的朋友和同志的书。

一点五十分，我站起来，回到休息室，迈克萨先生到现在已经在那里睡了整整一小时。我同情他。他不得不补足昨晚的睡眠，为下一个夜班做好准备。我试着尽量不弄出声音悄悄从他身边走到我的衣橱旁。可是，迈克萨先生睡觉时就像一条警惕性十足的狗。他睁开肮脏的眼睛，盯着我，打着哈欠，宣布：“真狗屁，我竟然又可以对付一次性交了！”

他说这话时，我正把毛衣拉到头上，使我可以避免评论他刚才的话题。

“你下班了吗？”他问，又打了一个呵欠。

“是的。”

“天上还在撒尿吗？”

“是啊！”

“我非常需要和女人做伴。刚才我大概梦见了女人阴部之类的东西啦！”他说着坐了起来，“那位一本正经的女人在护理病房里值班吗？”

“你指的是塔尼娅吗？”我问。

“是她，塔尼娅。她决不会献出那个东西的，天知道她把自己看成是什么人了！一本正经的女人，就是这样。”

迈克萨也在医院里干护理工作。他体重至少有两百五十磅，身高六英尺。他的年龄，我却从来都没有估计出来，但他不可能只有四十多一点。他的妻子比他年轻得多，完全可以当他的女儿。她有时到医院来看他。看上去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面目虽然有点粗糙，但不乏魅力。

我猜想，她也许是个店员，每次我看见她时，她总是对着某个东西傻笑。毫无疑问，她有这样的想法：笑会使她更具有性的魅力。在床上，迈克萨先生经常说，她要求来三次。第一次要他从上面来，然后从左边来，第三次从右边来。迈克萨详细叙述了这一切，为了显示他尽管年龄大，又肥胖，但仍然健壮，精力充沛。

“谁下午值班？”

“我不知道。”我老实回答他。

“我打赌，肯定是贾纳。也不好，她是不会为我效劳的，她只

与院长干那种事。"

"真的吗?"

"院长是一匹合格的种马。"迈克萨先生站起来,走到他的衣橱面前,又拿出一瓶啤酒。然后用牙旋开金属瓶盖,瓶盖被吐在地板上;酒喝下去时还咯咯地发出声响,一口气便把一瓶酒喝光了。

"我还得给我老婆一个戒指,"他说,"谁知道我不在时,她会玩弄什么诡计?你见过她吗?"

"见过。"

"她很不错,"迈克萨先生夸耀说,"不仅在床上很棒,而且还常给家里带回钱来。唯一的遗憾是她太喜爱男人了。前不久的一天,她说,我们为什么不去玩加纳斯塔牌[1]呢?你知道那是什么游戏吗?"

"知道。"

"真不明白,这样一种乏味的游戏怎么能带给人们以快乐?"迈克萨先生困惑地说,"他们也不为钱而玩那玩意,你明白是什么原因吗?"

"不清楚。"我说,用毛巾擦了擦鞋。

"那是在她店里的一个女孩家玩啦!那是一个势利的女人,哥哥是律师。他们把烈性酒灌满肚子,然后貌似行为端正地在桌面上玩起加纳斯塔牌来。可是,突然间我朝桌下一看,那个坏律师正抓住我妻子的膝盖。于是结束了玩牌,我们动身回到家中。在家里,我强迫她在一把椅子上弯下身,我用皮带狠狠抽打了她。有两周,"迈克萨十分快乐地追忆,"我们只能从侧面干,

---

① 一种两至六人玩的纸牌游戏。

因为她不能仰着躺在床上，同时她也不再打呼噜了。”回忆完他的床第之欢，迈克萨打着呵欠问，“没有人找我吗?”

“没有。”我回答。

“哦，你为什么还不走?”他催我，“很高兴，你又下班了，我却还有十六个小时哩！假若夜间结了霜，女人们都摔倒在地，就是天助我们啦!”

“我认为今晚不会有霜，”我说，“收音机里天气预报有暖风。”

“那些家伙甚至对天气都要撒谎!”迈克萨先生驳斥我对预报的信任，接着又是一个呵欠，“这周我一共要工作九十六小时。”他重新在行军床上伸长四肢，“应该拿三千，不包括小费。”他终于闭上了眼睛。我来到走廊上等待塔尼娅，她正在换衣服。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竟然会有成为医院护理员的一天。我从前的一个报刊编辑同事曾警告我，当局打算剥夺像我这种处境的多数作家的薪俸，控告我们犯有“寄生”的罪行。虽然我知道这位同事提供的信息从来就很不可靠，因为他太喜欢杜撰了，但是这次的消息的确听起来有道理。因此我决定赶紧寻找一份非“寄生”的工作。我有一个熟人是外科医生，他答应到他工作的医院里去帮我问一问。他是那里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医院也确实需要护理员，这样，他们终于邀请我去进行了一次口头考查。

这件事发展得太快了，我觉得像落入了陷阱。我的薪俸并没有被冻结，我的一本书也写了一半。说实话，护理员工作一点儿也不吸引我，可是医院里的人好像非常愿意接受我，好像是为我提供了一条生路似的。我真不好意思拒绝他们的好意。为了既不影响我的薪俸又不辜负医院的好意，我同意利用业余

时间到医院工作。作为业余护理员，我终于到医院向护士长报了到。

护士长同我的年龄差不多,外表挺严肃。她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读过大学,在一所美国学院里讲过课,会讲四国语言,是一个专业作家。她长叹了一口气。她显然担心,受过太多的教育会妨碍当好一名护理员。她问,她称呼我时是用我的姓,还是用我的名字？接着,她又试图为我准备一套服装。为了找到钮扣完整无损的白衬衫和白外套,她尽了一切努力,可是都失败了。"哎,又丢失了两条裤子!"她惊叫道。"天啦,又是那个比布尔干的,我敢断定!"她给了我一条还很新的裤子,可看上去却好像是浆洗过的。她很委婉地要我为这些服装签个名,因为"我们必须遵守规章制度"。就这样,我正式成了医院的一名护理员。

太容易了。我认为除了变成死尸外,再也没有什么比变成一名护理员更容易的事了。

终于,塔尼娅出现在走廊的尽头。她穿着一件毛皮长大衣，戴着一顶毛皮帽子。我差点认不出她了。

外面,已是瓢泼大雨。我打开车灯和挡风玻璃的雨刷,开动汽车出发了。塔尼娅摘下帽子,一言不发地坐在驾驶座旁边。

"那位老太婆,就是她床边始终坐个老头的那位老太婆,"我问,"得了什么病?"

"肝癌,"她回答,"那老头一直坐在那里,握住老太婆的手，不说话,不吃东西。今天我设法使他至少喝了一大杯咖啡。他不会比她多活几周。你是知道的,有些夫妇,由于长期相依为命,是绝不能单独地生存下去的。"

她感到车子里很暖和,就解开了大衣钮扣。"他们告诉我，你也写书。"她没有盯着我。

我心里纳闷，是谁告诉她的？很可能是护士长，她看过我的档案。

“我从来没有读过你写的东西，”她又说，“我读的书不多，可是姑娘们说，她们读过几本你写的书。”

“这很有可能，我的书曾经在这里出版过。”

她沉默了片刻。“我敢肯定，你认识许多著名人物。”她换了个话题。

“哦，不。真的不认识。”

“我们这里住过各种各样的人，”她说，“来自电影界和戏剧界的，比如克雷乔卡。你认识他吗？”

我回答说，我认识。

“通常他们在我的病房里只呆一天，”她遗憾地说，“多数时候他们都不省人事。楼上的姑娘们非常生气，她们说，克雷乔卡什么东西也不给她们，只是送戏票。——她们说，你去过美国？”

“在那里呆过一段时期。”

“什么时候？”

“我是七〇年春天回来的。”

“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真没趣。“一个作家，流亡异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伤感地说。

“可是，他们不会让你再写东西，对吗？”

“是这样。”

“我也是从国外回来的。”她说。

“什么时候去的？”

"那件事[①] 刚发生不久。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她迟疑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他是我未婚夫。当他们八月进入捷克时,他只扔了几样东西在汽车里,我们就急忙开着车离开了这里。可是,我父亲还留在这里,我未婚夫又不能马上找到工作,于是我们商量,我暂时回来。很简单。"

"他是做什么的,你的未婚夫?"

"他是医生,"她又补充,"妇科医生。他比我大得多,有你这样大的年龄。"

"为什么你不回到他那里去呢?"

"哎,起初他还给我写信来,"她解释,"可是,突然什么音信也没有了。我猜想,他在那里已完了,在美国,现在。"

这时我们已驶过了特洛伊大桥。

"左边那条路,"她说,"然后上山。——不管怎样,我不想在那里生活。"

"为什么?"

"不知道。我想,也许是害怕。"

"哦,你会习惯的。"

"谁知道呢,也许我在那里找不到工作。"

"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有时喜欢,"她说,"但这工作可以变得令人非常厌倦。比如,上了早班接着又值夜班。"

"他们怎么会这样安排呢?"

"护士短缺嘛。"她接着说,"在某种意义上,这工作很不错,我不回家可以节约两小时旅程。可有时,我感到一切都没意义,

---

① 指苏军入侵捷克。

我感到不能继续干下去了。我希望你理解这种感情。”

“是的,我能理解。”

“我母亲过去常说,爱情和友谊是最好的治疗。”

我们已到达目的地。她指着一幢黑黢黢的小屋说:“我们到了,非常感谢你。”

我停下车。她取下手套,伸出手来,“你真好。非常感谢……你愿意进来喝杯咖啡吗?”

“我不喝咖啡。”

“我想,你一定很忙碌。我的意思是,你急于要想去看你的朋友。”

“不,一点也不。”

她的房间很小,但仍然像库房一样寒冷。她请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她打开暖气后,就去给我煮茶。

房间很普通。花瓶里有几枝花,几个规范化的框架里有一些低劣的风景画,书架上有几本书,是受到控制的我们国家出版社出版的书。房间里一切都弄得纤尘不染,就像在医生巡视之前的一间病房一样散发着清爽的气味。家具是现代化的,雅致大方得令人赞叹。门上方有一个木十字架。

“我父亲叫人给我做的这些衣橱,”她告诉我,“价格非常高。你想听听音乐吗?”

我表示无所谓。她拿来一盒彭德里基录的磁带。

“我父亲的妻子今天下午上班,我们可以安静地听音乐,”她边说边装上磁带,“她不能容忍我,不能容忍我做的一切。”

“你母亲去世了?”

“十年前就去世了。她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又住了一年医院。在医院时她给我写了很多信。充满了爱的信。她

是……”塔尼娅泪眼盈盈，嘴唇颤抖着。她很快站了起来，走去拿茶。

我听着音乐。我还是个孩子时，确切说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就常常幻想在一所医院里与一名护士做爱。我幻想，我像一个病人一样躺在病房里。我没有想象具体是什么病，可是无论是什么病，都不会阻碍我做爱。想象中，护士在病房里有她自己的小房间，在她的小房间里，有一些装满药物的食橱，天知道为什么，还有一道屏幕。夜间，她来找我，用手势示意我跟她走，我陪着她去了她的房间。进入她的房间后，她允许我帮她脱下雪白的工作服。随后我把她抱到屏幕后面，那里有一张白色的医生睡的床。剩下的就不用再叙述了。我不知道，那时我为什么要选择一位无名无姓的护士来作为我性觉醒后情感归附的对象。也许我当时认为，护士兼有母亲和少女的美德，这些美德正符合护士仁慈的天职。这一切都是二十年前的幻想，而塔尼娅刚才又把她的工作服留在了医院里，更不用说，她的房间里根本没有屏幕。

她端来茶，是用精细的瓷杯盛的，瓷杯上有中国的装饰画。她换了一件钩针编织的薄衬衫。穿这种薄衬衫她一定冷极了。

“你在医院干的工作使你厌倦吗？”她问我。

“我在医院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哩。”

“有的早晨我看见你把垃圾倒出去。我认为你不会在医院干很久的。”

对这个预言，我当然难以置辩，因为我的合同仅至年底满期，我根本不打算要续订合同。

“医院的护理员从来就呆不久，”她说，“迈克萨先生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他在病房工作，可以得到很多小费。在医院里，连

囚犯们能得到的我们都得不到。就拿那位比布尔先生为例吧，他曾经有五次当过餐馆的经理，每一次都被赶走了，因为他的账薄上总是收支不平衡。最后，他被关进监狱，出狱后就到我们医院来了。他是一个让人害怕的小偷，对人十分粗鲁，可是他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代替他。”

“这个，并不令人惊奇，”我说，“谁愿意为那么少的钱干活呢？”

“他们说，你对病人很好。”

“他们是谁？”

“哦，我只是听说的。但是，你的确不是一个真正的护理员，对吗？”

的确如此，我尽可能和蔼可亲地对待那些暂时委托给我照料的病人，对他们的问题至少表示一点关心。但我经常关心的还是尽量挤点时间读书。对病人友好，这一点当然没有写进我的职责表栏里，他们没有要求我这样做，也不可能因付了我那点工资而要求我这样做。

有一次，我用一个老太婆的手推车把她从一个诊断科推到另一个诊断科，最后还得把她和她的东西移到病房里。那个老太婆肝脏有毛病，皮肤很黄。我们都知道她只能活几天了。她请求我抓住她的手，“行吗？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孤苦伶仃的人。”对她的请求我感到很别扭，她的皮肤黄得令人厌恶，一身尿臭味，可是我还是拉住了她的手，抚摸她的黄前额，同她一起等待着另一次无用的检查。她闭上眼睛躺在手推车里，默默地紧握我的手。

最后当内科病房接收了她后（由于某种原因，每一科都尽最大努力拒收那些即将死去的病人——也许在他们考核的某种指

标中，死亡数最少的科将得到一份奖金，或者，至少可以得到一张娱乐证），她想给我一张十克朗的纸币，我坚决拒绝了（塔尼娅说得对，我的确不是一个护理员），可是她恳求我收下，恳求我去看望她。

我同意去看她，但没有接受她的钱。当然，我没有去看过她，我有许多别的令人不快的工作要干，有许多在我看来是耻辱的任务要完成。假若我接受了那张十克朗的纸币，也许会去看她的；而别的人则可能只收钱却不去看望她。他们过着这种虚假的生活已经很久很久了，对他们来说没有退路。他们已逐渐把这种虚假、伪善视为生活的法则，他们与他人的关系都受这一法则的支配。

磁带已放完了几分钟，我应该站起来离开了。

“我母亲，”塔尼娅突然说，“请他们叫一个牧师来，可是他们没有去。”

“为什么不去？不允许吗？”

“他们根本就不想去叫牧师，”她说，“按他们的说法，既然没有上帝，那么为什么要找牧师？当时也不准我留在母亲身旁。”

“你那时有多大？”

“十六岁。”

“我猜想，他们不想要你看见她死。”

“不是那个意思。”她用手帕轻轻地擦了擦眼睛，“为什么你不给我讲讲美国？”

“给你讲什么？”我感到惊讶。

“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她用诚恳真挚的眼光望着我。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挺孤寂、伤感的姑娘。

“下班回家后你干些什么，塔尼娅？”

"一回来,我就查一查是否有我的信。"她立刻回答,好像她一直都在期待这个问题似的。"然后我用吸尘器清扫房间,再去淋浴。吃完饭后,如果父亲的妻子不在家,我就放音乐磁带听。有时如果父亲的妻子下午上班,我就跟父亲聊天,或者一起去看电影。但现在我们很少去看电影,因为他的眼睛痛。"

"看电视吗?"

"不,我不喜欢看电视,电视使我心烦。全是谎言。他们不停地向你表示,生活是多么美好,人一点也不卑劣。其实,一切是那样的矫揉造作,那样的虚伪。有时我就翻阅过去的信。"她补充了一句,然后抬起头望着我。

"在你看来,人似乎是卑劣的?"

"我不想评价任何人。"她回答。

我们沉默了片刻,只听见外面雨水哗哗地响着。

"男人们残酷,女人也在尽最大努力不愿落后于男人。有些事没有任何男人愿意做,只有女人才做。"

我很可能流露出了怀疑的神情,因为她补充说:"如果我告诉了你,你一定会愕然的。"

"这是什么意思?"

"哎,可是我不能告诉你!"她又给我倒了一些茶,对我微笑了一下,免得我认为她对我怠慢了。

"为什么你不能告诉我?"

"我还不太了解你,"她承认,"如果你把我告诉你的事在什么地方发表出来,那怎么办?"

"怎么可能呢,塔尼娅?"我提醒她,"他们连一行字都不允许我发表,到现在都已五年了。"

"就算这样,可是你在会议上会讲出来。"

"我从不参加会议。"

"你不怕招惹麻烦吗?"

"怕什么,我才不怕。反正我现在的处境已够糟的了。对此我也无能为力。"

"好吧,我告诉你,"塔尼娅终于下了决心。"但另找一个时间告诉你吧。你还没有给我讲美国。我喜欢听国外的事。"

于是我们呷着茶,我开始给她讲述我是怎么在密执安教书,怎么参观过一个宗教组织,以及有关切·格瓦拉① 的荒诞剧和我在美国度过的第一夜情况。我已很久没有机会谈这些往事了,现在蓦然发现自己居然回忆起一些早已忘却的细节。经历了这样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对一个像我这样已有剧本在美国上演而目前却必须每天早晨取走脏被单、集中病人的小便、以及病人的癌细胞切块的人来说,那块遥远的国土似乎很不真实,就像梦幻似的。

"真遗憾,你在那里的时候我不认识你。"我一讲完塔尼娅就说。"如果那时我认识你,也许你会给我寄明信片或者信来。我敢肯定,你写的信漂亮极了。"

"我很少写信,我不太喜欢写信。"我说。

"噢,我可喜欢信。"塔尼娅站起来,打开衣橱,从里面取出一个大帽盒。"这里装的是我从幼年时代起就保留下来的全部信件。"她在盒子里随便摸了一下,抽出一封信读了起来:

"神话故事:

我想你一定会感到吃惊,我们刚一分手就给你写信。但我

① 切·格瓦拉(1928—1967),出生于阿根廷的职业革命家。后牺牲于玻利维亚。

必须写信告诉你。当我们探险归来回到你的城堡时，某个神灵把一根具有奇异魔力的草放在我们走的路上。真是妙极了！我们迷了路，真是妙极了！”

她把信放在一边，说道：“那时我十三岁，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就像这样互相写信。我这里还有一些名人签名的明信片。也有我男朋友的信，不过，他只给我寄了六封信。”

她拿起一扎用金黄色的缎带捆起的信，没有解开又放了下去。“这是我最后见到的他的信。好在我保存着母亲给我的许多信，每当我情绪消沉时，就读一读它们。她总是用一个鼓舞情绪的句子来结尾，比如‘祝精神愉快，塔尼娅。’或者‘友好地对待人们，上帝会报答你的。’等等。”

夜幕降临了，一切都渐渐隐在夜色之中，只有一点微光从门厅的玻璃门透进来。

我只需伸出手去，就能搂住她。我相信她不会拒绝，也许她正期待甚至希望我这样做。她属于那种女人，她们有意识地更可能是本能地筑起一道怀旧的屏障，而在这一屏障里，也许她（她们）渴望的不仅仅是拥抱而是性爱。但我竟然站起身来说：“我会给你写信的，塔尼娅，一有机会就写。”

“一张明信片都可以。”她说。

“我一定会写。”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动笔写信，第二周星期二轮到我再次值班时才写完。我用打字机把信打了出来，放进信封里。信是这么写的：

星期五早晨

没有人留意那个老头儿，直到老太婆被送到特别护理病房。凡是不可救药的病人就送往那里去等死。老太婆皮肤泛黄，面颊和眼睛凹陷，所有生命的痕迹都由于疼痛和吗啡而变得模糊。老头儿得到院长的准许，一大早就到这个阴暗的、充满恶臭和呻吟的地方。他把一张椅子拉到病老太婆的床边，坐下后就一直呆在那里，几乎数小时都不动一下。

“你不必一直坐在这里，卢霍塔先生，”第一天护士就对他说，“你的妻子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这里。”

“也许她会醒过来。”他说。

“为什么不坐在走廊上?”护士建议，“至少可以找个人聊一聊天。她一醒过来我们就会叫你的。”

他没有离开。他坐在那里，仔细地端详着妻子满脸皱纹的黄脸，偶尔站起来擦擦妻子脸上的汗水，然后把椅子移得更近一点，抓住她那无生气的、没有知觉的手。就像这样一直到晚上。最初，医院的人觉得他惹人讨厌，就像在一个熟悉的属于自己的空间里突然增加了一个陌生的非己的物件一样。后来，他们对他逐渐习惯了，正如人们逐渐习惯陌生的物件一样。他们甚至从来没去想过，他也许会感到饥渴，毕竟，他还是一个健康的老人啦;加之他们还得照料病人，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便也无暇去多想什么了。

他坐在那里望着妻子的脸，它正在迅速地变形，变得愈来愈不像他熟悉的那张脸。尽管他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止这变化，没有什么能拖延它的收缩和死亡，但他仍然难以相信，这件事将发生，就在一两天内就会发生。直到现在他才完全意识到能靠近这张熟悉的脸是一个多么大的恩赐。他感到非常悲哀和遗憾，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所有那些日子里，整整四十年，他很少有时间

像现在这样注视过这张脸，而正是这张脸曾陪伴着他度过了一生。现在，他才感到，已去的所有这些年里，他一直都远离这张脸，远离这脸上她的那双眼睛，也远离她的声音。在过去那些无法计数的夜晚，当他坐在会议室中倾听那些会议主持者许诺幸福，以及描绘一个美好的、威严的、繁荣昌盛的未来之时，她在干什么？在过去那些无法计数的下午，当他跻身斯巴达足球场之时，她在干什么？在过去那些无法计数的星期天和节假日里，当他跟随铜管乐队，敲着大鼓与乐队一道游行之时，她在干什么？他非常吃惊地发现，他们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里的多数时候，他都忘记了自己的妻子，不知道她在干什么。现在已回想不起她那张健康的脸，回想不起她做过的任何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

可是，也有那么些片断却清清楚楚地保留在他脑海里了。在那些片断中妻子脸上的每一个细节，神色、气味、声音、温度，他都记忆犹新。眼下，在这个充满恶臭的病房里，他似乎闻到从鲜花盛开的花园里飘入客栈房间——在那里，他俩婚前第一次睡在一起——的芳馨，感觉到那天晚上笼罩他们的床和他们的裸体的温暖和激情。

“卢霍塔先生，”护士对他说，“快八点了。现在你必须回家睡一会觉。”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他请求。

“已经是晚上了，”护士说，“你不能留在这里。”

“但是如果……如果夜里……那怎么办？”

护士看了一眼枕头上的黄脸，说道：“不会，还不会。不要怕。”

于是他回到了家，在煤气炉上煮了些咖啡，在那块吃了一周

的面包上切下一片。房间里寒气逼人,他考虑了一下,觉得没有生火的必要。他爬上床,很快就进入梦乡,仿佛他干了一天艰苦的工作。

第二天,五点刚过他就醒来了。几十年来他都是这样。一吃完早饭,他就回到医院。那张椅子还在原地,他一坐下去,就抓住病老太婆的手。医院的运作照常进行。护士手中拿着注射器走来,就像一只巨大的蚊子,要从失去知觉的身躯上吸取更多的鲜血(过后,护士再用别人的血来归还);一名医生走来,他看看记录,开出一些药方;很快,医院的饮食专家端着一盘饭菜也继医生之后走来,但是饮食专家不得不依然端着饭菜离开了,因为留在这里予以特殊护理的人都不能吃东西。当然,卢霍塔先生除外,可是没有人理睬他。终于,他妻子睁开了一次眼睛,大声地叹了一口气。

"你感觉怎样?"他马上就问。

她的嘴唇动了一动,但没有发出声音。她的眼睛又重新闭上。

房间里的浑浊让人透不过气来,他感到眩晕欲呕。可是他没有动摇,把这作为必不可少的不幸接受了,有如一种令人悲哀但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就像死亡一样,或者说就像这所医院一样。他也住过医院。十八岁那年他被送去参战,到前线的第二天就被一块弹片击伤了,被送到佩斯附近的一所野战医院。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住院。他没想到这竟然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他也没想到,今天在富裕者的家中和许多毫无用处的会议厅里,已有了空调设备。他又回忆起很久很久以前,他们被邀请到波希米亚林山去参加他妻子的一个堂兄的婚礼。他们下了火车后,妻子曾对他说过"空气真新鲜"或者类

似这样的话。那是夜晚，晴朗无云的天空里繁星点点。仿佛那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是从宇宙空间的某处飘来的。

饮食专家端着盘子出现在门口，又再次消失。枕头上的黄脸没有动一下。没有一点知觉。

他并没有一直对她保持忠诚。不忠的事发生过几次。每次事后，他当然也感到所发生事情的某种严重性，感到强烈的内疚；同时又对正在受他欺骗的妻子产生一种不合逻辑的气愤。有一次，他的确考虑过离开妻子与另一个女人结合，可他没有那样做。后来那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那个女人也逐渐从他的头脑里消失了。很久以前的这类不忠、欺骗和谎言早已忘怀了，而现在，这一切往事突然涌上心头，他感到它们是那样的卑鄙、荒唐，仿佛现在面对着即将死去的妻子，他又在重犯从前的那一切罪过，重新陷入谎言之中一样。可怕的是，他现在已不能向妻子坦白那一切，结果，使他撒过的谎永远也无法澄清，无法改变了。

老太婆呻吟了一声。老头儿弯下身去低声问："我能给你拿点什么吗？"

护士把挂盐水瓶的架子拖到床边，在盐水瓶上装上滴注器，然后把针扎进病人的手臂。他在一旁观看，清澈的液体缓慢地滴入透明的胶管。

他想，同背叛她的那几天，或者那几个月相比，他对她忠诚的日子要长得多。可是，他知道，不能像这样来衡量忠或不忠。不忠只是一种短暂的行为，而忠诚则应该是一种恒定的心理状态，只要以相同的行为就可能两相抵消，所谓"不忠"便不复存在了。什么样的行为呢？当然是指一次充满爱意的行为，是的，很可能是这样。

他试图回忆某些好的、善良的行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

回忆起与她的某次具有爱意的行为。他想起了他给她做过一件大衣,尽管他根本不是一个裁缝。那么能够把这件事作为爱的行为吗?他亲手缝那件大衣是因为这样做比给她买一件便宜。他们也一起出去跳过舞,然后在夜里把她送回家,尽管他有时已疲惫不堪,还必须在早晨五点半起床。可他这样做并不是没有私心的,送她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公园,他们可以靠着一棵树亲吻,甚至可以躲在灌木丛里匆匆做爱。他们曾经年轻健壮,她的头发长而密,她的皮肤细致雪白,每当他抚摸她就会激起他的情欲。现在这一切在他看来似乎已不可思议了。

偶尔遇上她生病,只好由他来做饭,甚至洗衣服。可是她的一生都在为他做同样的这些事,尽管她也有自己的工作,有时要到晚上才能从工厂回到家。他从来没有因为她而坐下来想一下,他只对他自己的事而不是对她的事感兴趣。现在他意识到,她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充满过欢乐。他并不为此而谴责任何人,甚至他自己。他不能想象生活的道路原本可以有所不同,或者说更幸福。

夜幕再次降临。他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走廊上,迈下两段楼梯,走出医院,步入充满着新鲜空气的街道。凉风使他清醒了一些。回到家里,他发现面包已经吃完,于是在碗橱里搜出一块不新鲜的面包卷来,就着咖啡吃。面包卷放的时间太长,甚至连上面的绿色霉点也已经干了。他感到非常疲倦,浑身软弱无力,不想上床睡觉。他离开饭桌,走到卧室里。一个大衣橱里放着几匹昂贵的细布。他意识到,这些布只好用来打扮他妻子。她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实际上,她没有一件她能穿的衣服,因为她体重减少得太多,她的衣服全都大得不能穿了。

他开始裁剪布,心里很高兴,有事可做了,可以让灯一直亮

着，不必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老太婆的脸更加萎缩，皮肤变得全黄，眼眶凹陷，鼻子显得更加凸出、更加尖。她的小手布满了青筋，护士刚才就是把滴注器与其中一根青筋连接起来的。

他把椅子拖得更靠近床边，整理了一下妻子头下的枕头，弄直毛毯。他突然产生了一阵恐惧：她也许已经死了。他朝她弯下身去，想检查她的呼吸。

她的脸一动也不动。他想，她虽然还在呼吸，但她也许已不在这个房间里了。那么，她到哪里去了呢？很可能她孑然一身，已避在某处了。她肯定是这样，因为她习惯这样了，事实上，她一生都是孤单的，非常孤单。没有孩子的女人一直都孤单。尽管从前他对这件事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但如果他真是想到过的话，那么，更多地也只是指责她使他失去了大多数男人都可以体验到的那种快乐。现在他意识到，她肯定同样因此而痛苦过，而他，不仅没有替她消除痛苦，反而在许多夜晚把她一个人扔在家中。他回忆起，她曾多次建议一起去看电影，但他推辞了，而且对她说，他对这些日子上演的那些拙劣的影片一点也不感兴趣。

"卢霍塔先生，"护士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散散步？她根本不知道你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想去散步呢？"

他仍然呆在那里。到了中午饮食专家端着盛满饭菜的盘子朝里面望了一下，他感到了饥饿，可他不愿理睬饥饿引起的疼痛。房间里很闷热，他觉得挺不舒服。他们应该打开一会儿窗户，可是窗户很大，大量的冷空气会袭进来。他把头朝后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让自己休息片刻。很快，他又回忆起另一件往事。他仿佛看见了他童年时代生活过的那间房子，看见母亲在这间房子里即将死去的情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到现在为

止,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两次大战后,人们开始乘飞机、驾驶汽车、修建高楼大厦、使用电灯,但此时此刻他觉得他闻到了蜡烛、大蒜、鸭绒,以及他母亲在门边的房梁后面晒干的草药的气味。外面一片漆黑,从那片黑暗中,影影绰绰地闪现出幢幢人影,一些他多年没有回想过的人,那些早已离开人世的一些亲戚,他的两个还是姑娘时的姐姐,一位女邻居(她的名字已回忆不起了),最后是穿着黑袍法衣,戴着帽子,手中拿着一个十字架的牧师。这时,最后的情景突然在多年前那个场合的一片静穆中停留不动。跨越已逝去的时空障碍,他能感觉到那个场合特殊的庄严气氛。当时他很可能没有注意到那种庄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认为所有的牧师都是些骗子,都是一些只给人们麻醉剂的骗子,认为唯一的生命是在地球上,赐给人类的唯一王国需要他们去改造,而他乐意去改造。

他回忆起他的确去过教堂,陪伴着他母亲的遗体。那座古老教堂的雄伟壮严的闾屋顶高耸于别的屋顶和大树之上,从附近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望见它。那是他最后一次,的的确确是最后一次进入一所教堂。他脱下帽子跪了下去。他永远也不会再那样做,那种做法与他的信仰相抵触。"上帝"这两个字他听到过无数次,他坚信,上帝仅仅是人们为了使别人服从和谦让而创造出来的。

现在他又看见了那所雄伟古老的教堂,以及教堂里的木头凳,村民们晒黑了的脖子可笑地被束缚在僵硬的白衣领里。他还闻到了弥漫在教堂里的香味。风琴拉了起来,女人们开始哭泣,接着教堂的钟鸣响起来,钟声传遍了乡村。那个场合的庄严气氛能使你热泪夺眶而出。他的眼泪真的涌了出来,但他的哭却是因为他当时太年轻。他的腿结实而健康,他的眼睛能够望

得见远方。

“卢霍塔先生，”护士说，“我给你拿了点咖啡来。”

很长一段时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注意到他是一个活人。他接过杯子，把杯里的咖啡都喝完了。尽管他竭力控制自己，可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大声抽泣起来。

“今晚你可以早一点回家，”护士温和地说，“但明天一定要来。”

他明白她的意思。天一黑，他就离开了医院。

他在等候公共汽车的时候，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忧虑，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她。现在她面临的是那个令人恐怖、无法解释的状态，即停止生存，与有声音、气味、颜色的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的状态。

突然，他怀疑起来，他使他和她的整个一生都远离上帝，这样做是否铸成了大错呢？一个人一生中要犯许多错误，但假如他在生与死这样一个最重大的问题上走错了一步，那怎么办？

星期五早晨，黎明到来之前他就到了医院。房间里没有任何变化，她仍然躺在靠近窗户的床上，静止、冷淡，对他所看见的、听到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反应。

他把装有夜里给妻子缝的衣服的包裹放在妻子床边的小桌子上，然后在椅子上坐下来，又思索起上帝。他学识不高，尽管年轻时曾阅读过大量的书，对任何像“上帝”那样复杂难解的事（他认为上帝是复杂的），他还不能形成自己的看法，只能依据那些比他学问高的人、那些他信任的人告诉他的话去理解。可是现在，他觉得他信任的大多数人欺骗了他。他们坚持认为能实现富于正义和尊严的生活，能盼到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可是，至今什么也没实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又被揭发出认定为叛

徒、罪犯。他早就对这一切失去了兴趣:这些人,以及他们慷慨激昂的讲演;他们的诺言,他们的欺骗。他根本不想思考。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如果他们在许多事情上对他撒谎,那么他们是否在上帝以及世界的起源问题上也欺哄了他。也许他从前坚信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也许连地球都不一定是围绕着太阳旋转,星星不一定是无法想象的那样遥远,世界不一定有亿万年的历史。假若是这样,那么一切事情,他一生都弄错了,他也把她渗入了同样的错误深渊。突然,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想法:正是由于他的错误,她现在才躺在这间冷酷无情的房间里。在这里,人的一切尊严都逐渐消失在死亡的传送带上;在这里,闻不到药草散发的芳香,听不到祈祷声,听不到任何勉励和安慰的语言;在这里,没有人说声“再见”,没有人流下同情的泪水;在这里,一切希望都在消失(除了那瓶多滴了一两天,将液体滴进一个无知觉无生命的血管里的盐水瓶)。

饮食专家在门口闪现了一下,又离开了。雨嘀嗒嘀嗒地打在窗玻璃上。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劳,就好像他也即将与世长辞似的,好像他永远也离不开这把椅子似的。

过去他没有想到过,他需要和她经常交谈。他只对她讲一些琐事,诸如钱,或他们都认识的人,最多,他有时会向她抱怨自己的工作。他们坐在同一桌子上吃饭时,他才同她说话。在那种时候,保持沉默比谈话更费力。而现在,他迫切希望跟她说一说话,对她讲他思考过的那一切,请求她的宽恕,问她是否需要一个牧师。他多么想她能恢复知觉,那时他就可以问她了。他曾听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恢复知觉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决计要问一问医生,如果要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他应该做些什么呢?他满怀希望地抬起头来望着滴注器,清澈的液体从瓶子里

缓慢地流进老太婆的血管里。

护士走进来，突然弯下身去，接着伸手去取滴注器，解下胶管，最后她才转向他说："没有必要再呆在这里了，卢霍塔先生。老太太已经离开了我们。"说完后护士就离开了房间。

他站在床边，注视着那张再也没有发生变化的脸，那张现在据说已经死去的脸同他早上到这里时据说她还活着时的那张脸一样的平静，一样的黄。当然与他过去熟悉的那张脸已截然不同了。这个变化是缓慢的，而且很难察觉出来，正如所有类似的变化一样，因此并不显得特别悲惨，甚至看不见变化，尽管它的结局是生和死的区别。

他忽然想到，他应该把死者的眼睛闭上，他母亲死时，他父亲就是这样做的。或者祈祷一声，至少也应该说一声再见，动一动嘴唇，哀悼一下。可是，他仅仅是这里的一个客人。他从床边的桌子上拿起包裹朝后退了几步，因为几个护士已推进一张旧的推床，并把它们靠在墙边。接着她们把毛毯从床上拿走，剥去死者身上的睡衣。他瞥见了妻子消瘦的身体上布满了注射留下的针眼。最后她们合上她的眼，用一张被单盖在她身上，把轮子系在床脚，推着她走了。

他不知道现在该做些什么。没有人理睬他。也许他应该回家，可是他感到在离开之前，应该做一点什么，于是他跟在护士后面。他们把有脚轮的推床和他的妻子推进了一间房间。这间房子像贮藏室，装满了被扔弃的椅子、架子、没有门的衣橱、床的金属栏杆、一大包棉花。

"鲁多尔夫，"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门口喊叫，"我们已把洛托瓦带到五十号房间，几小时后就得把她搬走。"

"天哪！"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她为什么不能多坚持半小

时？我该下班了，明天是星期六呀！”

“好啦，你就下班回家好啦，”又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去报告时，就说她是半小时后死的。”

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这里的空气比病房好，但仍然被香烟的气味污染了。显然这间房子不仅仅是用来装废品和死人的贮藏室，同时还用作休息室，人们可在这里吸烟。

他望着那张床。由于装上了轮子，那张床显得特别高。他们用来掩盖尸体的那张床单看上去平平展展，使他怀疑她是否真的躺在那里。

周围一片沉寂。终于他意识到——这个意识是逐渐形成的——这的确是死亡，一切都结束了，他完全可以站起来离开这个地方。但他没有地方可走，没有理由走。他突然想起了一句话，一句他的老板特别喜欢说的话。回溯到那遥远的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学徒工。每当老板拿起裁缝沉重的熨斗，给一件新外衣最后修饰加工时，就要说：“结尾恰是我们劳动的最后点缀！”

他闭上眼睛，不知不觉一种绝望的悲哀从内心深处往外涌：我们像狗一样来到这里，像狗一样被置放在这垃圾堆上。是被谁把我们驱赶到这里的？我们的主人是谁？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忠心耿耿地为之服务的人是谁？而现在，我们却在这垃圾堆上！他似乎听见了那柔和的沙沙声。他抬起头，看见一群乌鸦正无声地在秋天灰色的天空中飞翔。这不正像他小的时候，他们追逐嬉闹着朝着田野里奔跑时常看见的情景！此情此景使他平静多了，他耐心地等待着那熟悉的哇哇的乌鸦的鸣叫声。可是什么音也没传来，没有什么打破他周围的沉寂。

门开了，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走进来。那人穿着一件肮脏

的白外衣，身后拖着一辆装有橡胶轮子的古怪的金属手推车。他吃了一惊，蓦地跳了起来，急忙朝后退，以免挡住了那人的路。那高大的男人走到床边，拉开白床单，他妻子裸露的躯体暴露在外，就像一个蜡人一样。那男人用手推车朝床撞去，然后揭开车顶上的盖子，转身向着他说："我的伙伴病了，你愿意帮我一下吗？"他走到床边，抓起妻子的脚，她是那样的轻，轻得使他简直不能相信。不过，他知道，那高大男人抬的是死者的上身，自然他就觉得不很重了。

"今天倒霉透了！"那男人说着用手背擦了擦红润的前额。"昨天死了六个人，都是女人。随着秋天到来，那些老姑娘很快地就像苍蝇一样倒下了。其中一个女人肯定有半吨重，我觉得我无法把她抬上车。"那人张开大嘴打了一个呵欠，然后砰的一声关上车子的盖子，把它推出了房间。他惊讶地意识到，她从他身边正被人带走，他却连再见都没有说一声。他什么也没有做，没有把那件新长衣穿在她身上，也没有把衣服交给别人，让他们给她穿上。好一会儿他才清醒过来，把包裹夹在手臂下，急忙朝楼梯走去。

"卢霍塔先生，"护士在他后面跑来，"我们到处找你。你妻子的东西在这里，你拿走它们吗？"

他停下来。"现在吗？"

"等一会。"说完她离开了他。他站立在一扇大窗户旁边，听见楼下运货电梯门响了一声，接着看见高高的橡胶轮子的手推车出现在楼下院子，穿着肮脏白外衣的高大男人正推着它。

"给你。"他听见身后护士的声音。她抱了一堆他妻子的东西：外衣、内衣、晨衣，一双鞋上面还粘着一小块硬泥块。他伸出手，护士把那堆东西放在装着新衣服的包裹上面。"现在我们还

需要你签个名。”她说完就递给他一张表格。当注意到他脸上呈现出吃惊的神情时，她说，“当然啰，我们必须遵守一定的规章制度。”

星期二下午，十二点三刻光景，我在盥洗室外面的长凳上坐下。这次我身上除了我自己的手稿外，还有茨威格① 写的《巴尔扎克传》。特别护理病房的门紧闭着，我从迈克萨先生那里探知，塔尼娅在值班。

我的上班时间很长，一直要到晚上六点。我不可能错过她，除非由于某种原因她被叫走。这样的事当然是可能发生的。不过，不管怎样，我完全可以在别的时候把信给她。可是我却焦急地等待着，几乎就像一个情人在等待一次约会。

大约二十分钟后，她拧开门朝外看了一下，看见我在走廊上，她微笑着又消失在房里。接着她手中拿着一包烟走了出来。

“又在读那本有关斯大林的书吗?”她问。

“不是。这次是读一本描写一个比斯大林好得多的人的书。”我回答。突然，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使我不愿把信交给她。“那位老太婆死了吗?”

“哪一位老太婆?”她问。然后她明白了，“噢，她，她是星期五死的。我告诉过你，她活不长。”

“她的死不再使你感伤了吗?”

“如果你每次都感伤，你会疯的。”她说，“有时，我的确为死者感到悲伤，如果死者是年轻人时，或者当我看见有人为他们痛

---

① 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作家。在其所著传记中反映出欧洲文化的人道主义观点。

哭时。”

我们默默无语地在那里静坐了一会。后来我终于克服了窘迫，把信拿了出来。“瞧，我给你写了点东西。”我对她说。

她接过信封，抽出信纸。有好几张，整整一打。“都是给我的？”她惊奇地问，因为她看见第一页上没有姓名。

“是的，给你的。”

“我能读吗？现在？”

“随你便。”

她把十二张纸铺开，读了起来。

她读得很慢。我企图从她的表情推断她理解了些什么，可是枉费了心机。也许这时离开她更好一点，但我鼓不起这个勇气。

她终于读完了。她小心翼翼地把信纸一张一张地折好，把它们放在凳子上，她的身旁。“你知道吗，”她说，好像继续一次被打断了的谈话，“我总是努力去做我能够做的事，直到最后的时刻，即使我知道没有什么可做的。”

“别人也是这样吗？”

我非常失望，她竟然对我写的东西不说一个字。毫无疑问，她对这封信肯定有一些感受，回想起她对我们国家的电视节目的批判观点；我也希望过，她会感谢我写人生而不美化任何事物。

她摇摇头。

“为什么？”

“哎，我不知道……”她说，“我猜想，你对事物的真相有一个完全错误的看法。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曾经也是。还有我的母亲……可怜的人……”

我完全不明白她在谈什么。

她诚恳地望着我。我注意到她左边面颊上有一颗眼泪，就在她的眼睛下面。她擦掉眼泪，"上次我不想告诉你，可是我要告诉你的，但你必须答应不对任何人说。"

我点点头。

"楼上，就是你工作的那个地方，"她说，"当看见病人不再有希望时，他们就配上一种注射液，你知道吗，巴比安酸盐等等，他们把这种注射液称作鸡尾酒。这种注射液打进病人身上后，病人马上就会断气。"

"是谁配这种鸡尾酒？"我问。

"这个问题，我不会告诉你的，请不要介意。但医生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他们对所有人都这样干吗？"

她那双黑色的大眼睛盯着我。"不要对任何人说一个字！"

"当然不会。无论如何他们所有的人都会否认的。"

她点一下头。"我真的可以保留这个吗？"她站起问，并指着凳上的信纸。

"行，当然可以，我是给你写的。"

塔尼娅小心地把纸重新放回信封里，确信它们进入她的帽盒前不会被揉皱。而我这时正在计算年底前我还要值多少天班，到那时我一定要离开。楼上，天使般的维娜正在配致命的鸡尾酒，为我留做预备。在我下面的地下室里，比布尔先生偷偷地挪动步子，去窃最后剩下的那包棉花，然后把盗窃到手的东西安全地藏进休息室里。迈克萨先生为了恢复体力以便应付他那无休止的班，正在休息室里睡觉。在我周围，世界朝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迅速前进。

"我真心感谢你，"塔尼娅说，"非常感谢。"

星期六早晨

一个窃贼的故事

我们的工地位于山脚下。山上,正在建筑的高楼大厦的骨架高耸云霄。我们应该建起四个预制汽车库,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属于库房的组成部分立了起来。除了我们挖的四条潮湿、空荡荡的地基沟外,什么也看不见。

我正在同克拉利克博士一道筛沙子。他是我们工作小组的工头,或者说是组织者。

我们小组的另外两个成员,沃尔夫博士和梅鲁卡博士,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挖土。我们使用的筛子很陈旧,筛眼太密集;也许是沙子太湿也太粗了。不管怎样,多数沙子通不过筛眼,不断地倒回来。

"喂!我们很快就结束了。"沃尔夫博士大声宣布。他没有胡须,光光的桃红色的脸上像往常一样流露出满足的神情,"这个时候木料是不是该送来了?"

此时,我已无法再对他们隐瞒坏消息了。直到刚才,我还一直自我安慰:今天我们反正完不成挖沟任务,只能把浇灌混凝土



的工作留到下个星期，到那时我会设法得到必须的木料的。

"今天没有木料。"我告诉他们。

"胡说！"克拉利克博士把铁锨插进沙堆里，"那么，是你没有定购木料吗？"

"我定购了。"

"难道你没有偷偷地给那些无赖塞东西吗？"

"哎，记得吧，我只有五十克朗。"我提醒我的朋友们，再说，这些谨小慎微的博士曾吩咐过我，不能多给小费啦。"我把五十克朗给了前天给我们运水泥来的那些家伙。"我把获得水泥那件事看成是一个特别值得赞扬的功绩。尽管，说实话，与其说是我的功劳还不如说是我的老同学利博的功劳。我值得夸耀的仅仅是：我有一个胆量过人的同学。"找几块木板不应该困难，"我接着说，"当然比找水泥容易。"

"唉，我希望如此，"克拉利克博士表示怀疑，"他们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木料呢？"

"下周。"

"下周什么时候？"他想知道得更具体一点。这是他那令人讨厌的迂腐的职业特点。

"星期三。"我只好撒谎。实际上我得到的只是不明确的保证，我并不知道在下周的哪个时候会得到木料，不过我已经接受了这种含糊其辞，就好像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同时也答应下周要供给滑雪橇、打字纸、香蕉、蓄电加热器、可可粉一样，以及修理我的汽车以及其他人的汽车的配件、打字机、半导体收音机电池、西红柿、棉布汗衫、安全别针、维生素 C……天知道还有些什么！

可悲的是，我素来讨厌为物资的匮乏而烦恼。每当我从街

上排着的一个长队面前走过时，我总要为队伍里的人们感到难过，虽然我知道这些日子他们不排队就什么东西也买不到，他们却又具有强烈的占有欲，渴望占有一切物资。为了占有，他们可以浪费时间。这些时间，他们完全可以用来做些别的更有益的事。

有的人还喜欢四处逛荡，寻找可买的东西。例如，我的老同学利博就是这样一种人。在战后困厄的日子里，我们曾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他就知道到何处可以买到色情画，何处能买到印好了维吉尔[①]的《牧歌》和西塞罗[②]反对加蒂兰[③]的长篇激烈的演说辞译文的考试答案，以及何处去买瑞士秒表、大量的美国香烟、瑞典生产的避孕药物，还有挪威生产的运动衫。他还给自己找到一个姑娘，这一点，我们其他人还没有开始去想。那时我对他这方面的才能非常崇拜，因为我也很想要一个姑娘，可就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又能够获得哪些东西，我就知道得不多了。四年级快结束时，他的拉丁语和物理没有考及格，不得不离开学校。然而，这却为他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展现了一条新的地平线。无疑，这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料，更不用说我们的惊奇。我们这些在掌握所谓逻辑严密的字谜游戏中比他成功的人，都对他赞叹不已。

算了，我没有资格去说别人，因为我也没有能够抵抗住我们的拜物教文明的引诱，也买了一辆汽车。真的，我对这玩意儿爱

---

① 维吉尔(公元前 70—前 19 年)，古罗马诗人。

② 西塞罗(公元前 106—前 43 年)，古罗马哲学家。

③ 加蒂兰(公元前 108—前 62 年)，罗马政客及阴谋家。

恨交织,我用它,可也害怕它。

买了这辆汽车后不久,我决定把全家人带到山里去。我们冒雨行驶,才走几公里,车胎就被刺破了。这使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既已如此,我又不得不强迫自己继续朝前开,眼睛直视前方,恭候着下一个灾难的来临。还有一半路程才到达目的地时,我听见发动机发出奇怪的嗡嗡声。我没有十分把握,不知是否真出了什么毛病。我问其他人,想知道他们也听到了什么声音没有,而他们也不能肯定。我只好停下车来,走到车尾去检查。这辆车有一个后发动机,这情况我是知道的。打开雨水冲刷过的机器罩,我看见各种零件在里面翻滚,发出喀嗒喀嗒的响声。这声音听上去似乎更加不吉祥,同时我还闻到什么东西燃烧的焦臭气味。

我拉出量油器,在同这无生命之物的搏斗中,这是我能够想到的唯一办法。油门已开到最大,我知道,尽管发动机还在运转,但并不能让人得到安慰。突然,一种东西引起我的注意,那是微小的滴状物,我恐怖地感到,这是熔化了的金属。现在,它正好从我刚才拉出量油器的孔眼中喷射出来。我跳回车子,停下发动机,用戏剧化的语气宣布:"发动机在熔化!"

经过那次遭遇后,我应该把车子卖掉。可是我没有骨气,反而还要修一个车库去安抚它。

如果我压根儿不知道,有三个人都准备在一块可以容纳四个车库的土地上修建汽车库,我也不可能想到干这样的事。

我去拜访克拉利克博士时,另外两个人也来了。沃尔夫与我年纪差不多大,他的教名叫弗拉基米尔,他的外表像一个性情温和,但满脸粗糙痕迹的乡下人。梅鲁卡博士的教名也叫弗拉基米尔,年龄大一些,他沉默寡言,具有自制力。但格鲁卡一副

病容，在健康人中间，根据各自的性情，他要不就激起他们的同情，要不就惹他们反感。

我被引到起居室。由于我是在一个专家治国论者的家庭中长大的，也就是这个家庭曾主张由科学技术专家，或按科学技术专家提出的原则实行统治，所以，这里的一切使我回忆起我童年时代的家。克拉利克博士房间里的一切都实用整洁、有条不紊，只有窗台上的花盆似乎没安放在适当的位置，不过显然那些花是属于女主人的。女主人给我端来咖啡和蛋糕，给克拉利克博士拿来蓝图和预算方案。他已把最后一毫米和最后一便士都计算出来了。如果我要加入进去，他们只好重新测量和计算。看来，他们好像都乐意再劳累一次。他说，我们四人合伙，每个车库花的费用就少得多。我说不清楚，他们愿意重新计算是因为那几百克朗，还是因为他们读过一些我的文章——当然，那是还允许我发表时写的那些文章。也许他们想对我目前的困境表示他们的同情。

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们非常友好地对待我，甚至十分尊敬我。他们热情地探询我的编辑工作。其实，我现在对自己的编辑工作已相当疏远，我已有十多年没得到允许做任何编辑工作了。

那天以后，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必须遵守沃尔夫博士制订的正规的出勤表，到山脚下那块野草丛生的地方。我们的建筑基地就设在那里。

博士们手中拿着长绳、三角板、酒精水准仪和卷尺，在野草丛中来回奔跑。这一切辛劳都是为了我的缘故，可更糟的还是我对任何技能性工作完全是外行。我的用处只是帮助放一下卷尺，或拔野草，或挖泥土。

不久，我们需要得到第一批建筑材料：修地基的水泥和沙子，增强拉力的金属丝和铁条，各种大小尺寸的纸板。

我的三位伙伴在近郊的一个学院工作，晚上才能回家。而我，至少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完全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时间的人，因此被他们选为主要的购货员。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重任。

利博第一次来探访我，是在我已完成无用的中等教育和同样无用的哲学论文之后。我当时已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许多从前的熟人，当然并不是很久以前的熟人，常常来看望我，为了要我给他们提供一次尝试文学的机会。

利博是到我家里来看我的。他提着个胀得鼓鼓的公文包，一进门就引起我对他的怀疑。结果是误解了他。公文包里只装了一瓶伏特加。他把酒拿出来，对我说，他只是顺便走访我，看看我过得怎样。

那时我还过得很不错，他好像也过得挺顺心。他精力充沛，还不胖，他一定是刚从山里回来，晒得黑黑的。那时的人们是不到海边度假的。

我对他送伏特加表示了谢意，心里却在纳闷，为什么他要用这种方式来见我呢？我那时是一个绝对戒酒者，我只为他斟了一杯。他参观我的书房，就像在观赏某些奇异的珍品似的。书房有什么用处，他觉得很难理解。随后，他坐下来，开始告诉我他是怎样谋生的。

离开学校后，他给一个砌砖工人当过助手，可是后来陷入了某种困境，于是他去干修理冰箱的工作。这种工作让他挣了大量的小费，还得到了其他方面的优惠。说到这里，他向我眨眼示意，暂时停下他的叙述，以便我有充裕的时间发挥想象力去写一

首叙事诗。背景，瓷砖砌成的厨房，在洗涤槽、火炉和拆了一半的冰箱之间的空间里，未曾得到过满足的家庭主妇，迫不及待地脱下晨衣，欲火烧心地搂住他，一起倒在亚麻地毡上。他接着说，后来他发现这种生活方式太累人了，就到一个卖煤商人那里去工作。听到这里，我只能点头表示理解。这种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但也更危险，因为他不得不把自己交托给囮子一样的人，所以他决定找一个不那么冒险的事做。他目前是一个汽车修理工，偶尔帮人们买到汽车，而且不必填写等候批准的购买汽车申请表。如果我感兴趣的话……他领我走到窗户旁，朝下面街上指着。真不出我所预料，我看见一辆锃亮的梅塞德斯牌大汽车。

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他来看我的目的，于是我彻底放心了。我对买车子不感兴趣。利博于是喝完酒后就离开了我家。

那以后，每两年左右他就要来看望我一次。从他的谈话和外表来看，他生活得愈来愈好。显然他已经非常富裕了，可他好像也衰老得快。他的头发开始脱落，四十岁时，就完全白了。不过他的眼神还保留着青春的热情，蕴藏着一种极大的激情。当我申请一套住房准备结婚时，他已离过好几次婚，扔下了好几幢别墅。

对他偶尔来访的动机，我一直困惑难解。也许是他误认为我具有某种社会影响，能帮助他同某个综合企业达成某种贸易协议；也许是我适合当他虔诚的听众。我当然没有猜想过，他是被派来监视我的。不仅是因为我这里没有什么可监视的，而且因为他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任何探索性的问题。

最近一次他来看我是在上周。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然后悠然自在地坐在椅子上，问我过得怎样。

我最近很窘迫,可他已是一个住房建筑合作社的主席。自从上次看见他后,他又掉了些头发,又长胖了些。

我在修建一个车库,可他在负责修建八十幢现代化的家庭住宅,还负责别的一些事。为这项工程,他顺利地获得了国家的拨款。这样一来,一个未来的住户几乎不花一文就可以住进豪华的住宅。当然啦,要想加入他的合作社的人必须首先为管理委员会出点力。我心中忐忑不安,惟恐他开始解释他卷入的那些不正当的交易,或者例举他和他的同事从未来的房客身上索取的贿赂。与偶尔在朋友们的聚会上我了解到的共谋的规则一致(通常这是在森林中,或者在出租车里,我们讨论在谁的房间里上演《麦克白》,或者讨论我们怎样互相抄写手稿,甚至讨论在何处装订),我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警告利博,我的房间完全可能装有窃听器,他最好说话小心点。

我的担心使他感到可笑。他说,在这里他感到绝对安全。至于那种事,他认为在自己办公室里才绝对安全。不过为了回避同事们窥探的眼光,他喜欢到别处去进行一些谈判。为了这个目的(他说到这里时向我靠近,满嘴的酒气吹拂我的面颊),他准备了好几个"共谋"的房间。

我很想知道他正从事的活动是不是危险的。他那双狡诈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盯着我。他告诉我:"假若你知道我帮那些获得房子的人是谁就好了。"他这么一说,我很快就明白了。由于他同那些有权力的人过从甚密,他从事的活动就算是违法的,也远不及我完全合法的职业那么危险。

接着他告诉我,最近他又结婚了(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我已搞不清了),他的新夫人年轻漂亮,而且,她是一个行政部长的侄女。他告诉过我那位部长的姓名,可是,那些部长们一般缺乏

个性，并且不断轮流交换，我觉得很难分清他们。

他又换了个话题，谈起他新建成的花园。花园建在几个平台上，中间的一个是具有最新立体声音设备的"音乐阳台"。但是，他抱怨说，他从来没有机会安静地欣赏音乐，他工作太忙了，几乎没有时间去享受。但是他又对我眨眼示意，别的机会并不少。就这样，我了解到，一个漂亮的酒吧女招待不仅奉献给他三万克朗，而且还把她本人奉献给他了；还有，一个更漂亮的舞蹈演员吝啬钱财，只把她本人给了他。这一切，还用得着说吗，都是为了得到他的许诺，让自己的名字被列入他的住房分配计划。

他说的话逐渐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知道，漂亮的女人们是怎样着手交涉那些生意的。我问他，如果她们只奉献肉体，该怎么办呢？

"只在这个关系上是不行的。"他叹了口气，向我吐露，"那位舞蹈演员，但愿你看见过她那双大腿！她在你对面坐下，两腿交叉跷起，两眼充满欲火，挑逗得你心里发痒。你无法想象不得不拒绝她是多么可怕的事。"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拒绝是必要的。他向我解释，假若他同某个女人一起过了夜，他从道义上就必须为她争取到她追求的住房。但是，如果她不拿出那笔必不可少的钱，他该怎么办？他本人当然只好放弃这次艳遇。他要我明白，住房的事情不是由他独立决定的，还得向其他人行贿——难道我会认为，他为了一次逢场作戏的做爱，就自己去付那三万克朗吗？

"唉，也许她第二次来时会带上一些东西。"我试图安慰他。接着，凭一时的冲动（通常，我很鄙视行贿和腐化），我告诉他，整整一个月我费尽精力想得到一些水泥，可是我的努力都白费了。我只需要十五袋。

他微笑着问我，是否可以使用一下我的电话。他拨了一个号码，简短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告诉我到何处去我就可以得到水泥。

“天啦，在这个阴沟里还得呆五天！”克拉利克博士叫道。这就是他对我已获准得到那些必要的木料的许诺的评价。“正遇上这样好的天气啦！”他望着天空补充说，颇有失望之慨。

他虽然没有责备我，但我仍然感到内疚。我突然想出一个应急措施，“你知道吗，我从那边的建筑基地路过时，”我指着山腰，山腰上已建立起高楼大厦的骨架，“注意过，那里到处堆着木板。”

“你要说的该不会是……”克拉利克博士一下子就起了疑心。

“那些木板对别的人都没有用处，”我让他们放心，“仅仅是堆放在那里。”

“你是说你愿意把它们拖到这里来吗？”

“是的，但必须有人帮助我。”不要人帮助就把那些脏木板运下山来，那我就白提了这个建议。

“在星期六早晨，那里会不会有人？”平时沉默寡言的梅鲁卡博士这时也插嘴说。

“对啦，这才是重要的，不是吗？”我说。

“噢，但我们肯定要付钱的。”梅鲁卡博士反对说。

“听着，弗拉基米尔，我们的作家朋友指的是被丢弃的木板，对吗？”克拉利克博士说，“我建议应该去看一看，也许能带几块木板下来。”

“噢，我不知道……如果你们都认为这件事可以做……”梅鲁卡博士不高兴地说道。他取下眼镜，擦了一下前额，“我只是

不想遇上任何麻烦。”

于是,我们两人向山上出发了。梅鲁卡博士像往常一样默不做声,但是,这时看上去与往常不同的是,沉默中含着痛苦。

在山顶天空的背景上,呈现出几个小影子的轮廓,那是孩子们玩的风筝。风筝被看不见的线牵着,飞在灰蒙蒙的天空上。其中有一个怪异的、颜色像金属的灰白东西,中间是一个大圆球,周围有几个小圆球。看见它使我想起了那一点也不复杂的原子模型。

“太美了!”梅鲁卡博士惊叹说,“我小时候经常做风筝,可是像这样的东西……谁想得出来?”

他停下来,又擦了一下前额。他此时呼吸困难,病态的脸上汗流满面。

“这山高得可怕!”他伤心地说,“你知道特佐伏卡吗?那是另一个畜生,就像这座山一样,只是比这座山高四倍。”

我简直不懂他的比喻,“不,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去过那里。”

高楼的骨架慢慢地出现在山顶上。小路奋力地穿过稠密的树林和茂盛的草丛。到处都长着荨麻。

“林务员拉巴达就是在那里看见了神灵显圣的,”梅鲁卡博士说,“也许你听说过这件事,对吗?”

“没有,我想没有,”我惊讶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哦,也许你不相信那种事。去年暑假,我去了那里,我决定拜访那个林务员,亲自查明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传说他看见了什么?”我问。

“哟,圣母玛利亚,当然啦!还会是什么呢?”

“你是说,你相信这些事?”

“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梅鲁卡博士避开我的问题,“这些日

子，教会自身对这类事情都非常小心谨慎。”

“那么，你找到那位林务员了吗？”

“找到了。那是个十分敏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人们对这件事大惊小怪，他为此非常生气。他们甚至写出和复印了一份传单，声称他接受了圣母的指示，教他如何去帮助人们，如何对孩子们进行宗教教育。结果他受到秘密警察的讯问。然而，他告诉我，圣母玛利亚只是把自己显现出来，就像一张画。后来一股泉水在圣母显圣的地方冒了出来。”

“你相信了他的话吗？”我问道。林务员讲的事真让人不可思议，我感到怀疑，又问，“他的话真不真实？”

“哦，实话告诉你，我的确也有些怀疑。”梅鲁卡博士承认，“但是……你瞧，我患有气喘病，那还是被迫在矿下干活时染上的。我决不用那个故事来烦扰你，我敢肯定你自己的烦恼已够多了。有些日子，我呼吸都很困难，所以我对自己说，我要再去那里，尝一尝泉水。我是夜间去的，为了节约时间；我的妻子是铁路上的雇员，所以我可以免费乘坐火车。我到那里时，天还没亮，我急忙朝山顶爬去。那天气候真寒冷，四周被烟雾笼罩着。遇上这样的坏天气，我呼吸就更困难了。你知道吗，每当有雾，我心里就闷得难受，我的脸会憋青。有好几次，他们只好把我送进医院去输氧气。我不必告诉你，要爬到山顶，走到那个泉水旁，对我来说是多么艰难的事。我到达那里时，已闷得要死。天刚刚发亮。我的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就摔倒在地，躺在那里。我爬着倾身向前去喝那泉水。只喝了几口，就几口，突然，压在我胸膛的重量消失了，我完全恢复了正常呼吸。我自儿时起已经多年没有像这样痛快地呼吸过。我就在那里脱下衣服，周围没有一个人。我脱光了衣服，用泉水擦洗躯体。在早晨潮

湿的空气里，我冷极了。这时，我听见有人在说话。我急忙穿好衣服后，看见了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似乎还没有看见我，他们在望着天空。于是我也朝天上望，我看见了他们正在看的东西：在清晨的朝霞里，天上有两轮旭日并排着。我不自觉地跪了下去。一轮旭日消失了，余下的那一个就像彩虹五光十色，橘色、紫色、还有绿色。你想象得出来吗，一个绿色的太阳？好啦，你不必相信我的话，当时有四个人，我们四个都看见了同样的东西！”

梅鲁卡博士和我从林丛中穿出来时，就看见木板堆放在我们前面，覆盖着石灰和水泥，全成了白色的木板。除了木板以外，这地方还堆放着破支架和破房梁，上面伸出一些生锈的大钉子。

“你真的认为我们可以随便拿走木板吗？”梅鲁卡博士不放心地问。

“那么，你有什么别的主意吗？如果我们去请求让别人允许，只会遭到他们的嘲笑。”

“唉，即使如此……”他反对说，“我断定这种木板花费并不多。”

“当然不会多，”我说，“可是我肯定他们不会卖这些木板，那样做就违反了规章制度。最好的办法是我们找到一个人，他乐意自己去偷木板，然后把木板再卖给我们。可是，今天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那样当然更好，”梅鲁卡博士说着眼睛却朝着孩子们和风筝的方向望，“总之，拿走不属于我的东西是违背我的原则的。”

“听着，”我努力想说服他，“我与你打赌，你喜欢什么我就跟你赌什么，他们在这块建筑基地上丢失的一些东西远比这几块

破旧木板更值钱。不管怎样，这些木板将会腐烂。最后，他们只好把它们扔在一起，放火烧掉，而我们却能很好地利用它们。”

“好吧，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我的同伴说。他的声音仍然充满自责。

我爬上那堆木板，准备撬松顶上的那块。

这些木板实际上靠着修了一半的房子墙上。我爬上顶时，大吃了一惊，看见木板后面，在砖墙还未粉刷的房屋正面的其中一个窗户上不仅安装了玻璃，而且还挂上粉红色的窗帘。窗帘只拉上一半，我可以看见房间里的一切。墙壁光秃秃的，还没有刷上涂料，一张大桌子几乎占据了一半房间，桌子后面，五个穿着节日盛装的男人坐在椅子上，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门。

其中一个朝我这个方向转过脸来，我惊奇地认出他正是我从前的同学，利博。

这时门开了，一个穿着雪白短裙和雪白长筒靴的姑娘跳着舞进了房间。只见她姿势优美地一跃就到了桌面上，然后在那五个男人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望着姑娘柔软灵巧的身体做出的专业动作，我意识到，我偶然遇上了窥探老同学的一个“共谋”房间的机会。

微弱的音乐声飘进我耳里，桌上那白色的幽灵开始用脚尖疯狂地旋转，她纤细的脚在桌面上咚咚地跺着，窄小的臀部旋转得愈来愈快。接着她用柔软的手指解开雪白短裙的钮扣，裙子慢慢地从大腿滑向小腿再从小腿往下落，最后落在桌面上。

“喂！”梅鲁卡博士在下面大声叫喊，“如果你真的认为我们应该……那么，现在正是时候，那些小孩已离开了，风太大，他们不能玩风筝。”

“好，好，马上！”我盯着那位舞蹈演员，她还在大桌子上旋

转。白裙子里面她还穿着一条裙子，可是，这一条，我惊愕地发现，是由绿色纸条做成的，纸条里有一张我认为是布拉格城堡的图画。

五个男人现在迫不及待地朝舞蹈演员伸出手来。我想象，这些手随时都会落在她身上，撕下她剩下的服装。

“上面有什么事?”我听见梅鲁卡博士在抱怨，“你不能快点吗？很快就会来人的……”

我最后瞧了一眼舞蹈演员，只见她轻佻地从剩下的裙子上撒下来几张纸条，把它们扔在那五张充满激情的脸上。我弯下腰，扔下第一块木板。

我一共扔下四块木板，这时，我的同伴在下面尖着嗓子喊我，“嘿，快下来，有人来了!”

跳下去之前，我朝那个“共谋”的房间窗户又望了一眼。粉红色窗帘已拉上了，遮住了一切，但透过窗帘的小孔，我想象，我看见了绿色纸条千变万化飞舞的情景，以及赤裸裸的肉体乱成一团的场面。是的，我甚至想象，我听见了由于强烈的，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复杂的情欲所发出的低声叫喊。我终于回到了地面上。

“那边。”他指着对面说。我看见远处一个老太婆，一只跛脚的小狗陪伴着她。

“这有什么可怕的。”我说，“如果你愿意，那我们就走吧。你不用拿什么，我一人就行了。”说完我把两块脏木板扛在肩上。

“噢，算了，你不行。”他拿起另外两块木板。我们朝山下走时，木板压伤了我的肩，沙子不断地落在我的脖子上。

“我不是害怕。你知道吗，”他在我后面解释，“我感到羞愧，就这些。我不愿采取他们的生活方式。”说完以后，我们一直沉

默地走着。

沉默沉重地压在我心上，我感到我伤害了他，也许使他深深地失望。

“你带回了一些水吗？”我问。

“你是说从特佐伏卡吗？”

“就是那个神奇的泉水。”

“是的，我带回了一些。可是没有任何作用。”

“我想，你必须在现场喝才行。”

“也许，不过很可能是特殊片刻的恩赐。”他说。

我们另外两个同伴热情地迎接我们。我们扔下肩上沉重的木板。当我给他们讲我们的探险经过时，梅鲁卡转过身去，好像为自己感到羞愧似的，走到工地的另一边，在一堆砖上坐下，擦了擦手心，拿出三明治。

“这些木板正是我们需要的。”克拉利克博士赞扬了我们获得的战利品，“可是，我们需要三倍这么多的木板。如果我请你再爬上去，至少一次，不会给你添太多的麻烦吧？”

“哦，不要为我担心……”我回答着并指了指孤零零正在吃三明治的那个人。

“你是说，弗拉基米尔不愿再去吗？”

“我想他是不愿再去。”

“他觉得太累了吗？”

“不是。多半是因为违背了他的原则。”

“噢，可能。”克拉利克博士说。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已明白了。“弗拉基米尔一直是一个有趣的家伙。”他倾身向前靠近我，在我耳边小声说：“你想象得出来吗，实际上他最初是为谋求教士的职务才学习，可在他快要毕业前，他们把他关进了监狱，

据说，他散发了罗马教皇的某一训令。他被判了十年，结果只关了他六年。他们提前释放了他，因为他的气喘病，也因为他表现好。他是个正派诚实的人。他从监狱中出来后，在校外修了一门工程学课程。一般说来，不是我非常信任这些校外毕业生，而是因为弗拉基米尔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他可以给我们讲课。可是……”克拉利克博士补充说，“为了罗马教皇训令就判十年。太残暴了！”

星期天早晨

一个荒谬的故事

我被教堂的钟声闹醒了，紧接着我听见雨点嘀嗒嘀嗒地落在窗户上。今年是雨水多和警察搜捕多的一年。

村里有两个教堂主动提供方便。那个一大早就召唤信徒做祈祷的是天主教堂，它的邀请与我无关。在我有权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情况下，我属于另一教堂。正是那个新教牧师帮我找到了这间小屋。

他名叫彼得，至少比我小十五岁，却比我高一个头。他戴一副眼镜，穿一双十二号的鞋，一件他妻子给他编织的厚毛衣，同我说话时毫不拘束。我觉得他过于自信，不适宜当牧师。他认为多数人是愚蠢的、精神贫乏的，除了两个愚蠢的年轻小伙子（这两个年轻人积极参加所有的祈祷会，而他又怀着一个真正的牧师所具有的宽恕来对待他们）。在其他方面，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对教徒就像一位善良的父亲。

我起了床，小心谨慎地朝安装得很低的窗户走去。这间小屋是属于一位玻璃制造工人的老寡妇的。房内每一个架子，每

一张小桌都塞满了玻璃小塑像。每次从它们面前走过时，我都担心会碰一个下来打碎了。

我朝窗外望出去。这间小屋是村里最后一幢一直有人居住的建筑物。朝小河的方向继续向前，还有三座小屋，有一座完全坍毁了，另外两座自然被来自布拉格的游客占据。这些游客按照自己的习惯维修了房屋，尤其是在尽头的那一座。墙上画满了装有辐条的车轮、打谷机、耙机，看上去就像为人种史博物馆画的广告。我不清楚房子里面像什么样子，因为，房子的主人，一位足球教练，同他的球队正在欧洲观光旅游。并且，我现在感兴趣的不是这座小屋。我在朝小河方向望，一条宽阔湍急的河流，通常人们还会补充一个形容词：阴沉的。无疑它是阴沉的。在远处，又是晨光黯淡、雾色迷蒙的早晨，我无法辨别河水的颜色。那条小河与足球教练的小屋之间的草地已被水淹没。现在只能看见狭窄的乡间道路和低矮的河堤。那条道路径直通向一座狭窄的木桥，伸到小河对岸，然后消失在树林的弯角后面。

天上不停地下着雨。我穿上衣服，走进小厨房做早饭。女主人到她出了嫁的女儿那里度周末去了，留下我一人。因此我可以整天写作直到晚上。可是，往往空间愈多，愈安静，做的工作就愈少。

我并不是说，今年我享受到了许多空间和宁静。我的朋友起草了一个捍卫人权的宣言，尽管我没有签名——因为我认为关于对世界状况和人权的看法，我自己已经写了够多的文章——但我仍然逃脱不了对它负有责任。我们讨人喜欢的报纸、电视和广播记者自然开始驳斥和诽谤那些在宣言上签过名的人，而“劳动人民”立即开始举行抗议会议。我想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抗议什么，抗议人权本身，还是抗议那些敢于乞

求人权的人。很可能,他们告诫自己(他们一直都在告诫自己):不要去打听,不要去思考,这样要好得多!

几天后,我的几个朋友被捕了,还有的被解雇了。在那种形势下,假若所有的人中只有你被饶恕,对于你,的确是一件难以忍受的苦事。很幸运,不久他们也在主要的报纸上抨击我。他们说,我不仅签了名,而且是人权运动的掮客,说我认识所有的领导人物,能够为外报提供点情报;如果新闻记者在家中没找到我,他可以去找我的朋友,一个美国电影明星,这位明星碰巧也在布拉格。这些谣传虽然听上去没有什么逻辑——因为我还得先让我的电影明星认识所有的领导人物——但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把我的地址印在报纸上。我的地址他们完全搞准确了。他们也把那位女明星演员的名字以及她住的旅馆的名字印在报纸上。她的名字以及地址是否正确,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她。不久以后,我开始收到来信。有两封恐吓信,其余的信都是热情支持我的;只有几封签了名,其余的都是匿名信。

一个落名"受难者"的人写道:"根据选举结果,大约百分之零点零二的选民没有投票选举官方的候选人,我估计有三万三千人。这些选民是勇士,而你和你的朋友们更勇敢。任凭他们指责你拥有豪华奢侈的住房、情人,等等。因为如果他们的指责是事实,你就会表现得自私,默不做声,不管闲事。可是,你没有那样做。我们这些深受黑名单之苦的人对你非常感谢。不要让别人告诉你该做什么,包括我自己在内。即使人人都骂你,或者认为你表现得像个大傻瓜,但是你写的、发表的一切都是事实。不幸的是,在这个国家,事实是十分恐怖的事,人们不敢说出来,只有在人们的私人卧房里,或者在喝啤酒时,才敢说出口。即使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要有十分把握,弄清楚听他们讲话的人是否比他们喝得还醉,或者,他们的妻子会不会在第二天闹离婚。”

一个火车司机以恳求作为他信的结尾:“我请求你,不要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无法公开帮助你就彻底鄙弃他们。谁敢公开帮助你呢? 人人都感到恐惧。你和你的朋友更清楚你们的权利,而且你们都是知名人士,不像普通公民那样容易对付……”另一方面,一个来自维什科弗名叫弗兰塔·沃莱克的男人怒气冲冲地告诉我,他读到了有关我的“犯罪活动”以及我在“那张草纸上签了名”,“我一点也不了解在那些不要脸的阴谋家后面是谁在支持,”他愤怒地说,“所有那些应关进监牢或者应穿约束衣的罪犯认为他们这样以我们美丽的国家为代价,张着可鄙的嘴巴四处饶舌能逃脱到哪儿去? 当我们在与法西斯作斗争,为了自由而冒生命危险的时候,你这个尿罐子在哪里? 下个月我要访问布拉格,那时我会去找你谈一谈。我要用我的两只手让你瞧瞧,你和你所有那些该死的朋友们是怎样受到人们尊敬的,那是对付你们这些混蛋唯一的办法。”

当然,弗兰塔·沃莱克从来没有来找过我。相反那些本应进入监牢或者应穿约束衣的“罪犯”愈来愈经常来看望我——我从来没有像那些日子有那么多的访问者来看望。我们在一起饮茶,讨论最近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最近的搜查、逮捕、审问、免职、开除,在报纸上发表的造谣中伤的文章。对这类文章,我们无法反驳,我应该说,禁止我们反驳。我们也谈论最新文件和最新消息。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人,从国家领导到我们志同道合的作家,都给了我们鼓励和支持。这一切,帮助我们忘掉烦恼,而且非常有效。

最常来看望我的是一位教授。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提到他的

姓名，因此我总是把他称作“教授”。

在此之前，我只是从文学作品中知道他的姓名。那是许多年前，我先在一本哲学杂志里读过他的文章。后来，就像他们对付所有那些知道一些内情的人，更重要的是所有那些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一样，他们开始禁止他发表文章，把他驱逐出学院。有两年，他在一家印刷厂当校对员，然而连这个工作也要被解雇。他又去当一名为锅炉加添燃料的伙夫。可是几天后，一根管子破裂，锅炉房被水淹没。刑事警察来时，气势汹汹地威吓他，使他六神无主，以致精神崩溃。那时他才五十六岁。战争期间，他曾在集中营里关了三年（战后，他还被关了八年，可是那不算数），因此他有资格得到早期退休金。他在一家精神医院住满了两周回到家。他同时也患有气喘病和糖尿病，所以在退休前那几个月，他得到因病残丧失工作能力的待遇。他坐在家中，翻译海德格尔① 的著作，撰写辩论文章，反驳那些在我们当代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那些被看做是学术文章的胡言乱语。当然，没有人发表他写的辩论文章，于是他把那些文章打印了许多份，寄给个别的作家和专家。这些作家和专家的人数太少了，而且靠这种简单方式并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

目前，他已停止撰写自己的文章，而是忙着打字，打各种各样有关当局犯下的非正义行为的文件、文章和报道。

他通常是上午来看我。在干扰较少的日子里，我大量的工作都是在上午做。当他一走到我房间外的楼梯上时，我就知道是他来了，因为我能从那缓慢、沉重的步子声中辨认出他。接着，他会按一声长两声短的门铃，让我知道是他来了，而不是我

① 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

可能不太愿意见到的人。“我不会耽误你太长的时间，”他在门口声称，“我知道你有很多事要做！”他站在门口时，他清瘦的身材不可思议地显得圆滚滚的。

我向他说明，恰恰相反，我没有在做什么事。

他脱下大衣，从口袋里拿出几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瞧，这是一封写给报刊编辑的公开信，这一封是写给所有社会主义革命者的信。你看过这些信吗？”他气喘吁吁，他刚爬过一段陡山坡，又爬了通到我房间的那些楼梯。

我还没有见到过他带来的那些文章。他很高兴，他是第一个把这些文章给我看的人。然后，他又脱下短上衣，立刻恢复了消瘦的原形。

“你一次带多少份？”我问。

“噢，我打了二十五份。你这里是我的第一个港口。”他说，“告诉我，你听见什么令人鼓舞的消息没有？”

我尽力回忆所有的令人振奋的消息。通常，这类消息远比别的消息少得多，而且这类消息通常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有短暂的现实意义。

“打出这些文章要占用你很多时间吗？”我把话题转到他的文章上。

“当然。要花费几小时。”

“真浪费时间，”我痛心地说，“对你这样博学多才的人来说。”

“噢，不，完全不，”他打断我的话，“我喜欢干这种工作。不管怎样，我无能力干别的事。我不能集中精力，你是知道的。读了报上所有的胡诌八扯的文章后，我心里只想着这件事。如果我甚至不能用这种方式回击，那么我会感到自己像一个任人宰

割的奴隶。你应该清楚,人们渴望了解真相!"

"你真的不应该把这些东西装进口袋里像这样到处走,"我说,"如果你被捉住,你怎么办?"

"哎呀,我不像在谋反吧,像不像?"

下一次,我正从窗子望出去,看见他瘦瘦的身躯在房外寂无一人的街上急匆匆地向这里走来,一只手里提着一个漂亮的黑公文皮包,从远处都可以看见那皮包是崭新的,分外铮亮。

"我已按照你的建议去做了,"他一进屋就对我叫喊,"买了这个皮包来装我的文章。"

"全装进去了吗?"

"全部。"他夸耀着回答。

"二十五份吗?"

他点点头,把公文皮包递给我,"试一试,打开它吧!"

锁的旁边有一个精巧的装置,装置上有号码。

"只有知道暗码,才能打开吗?"

"说得对,暗码!"他高兴地说,"假若他们逮住我,我只须简单地说,我忘记了暗码!"

"哦。"我感到怀疑,他们难道会因为这样一个小玩意就不打开公文皮包,这似乎不大可能。

他把皮包从我手里拿回去。"你认为他们不会相信我吗?"他问。"一般说来,像我这样大的年龄,完全有权丧失记忆。我还有医生的证明!"他说着开始旋转号码。过了好一会儿,他显然变得焦急起来,脱下短上衣,焦灼地思索着:"你相信吗,我的朋友,可是我真的忘记了暗码!真糟糕!我看不清楚这些号码,我的眼镜放在皮包里了。"

他把公文皮包重新递给我,让我碰碰运气。

然后，他告诉我有哪一些朋友被禁止发表文章，这些朋友曾设法在一些为了填满所有报刊空白而不得不发表文章的人中间找到一个保护人。那些保护人为了分得一份报酬在文章下面签上他们的名字，还自以为他们在尽学术职责。

"真可笑，"教授说，"想象吧，我们那个一文不值的哲学杂志的总编在杂志里如此猛烈地抨击某个人，以至于你还认为总编所攻击的那个可怜的受害者会被逮捕而押至法庭，可是在同一期杂志里，总编会发表一篇那位受害者的重要文章，却不知道这篇文章正是受害者写的，因为文章上有保护人的签名。我告诉你一件事，将来有一天，当历史学家试着整理这一切时，他们手中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你还认为有人愿意费力气去整理这一切吗？"

"哎，也许你是对的，人们很可能还有别的事要操心，"他同意我的看法，又说，"比如生态问题，食物短缺问题，等等。前一天我写下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愚人的天堂里，除非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这个世界的真正问题上，否则，未来的一代人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们。我一直用温和的语气写，尽量用'他们'的套语来表达。可是当我把文章交给我的保护人看时，他几乎勃然大怒。他说，如果把这篇文章给别人看，可能该轮到他也去给自己找一个保护人了！那再糟不过了。"教授不停地说下去，"假如你成功地找到一个人，他愿意把你的思想冒充是他的，那么你还必须给你的思想抹上一层伪装，使你的思想让别人看上去像是他自己的。但是，你怎样做成功这件事呢，他们早就与思想绝缘了。"

我刚把那个小装置转到三三五，锁喀哒一声打开了。

"当然啦！"教授叫道，"我怎么可能忘记呢？那是前三三五

年亚里士多德在吕刻翁创立逍遥派的日子。”说完他送给我他亲手打成的长达四十页的文章。

我就这样度过我的时间:讨论,阅读,实际上有时也写这类文章。几个月后,这种生活方式让我感到心烦。我对每日的政治活动实在难以忍耐。我很想写一篇关于讽刺作家卡里尔哈夫里塞科·鲍罗夫斯基的文章,同时我远在国外的出版商给我寄来一封催稿信,要我写一本小说。

当我的朋友,那位新教徒的牧师作为拜访者中的一个来见我时,我向他抱怨在布拉格自己的家里,我都不能平静地工作。听了我的话,他邀请我到他的村庄去度过一段时间。

这座村庄离奥地利边境只有几英里路,人人都能观看维也纳的电视。据牧师说,人们打开电视机后,不一会儿就会睡着,尤其是当播放新闻消息时。亏得如此,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七七宪章》[①] 这件事。

“在那里,你将得到很好的休息。”他向我保证,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看我时,眼睛不得不朝着下面,“没有人会打扰你,只是我们教养院的姑娘们会向你调情,或者,查理和卢克要来拜访你。不过,这算不了什么……”他做了个手势暗示这两个人头脑不清醒。“但也许他们会比普通人使你更感兴趣。有时我想,像这样的人具有一种特殊的想象力。”

这里,的确非常宁静悠闲。我听了许多外台广播,读了有关哈夫里塞科的文章。哈夫里塞科在一百三十年前就写了有关对人权的需要,而今天,我的朋友们却仍在徒劳无益地要求这种

---

① 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对当时政权的各派人们所发表的宣言。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初。

权利。

我每周参加一次圣经课,主要是为了参加课后的青年会议,而宗教课本身使我厌烦。课结束后,青年们做游戏,我喜欢那些游戏。卢克,虽然具有低能的外表,却创造了一个几乎是超现实主义的难题:人被关在第四度空间中能够生存下去吗(生活在第四度空间中犹如生活于幻想之中)?

有时我长久地绕着村庄散步。这个村子只有九十幢房子,最后一幢房子的邻居就是另一个村子的第一幢房子。这里有一家大玻璃厂,生产玻璃和各种各样的玻璃杯,还有塞满我现在居住的寡妇房子的那种玻璃小人像。玻璃厂非常简陋,工人的待遇也很低,因而即使在这个贫困的地区,都不能够找到足够的劳动力。他们只好把警察从全国各地捉住的"堕落"的姑娘带到这里,强迫她们在教养院劳动锻炼。这些姑娘住在一家破旧的旅馆里,为低得说不出口的工资辛辛苦苦地干活,一看见男人就对他叫喊。她们总是想方设法逃跑。

我逐渐同其中一个姑娘熟悉起来。她常在空闲时间到教区长的住宅,蒙受上帝的无限慈悲,接受我那朋友的教化。为了酬谢,姑娘就帮他的妻子在厨房里或者花园里干点活。

很明显,她至少有一半吉普赛血统。她十分喜爱她的名字,一个地道的圣经上的名字,抹大拉的玛利亚[①]。我不清楚她对上帝的慈悲究竟能够接受多少。只要她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她总是要紧靠着我,对着我耳朵说:"来点别的,怎么样?"

我吃完早饭,还有一刻才到九点。户外,雨还在不停地下,

---

① 抹大拉的玛利亚原为一罪恶淫荡的女子,后悔罪而得救。见《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及第八章第二节。

天空灰蒙蒙的。我穿上一双橡胶长靴，一件有兜帽的雨衣，出门到教堂去。

礼拜仪式刚开始，我的朋友穿着黑色的长袍坐在桌后唱歌，他的妻子在弹风琴。我注意到听众是一些我不太熟悉的年龄很大的老人和一些很年轻的人。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年人。显然，这次大雨“冲走”了大多数经常来教堂的人。除了几个老太婆，我只看见熟悉的那两个低能年轻人的面孔。卢克，像往常一样坐在前排，准备记下我的牧师朋友口中吐出的每一个词。查理，这位患有幻觉症的年轻人，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他长得英俊，黑黑的眼睛，消瘦的脸上长着基督那样的胡须。我走进教堂时，他们两人都盯着我，卢克的眼神热情友好，但查理耸着肩膀，就像看见了魔鬼走进来似的。我在门边的一个条凳式座位上坐下，试着在歌本里找到正在唱的圣歌。一般说来我是不唱歌的，而且对宗教歌曲的词句很难感兴趣。

我们正站起来准备祈祷时，门吱嘎一声，堕落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溜了进来。她环顾了一下四周，站立了片刻，好像在祈祷，然后摇摆着她的臀部，匆匆向我走来。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尼龙衬衫，被雨水淋湿紧贴在身躯上，几乎透明了，胸部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做礼拜的地方，若要用一个恰当的词来加以描绘它们就像两个年幼的瞪羚①。在它们之上，一串廉价的念珠亮闪闪的。

玛利亚用臀部轻轻推了我一下，张开嘴舐了舐嘴唇，然后再移动着嘴唇，好像在祈祷。而我非常清楚，如果她发出声音来，我将听到的是什么话。

---

① 产于非洲和亚洲的一种小羚羊。

我们就这样站在那里，祈祷和恳求上帝的宽恕。我竭尽全力不去瞧身边这位同伴那几乎是赤裸的乳房。我很想知道她更多的情况。她是怎样堕落的，她为什么养成了上教堂的习惯，而这个地方，大多数姑娘甚至根本不知道。

她注意到我在看她，于是从我肩上望过去，想看我那本翻开的圣经。我把书推到她面前，让她自己去读。她用其中一个"瞪羚"靠着我，以表示回报。

我的朋友正在读拉撒路[①] 以及那位不能进入天堂的富人那篇训诫。我的朋友是一个优秀的牧师，他正在努力向集聚在这里的老太婆们、两个低能的年轻人、堕落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和我解释，财富与其说是人们所占有的东西，还不如说是人与财产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可以拥有很少的财产，然而如果热爱财物胜于爱人类，热心为物质服务胜于为上帝服务，那么只会截断他自己通往天堂的道路。他接着谈到我们今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愈来愈多的人为物质而活着，对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遭受迫害的人和那些犯了罪的人无动于衷，漠不关心(他边讲边望着我们。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我，还是我身旁的那位姑娘，也许指的是我们俩)，他们关心的只是新式电冰箱或洗衣机，或者一台更大的电视机，或者一个车库。他们不停地寻求新的物质来占有，直到有一天，还在为物质操心之时，死亡降临到他们头上。如果在这个时刻，一个审判员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活着，你们为了什么而活着，他们的回答可能是什么呢？"难道我们不相信，难道我们不知道吗，审判生者和死者时，上帝将问同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他的审判，没有任何人

① 拉撒路是《圣经》中一患癞病的乞丐，在世间受尽苦难，死后进了天堂。

能回避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的回答将是什么呢?”

我那位年轻的朋友要求我们大家认真思考自己的回答后，结束了他的布道，我们唱起了最后一首歌。

在牧师讲话的整个期间，低能的卢克一直在笔记本上乱写。他的低能，我意识到，表现在他古怪的举止行为，而不是愚蠢。老太婆们昏昏欲睡，或者偶尔点点头，疯子查理倾听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堕落的玛利亚两眼死死盯着牧师，而我——如果要表述我这时的感情，我得说，我意识到了教会的存在，心里很高兴，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也作为其中一名听众，作为一个人，在这里听天堂的福音。

最近，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被驱逐的人，被逐出每一个团体——除了一种团体，它的成员也像我一样被人驱赶。“他们”禁止我给任何人讲话，剥夺了我的听众。我的听众自然也没有为我的利益讲话。

两天前，我们在教区长的住宅里谈到对牧师的支持太少，牧师们被当局禁止执行他们的天职，还谈到几乎没有人愿意为他们说几句好话。最后我们谈到哈夫里塞科。他自从被流放归来就一直过着孤寂的生活。他死时，也就是说在一百二十一年以前，只有几个朋友敢参加他的葬礼。

我们的民族，我的朋友说，从前孕育了哈夫里塞科这样的伟人，现在却不再产生那些为它的权利而斗争的勇士们。

我不愿对我的民族做这样严厉的判决。最近几年，我参加过好几个人的葬礼，这些人都可以说成是为民族的权利而斗争的人。在每一个葬礼会上，都有无数群众参加。每一次，又都有官方代表把我们摄入影片。在最近的一次葬礼中，他们甚至在墓地后面加大汽车发动机的油门，让我们听不见牧师或者讲演

者的话。据说，有人把荆棘做成的王冠放在棺材上面，就像在哈夫里塞科的葬礼会上一样。我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因为人们拥挤在一起，我根本不能靠近棺材。不管怎样，我在一本传记中读到，博泽纳·内姆科瓦放在哈夫里塞科的棺材上的荆棘编成的王冠仅仅在民间传说中才能找到。人们需要荆棘编成的王冠，正如需要殉道者一样。有的是为了祈求保佑，有的是自觉惭愧而忏悔。他们不配享有这种殊荣。

我们离开教堂时，雨已经停了，天上飘忽着无精打采的乌云。我的年轻朋友站在教堂门口，屈身对每一个正要离去的老太婆说几句话，握握手。我等待着他，为了夸奖一下他的布道。玛利亚同我一道等待，她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去。那两个低能年轻人也在等待，他们经常想要引起牧师的注意。无论怎样，他们已明确(我认为)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许诺可以进入天堂。

牧师刚对最后一位老太婆告别后，那个长了张基督似的脸的年轻人就对牧师说："哎，里维伦德，真可怕，他们不停地发出嘘嘘声。我想听你布道，可是他们不愿安静下来。他们不停地嘘嘘作响，在我周围爬行。"

"谁爬行和嘘嘘作响，查理？"我的朋友问。同时向我和堕落的玛利亚点了点头。

我知道理查不是本地人。他只是在夏天才到这里来拜访他的叔叔。他有二十岁，当他的状况好一些时，就去干排字工人的活路 。(想一想，如果我不得不把这些日子将要印刷的东西排好字，谁知道我要怎样结束？)

"我希望他们咬我，"查理继续说，"我非常想，必须有人受这样的苦。"

"查理，"我的朋友说，"我觉得你好像做了一个非常不愉快

的梦。”

“不，我没有做梦，里维伦德，”查理坚持说，“我亲眼看见这些的。”

“查理，”卢克插进来，像往常那样满脸微笑，“你不认为他将毁灭吗？”

“不，我不认为，”查理回答，“他是个怪物，眼睛发光，很恐怖。他想咬每一个人，咬我们每一个人，直到他得到他的供品。”

“查理，”我的牧师朋友说，“我觉得你又产生了一些自杀的念头。”

我们沿着潮湿的柏油路朝教区长住宅走去。

“是的，你知道的，你是知道的，”查理赞同说，“我希望死去。有人必须承担死亡。应该是非常缓慢非常可怕的死亡，这样人类就能得到拯救。大毒蛇还不行，我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肉体上肯定非常疼痛。还有所有那些唾沫。人们朝他吐唾沫，朝基督吐，里维伦德，他肯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家伙。那个基督，所有的人朝他吐唾沫，他却为他们祈祷！”他的面孔呈现出一种非常疼痛的表情，就好像有人准备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可是，你听着，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为了不让你遭受你们的唾沫。”我的牧师朋友说，似乎有点把基督的要旨简单化了，“他拯救了你，把你的一切恐惧都承担在他自己身上。”

“当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永远都是。”查理说。

“里维伦德，你知道吗？”卢克又插嘴说，他的脸上喜气洋溢，好像他在给我们讲一个笑话似的，“我过去也想自杀，我想毒死自己，因为凡是世界上有点价值的思想，别人都探索过了。可是我现在不再想死了，我想通过国家考试。”

“说得对，卢克，”我的朋友满意地说，“我们都要充满希望去生活。”

关于考试的事，卢克并没有开玩笑。他们接收他进中学，首先是因为他父母是玻璃厂工人，还因为他那有病的头脑里潜藏着数学天资。卢克靠自己思考可以解答最复杂的方程式，他不明白为什么别的人不能想象四度空间，可是，他自己认为，那仅仅是孩子的游戏。

查理默默地沿着路面上的裂缝行走。有好一会儿没有人说话。

卢克对着我微笑，堕落的玛利亚在对我们微笑。

可是，卢克暗暗地微笑，或者说，向全世界微笑，而玛利亚在对我微笑，在向我传递挑逗的眼光。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查理转身向着我们，“证明书对你们有什么用?”他的问符合逻辑，“你们不可能把教育带进坟墓。”

“听着，查理，不要那样刻薄!”我的朋友责备他。

“里维伦德，”卢克说(我听说卢克的所有科目都是最低分)，“我们能不能组成一个小组，让你来解释一些神学上的概念？例如，我就不知道爱情是什么，还有什么叫赎罪?”

“我家里有污物。”查理说。

“污物？什么样的污物，查理?”我的朋友问。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耐心。

“稀粘液，”查理解释，“我睡在它的里面，这就是我的赎罪。”

“对吗，里维伦德?”卢克问。他对这个简单的定义感到很满意。

“哦，并不那么简单，小伙子们。”我的牧师朋友说，他完全把我和玛利亚排除在外了，“有一天，我们要真正地讨论这个

问题。”

我们来到十字路口。我们将在这里分别。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小河边被淹没的情景。我们在教堂期间，河水上涨得令人难以相信。

非常奇怪，洪水似乎并没有使我害怕，而是让我十分激动。我以前从未见过洪水。说实话，我还是小孩子时就写过一篇关于洪水的故事，可是，正如我那时写的所有的故事一样，全是臆造的。

我们停下脚步，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但是，查理跛行着走到满是水的水沟旁，站在那里注视着被洪水淹没的地方。“我的确相信‘他’会来！”他突然如陷梦幻中神志恍惚地叫着，“我认为‘他’正向这里走来！”他朝被水淹没的河边低草地的方向伸出一只手臂。他的动作富有魅力，我们都被引诱着无意识地朝那个方向望去。

“喂，查理，你看见谁了？”我的牧师朋友问。

“嘿，他，当然啰！”查理激动地叫着，“他正在跨越大水，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因为他是爱！他穿着一件白色长袍，头上戴着荆棘编成的王冠，那边，快瞧，就在那边！”

我们都望着前方那一大片静静流动着的河水。我不知道别人看见了什么，我只是看见一只海鸥在大水上飞翔。我深深地感到遗憾，我还没有被赐予看见上帝或预测未来的才能和天资，也许我永远也不能看见给我带来安慰和爱的信息的人。

接着，我们分手了。我回到小屋，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也没有什么人在等待我。而我的朋友，却快步走回他的教区长住宅，乐滋滋地被幸运的教徒们围着。

回到房间，我很快换了衣服，然后小心翼翼地从玻璃小人像

中间穿过，走到桌边坐下。这时我既不想读书也不想写东西，我意识到一些奇异的声音，一种奇怪的、激烈的期望。很可能由于洪水的缘故，或者是受了那位长得像基督的年轻人狂热虔诚而造成精神恍惚状态的影响，我发现自己实际正在期待某种异常的、不吉祥的事情发生。

我一直认为，每一个预言家肯定都是疯子般的人物。一个正常人关心的是事实和物质，而一个预言家只关心幻觉。

尽管这是实际现象，但一个预言家有时也可以吸引大众，让大众暂时心驰神往地分享他的幻觉。正常人和幻想家的区别之一就是正常人干实实在在的事而幻想家企图把幻觉变为现实。无论谁，都不可避免，最后以物质世界为归宿(物质的东西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受人尊敬)，却以预言家幻觉的破灭而告终。

这是一个永恒的循环，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斗争，粗俗的物质主义和天真的幻觉主义之间的斗争，物质占有欲望和期待同比人类更高等的东西和谐统一的欲望之间的斗争。

我赞同预言家天真的幻想，我站在他们一边。虽然我知道，他们将永远遭受嘲讽、屈辱，将无休无止地被人们误解，但正是他们，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就知道今日之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甚至那些不是最高明的预言家也都能意识到，对物质占有的狂热，以及那种情愿使世界蒙受屈辱都不肯让自己受一点点委屈的私欲，最终将导致人类自身远离生活的本源。

我站起身来，该是做午饭的时候了。我从窗前走过时，发现洪水在小屋后面的河边低草地形成了一片湖，一只船正在湖上朝着我的方向摇来。小船经过了足球教练居住的房子，当它还在距离我的小屋远处的那小块干地旁时，我认出桨后面的人是那位抹大拉的玛利亚。她跳出小船，向我跑来。我再次小心翼

翼地通过玻璃小人像和堆满花瓶的架子，打开房门。

“嘿，过来！”她叫道，做着手势要我到她身边去。

于是我又一次穿上靴子，这时她已跑近小屋。她告诉我，在教区长住宅附近，他们发现有一个人在河的彼岸，即大桥对面，他进退两难，那里的路现在几乎全被淹没了。他显然不是本地人，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还拖着一个大提箱。牧师派她去救那个可怜的家伙，并问我愿不愿意同她一道去。

“你划船划得好吗？”我问她。“我觉得，洼地那边的急流相当汹涌。”

“在家乡时，我经常划船，”她说，“不对，在我们去之前，如果你想娱乐一会儿的话……”她吃吃地笑起来，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只得很快地答应同她一道去。

我们上船后就分了工，我划船，她指路。我们的船划过足球教练居住的房子时，我感到吃惊，洪水已涨得那么高——我们几乎与底楼的窗台相齐了。这还是第一次，我能够看见足球教练房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沿着墙壁的金属管、油漆过的木箱、南波希米亚制作的圣母雕像；还有几张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像，一张挨着一张地挂在墙上，就像宗教商店一样。

我有时认为，人们贪得无厌的追求与其说是为了防止贫穷和饥饿的本能需要造成的，不如说是他们希望充分利用自己的生命。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这仰仗于把一种思想转化为某种创造性行动，仰仗这些人自己的创造性行动拥有的物质力量。当然，我们多数人不具有这种创造力，而且表现自己行为的机会很少而不是很多，因此，大多数人的行为比人类自己还消失得快，没留下任何痕迹。那么，可能留下了什么呢？人们知道，他会死去，因此想死后能留

下一座金字塔，或者至少留下一幢房子，或者一张堆满了鸭绒垫的床和几个玻璃小人像。

预言家、哲学家和艺术家死后有他们的幻想可以留下，因此他们常常无由顾及其他人的理解。而其他人，相反地，也不能理解那些能够凭借他们的思想或创造性行动来延长生命的人们为什么会不具有占有物质和积累物质的愿望。如果他们思索过，他们就会发现那些富于精神追求的人们的行为确乎是不可理解的。于是把这种行为解释为怪诞，或归罪于虚假的动机，诸如：隐藏着的贪婪，对权力的渴求等等。

他们不可能理解苏格拉底、基督、胡斯①，或者哈夫里塞科似的人物。他们杀害这些人，或者至少把这些人从他们中间驱逐出去。甚至当预言家早已离开人世，他们自己逐渐地已经开始采用预言家们留下的思想遗产，并已经对预言家们不得不忍受的贫穷和流放表示同情时，这样的不理解仍然将继续存在。当然，他们也不会知道，那些被认为是献身者的人们很可能是幸福的，或者至少与那些同时代的物质占有者一样幸福。

“是谁看见那个人的？”我问玛利亚。

“是他，查理，”她回答，“其他人最初不相信他，里维伦德就取来双筒望远镜，于是他也看见了那个人。”

一种神异的激动再次在我心中涌出。为了压抑住这种涌动，我故意地问：“你是从哪里来的，玛利亚？”

“我是从赫拉德茨那边来的。”姑娘说完，就脱下湿透了的网球鞋，把她的脚放在我膝上，然后吃吃地笑了起来。

“在这里很久了吗？”

---

① 胡斯(1372？—1415)，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被判火刑处死。

“已经两年了。”

“你感到孤独吗?”

“孤独?”这个问题似乎使她惊奇,“在这里我感到比在家里好得多了。”她的嗓音很粗。假若我不知道她的模样,光凭声音判断,我会认为她的岁数比实际年龄大一倍。她从口袋里抽出两根香烟,递给我一根。我向她解释,我不吸烟,即使会吸,划船时也不可能。

我们已把足球教练的房子,以及那些油漆过的木箱远远地甩在后面,向小河彼岸的那个特殊地点靠近。太阳从云层后面溜了出来,洒下万道金光。玛利亚朝着太阳喷了一口烟,惬意地叹了一口气。

“你在家乡还有亲人吗?”

“有。”她向我解释,她父亲是拖拉机驾驶员,她母亲喂养奶牛。母亲是吉普赛人,也是一个混血儿。只要母亲把头发染一下,玛利亚骄傲地说,就没有人能够知道她长得黑。母亲所有的孩子都长得漂亮,只有玛利亚例外,长得像一个真正的吉普赛人。由于她前面有七个漂亮的兄弟姐妹,她父亲永远也不肯相信这个微黑的第八个孩子是他的。她刚一出世,他就想摆脱她。

“你母亲决不会让他这样做,对吗?”

“哎,那条母狗当然是不愿意失去当局给每个孩子的物品定量分配额的。”姑娘又吃吃地笑起来,“不过,你不要搞错了,她同样恨我长得黑,她的仇视并不低于我父亲,一看见我,她就想打我。他们两人都一样。”

接着,玛利亚又告诉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她搬了家,与一个铁路工人杰拉住在一起,只偶尔回一次家。她父母毫不介意,因为他们还在继续得到她那份定量分配的物品,他们只关心

这个。一个冬日，她从母亲那里回去时，由于户外寒风刺骨，就借用了母亲的一件大衣。“只是一件破旧的大衣，衣袖上还涂满了肮脏的牛粪。”她鄙夷地描绘那件大衣。我意识到，那件大衣在她未来的生活中将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衣领是山羊皮的，没有人愿意出十镑买它。可是妈妈径直走到警察局，告诉警察，说我偷了大衣。你相信吗？她说，大衣值一千五百镑！”这显然是在对玛利亚伤害之外又施加侮辱。“她只是说，她认为我拿走大衣是为了卖掉它，她只要求从我那里得到一些钱。可是当他们捉住我时，大衣仍然穿在我身上。我说他们发疯了，我只是借来用一用，但他们还是把我送进了审讯室。女检察官对我大嚷大叫，骂我是寄生虫，想把我描绘成一个妓女。而实际上我一直同杰拉住在一起，如果我与别的男人有来往，他早就会痛揍我的。”

“他们判决你有罪吗？”

“我被关进监牢，后来被送到这里来了。”

“你申诉过吗？”

“没有。我很高兴能摆脱他们。”

我不清楚“他们”是谁，是她的父母还是法院，也许两者都包括了。“你的男朋友呢？”我问。

“哎，在我服刑时，你说他又能做什么呢？”她问我，并抬起头，望着天空。天上的云层越来越薄了，正四处飘散，而那些受了惊恐的小鸟飞来飞去。“他写信告诉我，他仍然想念我，劝我不要生他的气，请我原谅他不得不另找一个女人。这是他给我的礼物。”她给我看那串廉价的、各种色彩的念珠。我说，真好看。她继续告诉我，开始她很伤心，但那些姑娘告诉她不要当傻瓜，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男人。可惜，这里看不见一个真正的男

人，玻璃制造厂的所有男人都像玛土撒[1] 一样老，遇到酷热的日子，他们心里想的只有啤酒。

“这样说来，你不是很喜欢这个地方。”我已得出结论。这时，我们正朝着树林划去。我们四周都是水，我已搞不清楚，我们经过的是那片低草地还是那块田野。这真是一片壮观的景象呀！这景象中不正蕴藏着那么一点原始的却又是超凡的力吗？此刻，好像我已经或将要受到来世，或者上帝，或者正义的启迪一样。很奇怪，这时我的同伴没有打扰我激动着的情绪，她仿佛也被来世触动了。

我们安全地通过小河，到达那河的彼岸，在这片汪洋大水中间，我们终于看见了一条狭窄的小路。这条小路已有好几处被水淹没而中断了，小路上那个男人正带着手提箱坐在一个里程碑上。由于离得太远，还看不清楚他的外貌。

“什么地方我都喜欢，”玛利亚说，“只要看不见我母亲，那个老泼妇。她想的是什么？我将把那件血迹斑斑的大衣带回去，对吗？不过，她还是失去了她孩子的那份定量配给。”她饶有风趣地加了一句，“本来她还可以要求再领到半年的定量配给的啦。”阳光终于驱散了云雾，金灿灿的。她朝后靠了靠，闭上了眼睛。

那个人现在也看见我们了，他站起来，在那小块未被淹没的地上，跳上跳下，挥舞着手臂，向我们高声喊叫，就像一个被围困在海岛上的遇难海员。

此时，我已能看清他的相貌，也认出了他身边的那个行李。不是什么手提箱，而是一个崭新的，闪着光的大公文皮包。我高兴地向他叫喊，嗓子因激动变得沙哑：“我们来了，教授！”

---

① 《圣经》中的长寿者，据说享年九百六十九岁。

我们把教授救上船。他的鞋湿透了，裤腿卷到膝盖上面，瘦小的身躯冻得发抖。他受尽了折磨。

我刚坐下，他就靠向我，低声说，他给我带来了大量的文件和宣言，还有一张被禁止发表文章的作家名单及一张新的宪章签字人的名单。他用了整整一周时间才把这一切打了出来。他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就对自己说，我肯定想知道布拉格正在发生什么事，所以就坐上火车，就这样来到这里。“可是，这两天布拉格一直阳光明媚，没想到在这里，我却遇上水灾。起初我打算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谁知，大水在我眼前不断上涨。”

我感谢他吃尽苦头给我带来那些文件，我问他：“这次你没有忘记暗码号数吧？”

“没有，”他愉快地说，“这次我想了一个极妙的数字。”他又靠近了一点，在我耳边说出那个数字，似乎怕别人听见，“你知道，塞利尼[①] 的卡内德斯在罗马进行讲演的那一天。那个日子容易记住，我认为旁人不会知道那个日子。你同意吗？”

“哦，我断定他们不知道。”我让他放心，然后尽力地朝足球教练的房子划去。

当我们快要重新回到陆地时，我看见一个圆圆的东西在水上漂浮。我停止划船，我们三人都竭力想辨认出是个什么东西。最后，教授说：“哟，是一辆纺车！”

现在我又看见洪水已把一扇窗户冲开，许多东西正从足球教练的屋里漂出，在水里轻轻晃动着一个油漆过的木碗，一个木制广告牌，那上面还写着：“家，甜蜜的家。”还有油漆的衣橱的门，最后从窗户里漂出一张旧式的大椅子。我们等在那里，望着

① 古代北非塞利奈以加的首府。

椅子缓慢地朝我们漂过来。当它擦着我们的船边漂过后，一只白色海鸥从天空直冲下来，停留在椅背上，就像船长在船桥上一样，环顾着四周的茫茫大水。

教授又靠近我，低声说："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想立刻给你读一些东西，你认为在这位姑娘面前可以吗？"

我让他放心，可是教授摇摇头："我的眼镜放在公文皮包里，没有眼镜我看不清号码。"

于是我把桨交给玛利亚，接过教授的公文皮包。"是什么号数？"我问。

"我是告诉过你的，"他吃了一惊，"我没有告诉过你吗？"

"你仅告诉我有关那些罗马的讲演。"我承认，"我可从来没学过哲学。哦，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学习。"我为了解释精确一点又做了纠正。我只参加过几次哲学讲演会。

"我没有告诉你日期吗？"教授越来越吃惊，"我刚才还很高兴，我不必把它记在脑里了。"

他不再说话，陷入沉思。一个军鼓和一个军号，一个边上镶着珠母的切面包板，一个普日布拉姆地区出产的圣母雕像，雕像头上有一个金制王冠，一个镶有宝石的箱子，天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财宝。我们只需伸出手去就行了。

"你喜欢吗？"我问玛利亚。

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我拿它来干什么？全都浸湿了。"

现在我才感觉到，船上的三个人全都奇迹般地湿透了。

教授一直在喃喃着，列举一连串名字，诸如，克赖西波斯，拉里萨[①] 的菲朗。突然，他转向我，对我说，他估计是一百五十

---

① 位于希腊中东部皮尼俄斯河畔。

六年。

我很想问是公元前的一百五十六年还是公元后的，又担心他生气。于是我把号码转到一五六。我们两人都屏息静待着公文皮包是否会被打开。

译后记

克里玛的《我快乐的早晨》一书作于一九七八年，在当时的情况下，书写出后不能在捷克出版，但它很快就被译成各种语言于国外流行。我们依据的就是 Readers International 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的英文版，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年，断断续续译了一年，主要由景黎明执笔译第一稿，然后由我从头至尾过校一遍。由于种种原因，译文完稿后就一直束之高阁，于是，十年过去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有意思的是，中国和捷克这两个国家虽然相隔甚远，但似乎存在着某种宿命的联系，都是以二十年为一个轮回，互相交叉地走走停停，比如一九六八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一九七八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一九八九年捷克的“天鹅绒革命”，一九九八年中国开始更加深入的改革。此书的写作到翻译再到出版，就夹在这种种命运中间，成为现代世界潮流的一个见证。在此期间，我们一直都与克里玛本人保持联系，并始终受到他的鼓励和关注，让我们保留版权至今，作者甚至还托代理人寄来他本人的简历，使我们对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有了更多的背景认识，这是必须向作者深致谢意的。

还需要一提的是，译林出版社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终于使这部文学杰作得以奉献在读者面前，在此我们也要一并致谢。

景凯旋

一九九八年五月